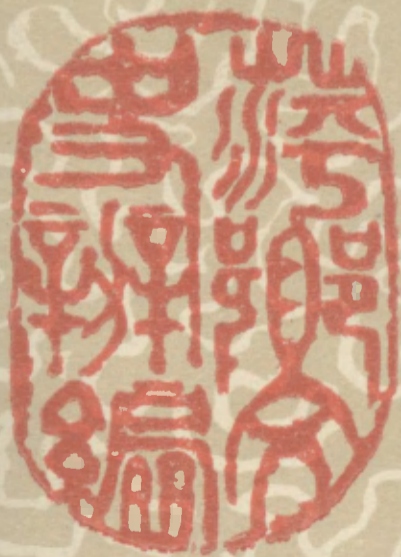


萍鄉文史資料

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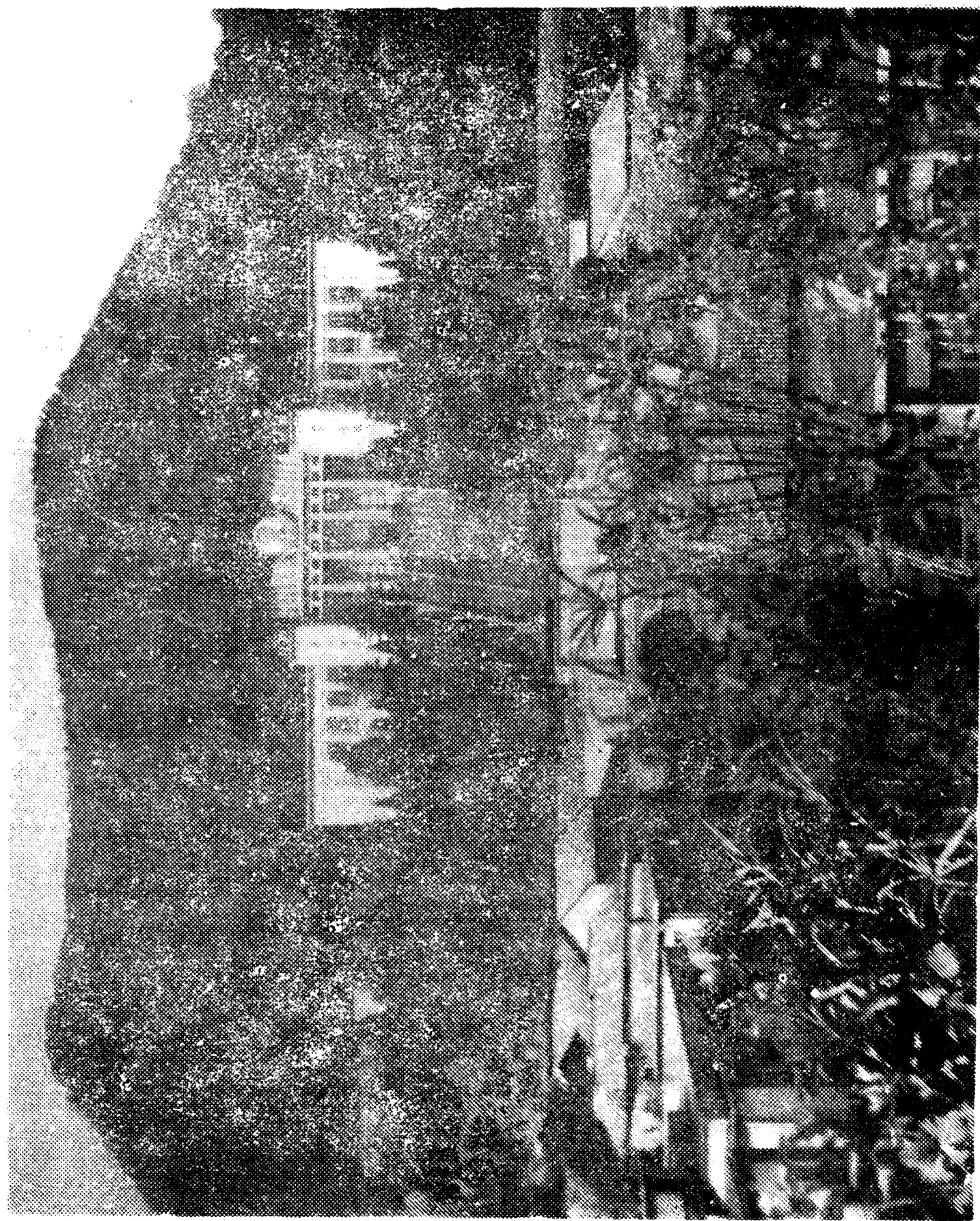


萍乡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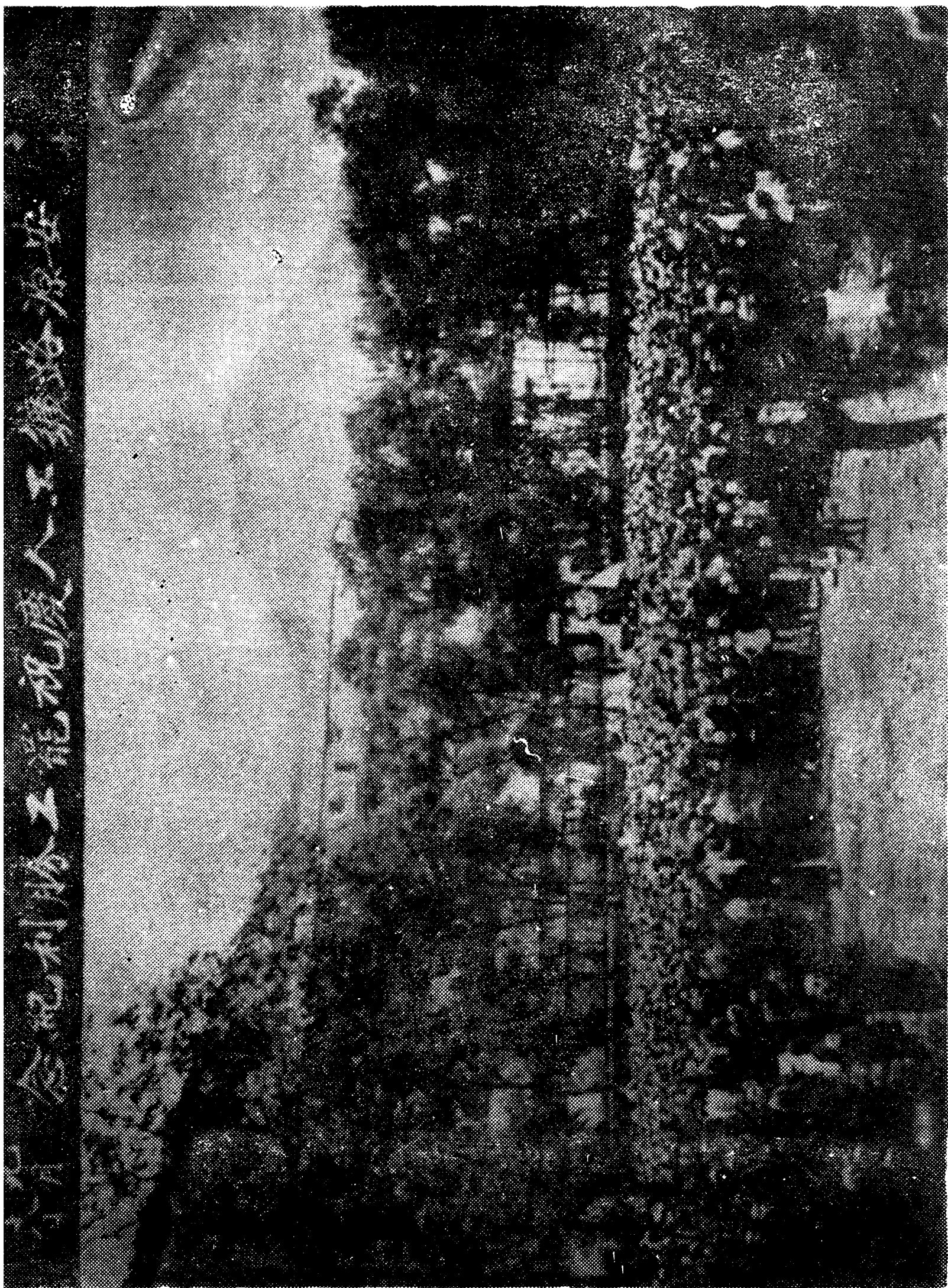
第一辑

政协萍乡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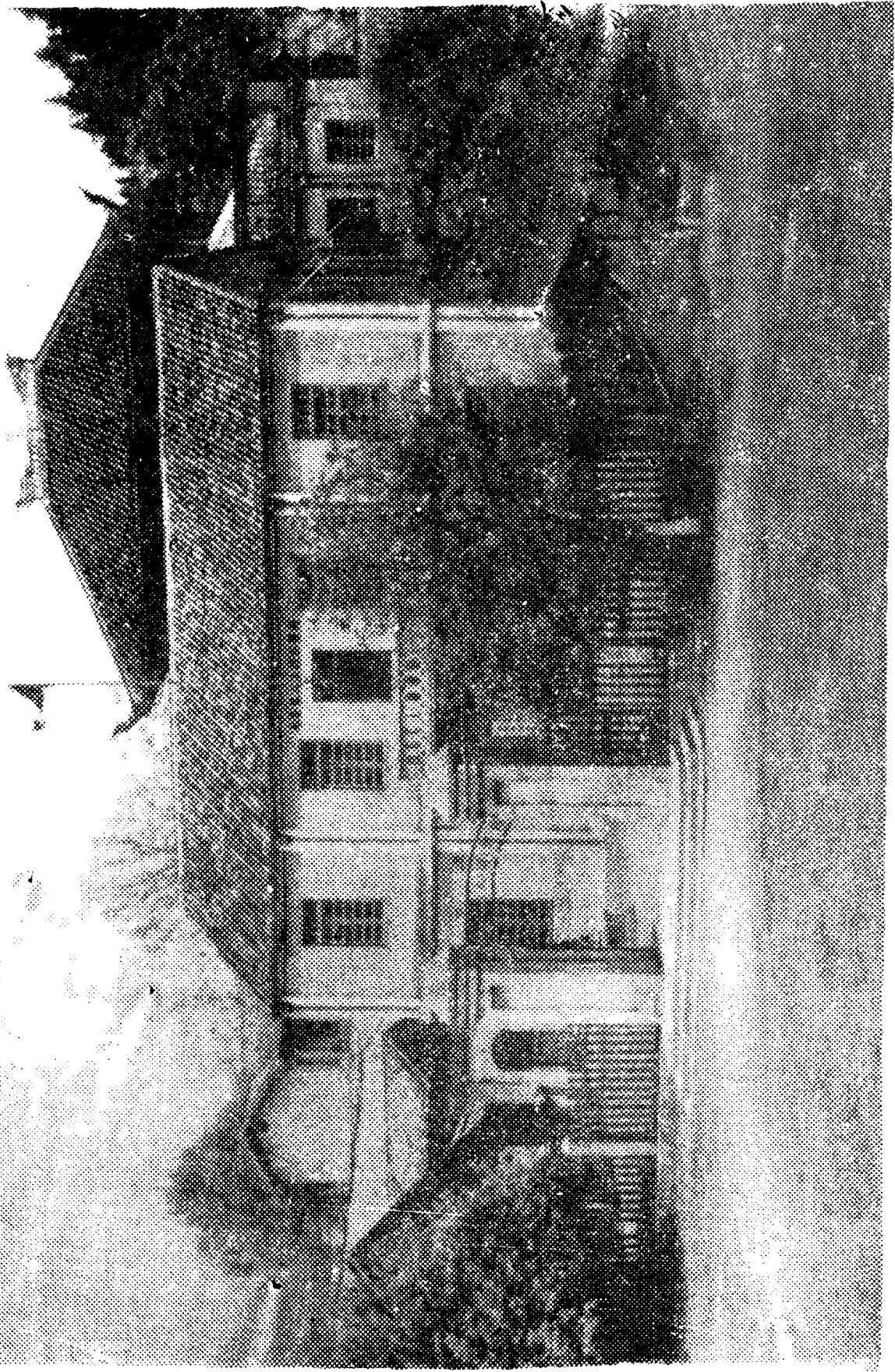
1984.8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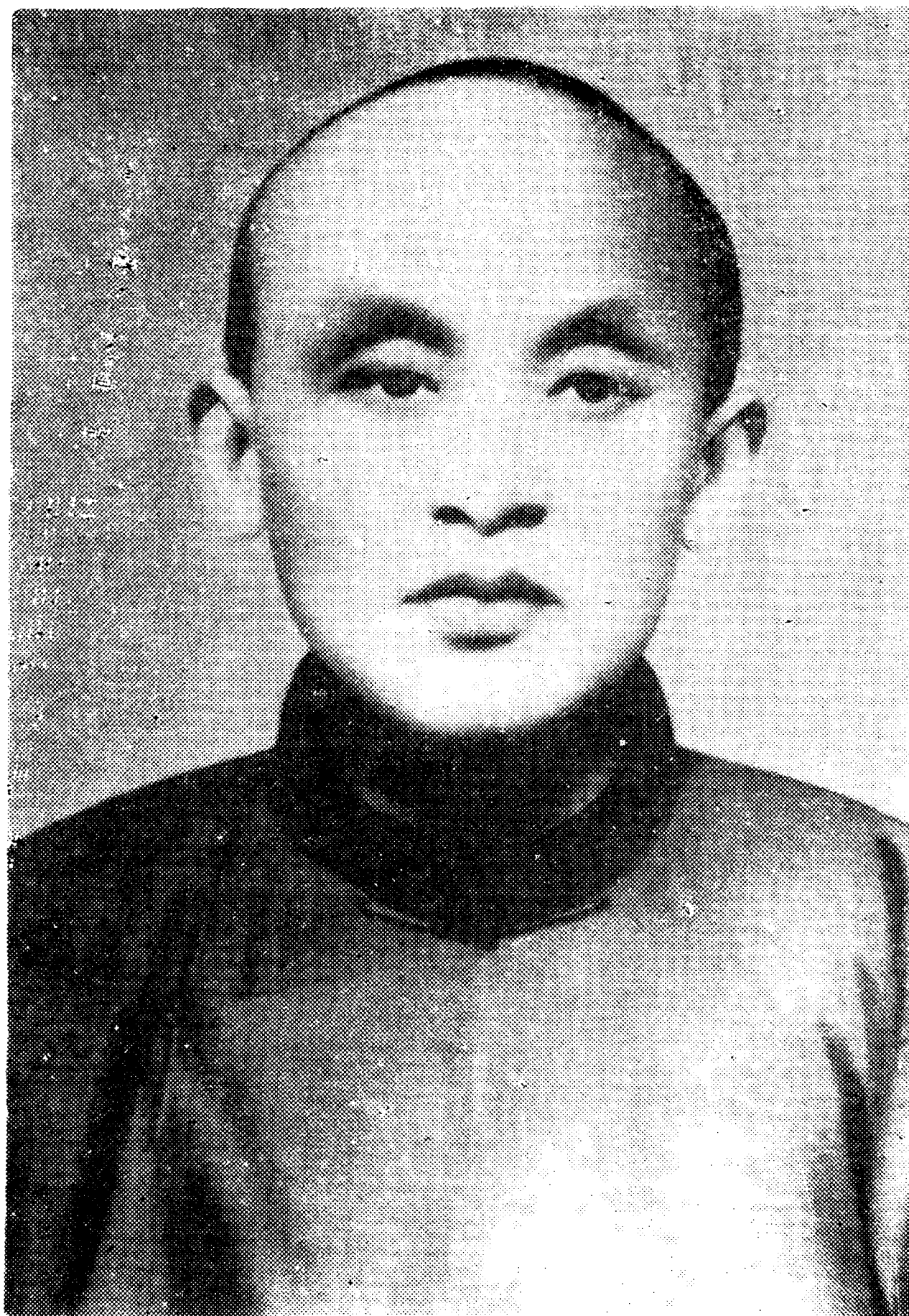
安源路矿工人庆祝罢工胜利大会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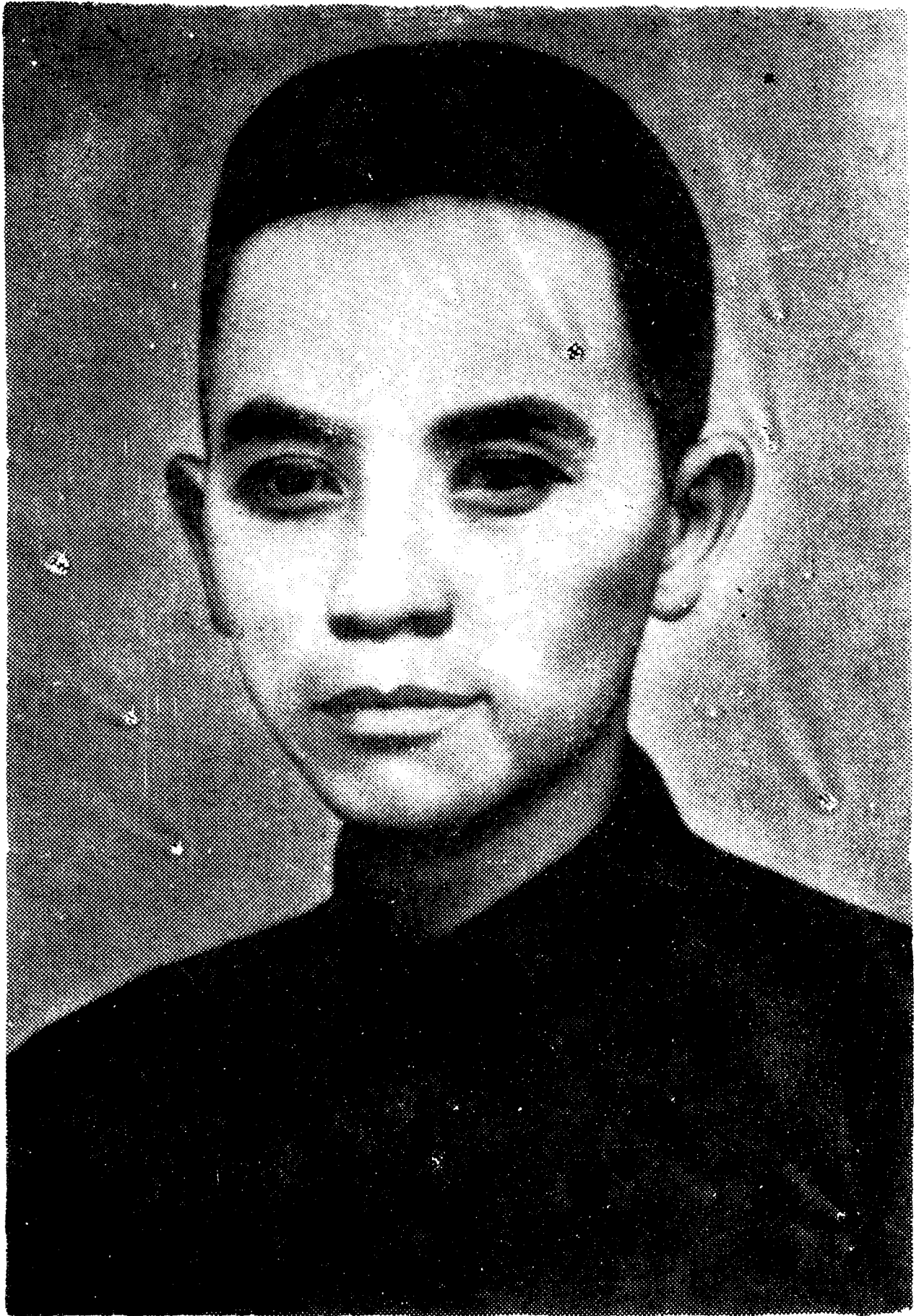
罢工胜利后，安源路矿工人自筹资金修建了工人俱乐部
讲演厅，前楼为办公室，后楼为讲演厅。



黄静源（1900—1925），湖南郴州人。一九二四年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办事处主任，后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一九二五年十月被敌人杀害于安源。



朱少连（1837—1928），湖南衡阳人，株萍铁路工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六月出席党的“三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牺牲于萍乡。



刘昌炎（1894—1927），湖南礼陵人，安源煤矿工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窿内党支部书记和中共安源地委书记等职。一九二七年牺牲于萍乡。



卢德铭（1905—1927），四川自贡人。一九二七年九月率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在萍乡芦溪为掩护部队向井冈山转移而英勇牺牲。

（本辑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张松林供稿、摄影）

前 言

《萍乡文史资料》第一期，经过半年多的准备，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是周恩来总理生前交给政协的一项政治任务。做好文史资料征集、整理、出版工作，对于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对于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都具有重要作用。

萍乡是一座古城，历史悠久，近、现代史料都很丰富。从戊戌变法以来，特别是从“五四”运动到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从萍、浏、礼起义到建立苏维埃政权，萍乡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历次革命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根据政协全国文史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我市文史资料丰富实际情况，经政协萍乡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从今年起陆续出版《萍乡文史资料》，欢迎政协委员，各界人士踊跃投稿。征集文史资料时限为：戊戌变法以来，截止文化大革命以前。范围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科技、历史名人、历史名胜等各个方面的资料。

撰写资料形式可以多样，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以亲历、亲见、亲闻为重点，也可以写自己熟悉的历史和人物。稿件要求真实具体，“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稿件一经采用，付与稿酬。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经验不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文物图片

前 言

目 录

- 萍乡历史沿革.....王雪胜 (1)
- 毛泽东同志一九二一年秋来安源考察.....刘义胜 (6)
-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快邮代电..... (9)
- 安源工人向汉冶萍公司发出罢工通电..... (10)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安源罢工的声援函..... (10)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对安源罢工的声援电... (11)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庆祝安源罢工胜利函..... (12)
-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通告..... (13)
- 安源路矿罢工之经过情形..... (15)
- 震惊中外的安源大罢工.....丁运梅 (17)
-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杨放萍 (28)
- 朱少连.....胡自国 刘传政 (32)
- 黄静源烈士传略.....杨放萍 李昌学 钟丁祥 (36)
- 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段家作 (44)

李寿铨与安源煤矿	李为扬 (55)
地质学家喻德渊	李锡正 (99)
张学良在萍乡	周光明 (105)
日军侵略萍乡记叙	市志办供稿 (107)
日军入侵萍乡受灾情况	曾祥丁 (110)
萍乡人口统计资料	市志办供稿 (112)
民国时期萍乡的历任县知事、县长	钟石麟 (115)
萍乡上栗花爆古今谈	王以茂 (121)
萍乡花果话今昔	王舜笙 (124)
杨岐山	市地名办供稿 (128)
杨岐寺	市地名办供稿 (130)
萍乡文史资料征稿第一批参考题	(132)

萍乡的历史沿革

王雪胜

萍乡地处江西西部，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建治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了。

在传说中的我国上古时期的黄帝划野分州时，萍乡属九州之一的扬州地。西周仍为扬州地。春秋战国为楚地。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后，置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郡，萍乡为长沙郡临湘之地。汉高祖初时，析九江郡地置淮南国，后又析淮南国地置豫章郡（辖境相当于今江西省），领县十八，宜春（前201年置）为十八县之一，此时，萍乡为宜春县地。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当时萍乡的老关南部、下埠西部、排上、东桥、麻山南部、源並南部、龙台、广寒寨、白竺、长丰南部等乡地，皆为荆州长沙郡的醴陵、攸县、安成县地。汉元光六年（前129年）时，封长沙王子为宜春侯，此时的萍乡又为宜春侯封地。元鼎五年（前112年）时，废淮南国仍为豫章郡地。东汉袭之。三国早中期，萍乡为吴国扬州豫章郡宜春县地。到吴末帝（孙皓）宝鼎二年（267年）十二月，析豫章郡地、庐陵郡地、长沙郡地和湘东郡地置安成郡，又析宜春县地置萍乡县，治所在今芦溪镇的古冈村。萍乡县建治始此。

晋泰始（265—274年）初，因避郑太后名“春”之讳，改宜春为宜阳，由县升郡，萍乡隶属宜阳郡。到大康（280—289年）废宜阳郡，萍乡隶属荆州安成郡。当时，

萍乡的桐木、金山、上栗北部、鸡冠山北部等乡镇地皆为扬州豫章郡康乐县地。晋永熙元年（290年）后，萍乡隶属江州安成郡。南北朝的宋、齐、梁、陈皆袭之，当时以县之大小分封定爵。宋顺帝（刘准）时，萍乡为侯相（爵位的第二等）。齐高帝建元二年（478年），降侯相为伯相（爵位的第三等）。隋开皇初年，复改宜阳为宜春。到开皇十一年（519年）时，因九江土人文盛以安成为发难地，故废安成郡，于宜春县置袁州。州以北面的袁山得名，而山又以袁京处士得名。此时，萍乡隶属袁州。隋大业（605—613年）初，改袁州为郡，萍乡隶之。县治由芦溪移至今萍乡镇（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25—26图）。此时的郡为一级政区，县为二级政区。唐武德二年（619年）时，又改宜春郡为州，萍乡隶之。根据现在的考古资料，萍乡县治应为此时由芦溪古冈（今古城村）移至今地。唐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此时，萍乡隶属江南袁州。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时，分江南道为东西二道。萍乡隶属江南西道袁州。天宝元年（742年）复改袁州为郡，萍乡隶之。唐乾元二年（759年）又改宜春郡为州，萍乡隶之。自隋至唐，萍乡均为上等县份。

五代十国时，先为吴国（902—937年）地，后为南唐（937—975年）地。宋时，萍乡隶属江南西道袁州。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时，萍乡隶属江南西道袁州安抚司；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隶属江南西行中书省袁州总管府。元朝元贞二年（1296年）升萍乡县为州，萍乡隶属江西行中书省袁州路；元至正二十四年（1394年）七月改袁州路为府，萍乡隶之。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萍乡州为县，隶属江西布政使司袁州府。到清顺治二年（1645年）时，萍乡属江西省袁州府。此时，萍乡编户一百三十里，置三隅七乡。顺治十六年（1659年）裁草市（今萍乡西南东桥

一带)司巡检为湖南省攸州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县尚崇年奉文,在萍乡置十乡二十八里四十九保一百零四图。乾隆九年(1744年)时,改大安司巡检驻芦溪市(今芦溪镇)。嘉庆二十五年(1802年)时,草市司巡检已复归萍乡。光绪季年(1908年)知县遵奉部颁新章,在萍乡置二镇四十乡、十八市一特别市。宣统二年(1910年)设南昌、瑞州、临江、袁州四府兵备道(整饬兵备的道员)。袁州府兵备道驻萍乡城;设同知(清地方官名)驻栗江镇(今上栗镇);设大安司巡检驻新店市(今新泉)。

民国初年,萍乡仍属袁州府。设赣西镇守使,驻萍乡。全县的袭清制为二个镇四十个乡二十八个里一百零四个图,置东区、西区、北区、南区、小西区五个区,县城分五隅。民国十六年(1927年),全县置十七个区三十余个乡一个市。民国十九年(1930年),复为五个区四十个乡。此时,全国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萍乡境内只有中部地区是白区,北部和南部均已成为红色区或游击区。在东桥、上埠、大安、新安、南溪、长平、上栗、桐木等乡,以及距县城仅六公里的安源市也建立了工农兵政府,在大安建立了县工农兵政府。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区仍旧,并四十个乡为十个乡,下置二十八个里四十九个保一百零四个图。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赣西北特委成立,萍乡划归宜春中心县委领导,并在安源、宣风等地设立区委会。旋后,直至民国三十八(1949年)止,全县为十七个区四十个乡四个镇(以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为准)。四镇是:中山、芦溪、湘东、栗江。在此之前,中山镇曾根据城区的社会组成状况,分置为交通镇(今市区西部新生路以西的老火车站一带)、文化镇(今市区南部八一街以南到南门桥一带)、进贤镇(今市区市政府前的正大街以北到邮电局一带)、中山镇(今市区市政府以东到东门、北桥一带)。1949年7月23日萍乡解放。

解放初袁州府改为袁州专区，萍乡属袁州专区管辖。区域设置将原十七个区并为十一个区，四十四乡（镇）分置为三百二十八乡（镇）。旋后，又将十一个区并为六个区，并三百二十八个乡（镇）为九十一个乡（镇），置有萍乡、高坑、安源三个区级镇和芦溪、宣风、上埠、湘东、上栗五个乡级镇。区级镇下面还置有十三个乡级街政府（相当于今的乡级街道办事处）。1950年8月又调整为十七个区一百九十二个乡（镇）十二个街政府，同年底将一百九十二个乡（镇）分置为三百零九个乡（镇）。1952年9月袁州专区与南昌专区合并为南昌专区，萍乡属南昌专区管辖，下设十八个区。1955年并十八个区为十三个区，并二百九十七个乡（镇）为九十一个乡（镇）。1956年并十三个区为六个区，并九十一个乡（镇）为二十九个乡（镇）。1957年撤销区级建置。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

1959年1月，增置青山镇。南昌专区搬宜春，改为宜春专区，萍乡属宜春专区管辖。1960年9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萍乡县，设立萍乡市，属宜春专区管辖，公社（场、镇）增至五十一个。1961年恢复区级建置，设八个区七十一一个公社（场、镇）。1963年由八个区并为七个区，仍设七十一一个公社（场、镇），将市内七个镇改由市直辖。1966年撤区并乡，由七十一一个公社（场、镇）减少为四十七个。1967年并为三十五个公社（场、镇）。1968年改为九个镇、二十三个公社、四个垦殖场、一个农场、一个水产场，共计三十八个公社（场、镇）。1969年又改为三十二个公社（场、镇）。

1970年三月十日，经国务院批准将萍乡市改为江西省直辖市。下辖三十二个公社（场、镇）。1971年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报国务院备案，设城关、湘东、芦溪、上栗四个

市辖县级区，下设三十二个公社（场、镇）。1972年增为三十七个公社（场、镇）。1974年调整为三十八个公社（场、镇）。行政全市区划为四个县级区，九个镇、二十五个公社、四个垦殖场，五百四十五个大队。1983年撤消萍乡镇，设五个街道办事处（为公社级）。1983年冬和1984年春进行机构改革，实行政社分开，全市设二十九个乡、九个镇（包括城关区新置的白源镇）、五个乡级街道办事处。五百九十二个村。

不能满足国内外群众的需要。花型和品种比五八年亦有所减少，有些较精致的花型尚未得到恢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市花果厂在上级的大力支持下，正按照恢复和发展名特传统食品的要求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存在问题，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工艺水平，搞好科研活动，增加生产，提高产品质量，争取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创新，有所前进，使这一誉满中外的传统食品奇葩异放，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毛泽东同志

一九二一年秋来安源考察

刘义胜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确定：“组织产业工会为我党主要目标。”①毛泽东同志出席党的“一大”回到湖南以后，按照党的决定，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

“一九二一年秋我们党建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很快就到安源做了一段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当时是我们党的湘区书记。安源是当时湘区所属范围内最大的工业企业，工人群众最集中的地方，所以特别引起毛泽东同志重视。”②安源煤矿（原称萍乡煤矿）位于湘赣边界。开办于一八九八年。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它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买办企业，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最大的煤矿。株萍铁路是专为运煤焦而于一八九九年动工修建的，最初属萍矿管辖，二十年代初隶属于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它同安源煤矿紧密相联，被习惯地总称为安源路矿。路矿两局工人人数最多时达一万三千多。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本家的压榨下，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而不断地反抗和斗争。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一五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时，由于“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是二十一条的重要条款，他便已经对萍乡煤矿有所了解。一九一九年，他写的《民众大联合》一文在揭露

当时反动政府腐败无能时也提到汉冶萍公司亏本，招收外股的事情。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来安源考察并非偶然。

毛泽东同志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到安源参观矿山的公开身份，利用同乡的关系，住在矿局西平巷段长毛紫云家里。

在毛紫云家听差陪同下，毛泽东同志下到矿井东平巷和西平巷等处的工作面，与工人亲切的交谈，了解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况。毛泽东同志从工人日常生活的事实出发，耐心地询问工人每天做几小时工作，做一天有多少钱。并用工人亲身经历的苦难事实，向工人初步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启发工人，受苦不是什么“命里注定”的，而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结果；工人要改善自己的地位，就要靠自己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打倒剥削者、压迫者。毛泽东同志还拿小石子打比方，一块小石子一脚就把它踢开了，要是把很多小石子凝结在一起，就不容易搬动了，通俗地向工人说明团结的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还到了工人餐宿处进行考察。餐宿处是工人吃饭睡觉的地方，在一间二丈多长一丈多宽的房间里，起码要睡五六十个工人，工人睡的是用木板和树木搭成的三层床，盖的是猪油渣般的破棉絮。房子里卫生条件极差，臭虫成堆，气味很大。工人吃的是霉米和没有什么油盐的蔬菜。毛泽东同志攀到三层床上看了工人的铺盖，尝了工人的饭菜。

毛泽东同志还考察了洗煤台、锅炉房、炼焦处、机械修理厂等处，广泛地接触工人，与工人促膝谈心。

通过这次考察，毛泽东同志对安源的情况和工人的苦难有深刻的印象。他一面鼓励同志到工农中去“钻一钻”，一面指定人与安源建立了通讯联系。“此后书记部所有各种书报及各处劳工解放运动之消息均次第传来。《工人周刊》等出版物，乃时出张于工厂附近之墙壁，宣传因而大广，于是要求解放之

念，在此少数工友之心中，乃如雨后春笋，勃然怒放！”③

毛泽东同志这次到安源，了解到安源路矿的实际情况，组织了一些工人，为我们党开辟安源工人运动作好了思想准备。他

“对为何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渐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已经是胸有成竹。”④回到湖南不久，毛泽东同志即选派刚从国外回来的李立三同志来安源开展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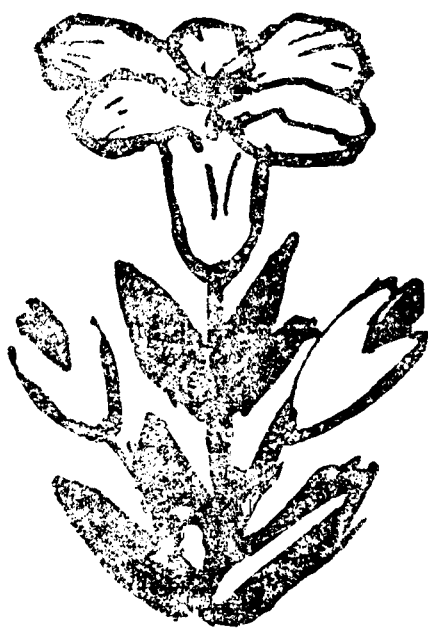
注释：

①、《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一九二一年），引自《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页。

②、李立三：《看了“燎原”以后》，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八月四日。

③、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引自《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④、同注②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快邮代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全国各工团的工友们钧鉴

我们的俱乐部成立有数月，我们本着我们光明正大的宗旨，做我们光明正大的事业。不料路矿两局怀着鬼胎，时加破坏，施尽种种阴谋，终不得其一逞。阴谋者乃于昨日假萍乡县知事之官威，下了一道指令，要我们自行解散。我们迫不得已，经全体议决，明白向路矿两局要求最低限制（度）之条件，并限明白答复。否则，当作最后的对待。各地工人们呀，快来援助我们！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启

九月十一日

（1922年9月16日长沙《大公报》）

安源工人向汉冶萍公司

发出的罢工通电

汉冶萍公司：

萍矿工人每日工资少者仅二百文，无法生活，只好停工。

萍矿全体工人叩

(1 9 2 2 年 9 月 1 4 日 长 沙 《 大 公 报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安源罢工的声援函

“……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的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示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的声援！”

(摘自 《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 》 一五一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

对安源罢工的声援电

萍乡安源路矿工友公鉴：

我们接阅你们的罢工宣言，我们知道你们已经鼓着你们的阶级斗争的勇气和惨无人道的资本家、官僚、军阀宣战了。我们非常佩服你们的奋斗精神与作战的力量。我们对于你们向铁路当局所要求的最初步最低度的条件，实在觉得万分正当而无可减缩丝毫。我们诚诚恳恳地愿你们坚持到底而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也很愿意竭力援助你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敬祝胜利！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启

1922年9月21日《湖南通俗日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庆祝安源罢工胜利函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工友：

诸工友这次的罢工，敝部已经看到了诸工友是很有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对于诸工友这次的大胜利，敝部是很佩服的欣喜的，敢向诸工友前庆祝胜利，大呼：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敝部又敢用十二分的诚意敬告各工人：诸君这次的胜利，不是诸君终极的胜利，诸君终极的胜利是在于把资本阶级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诸工友为得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终极的胜利起见，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实力举行社会革命的时期中，一方面要发展诸君已经学会了的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好打倒资本阶级；一方面要设法练习诸工友的管理能力，好待社会革命后，管理一切的产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诸工友的真正胜利。诸工友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啊！努力呀！奋斗呀！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敬祝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通告

下面的条章，是本部前与路矿两局协订条件时与矿局商订的，凡是窿工工头、工人都应遵守，不得违背，更不得故意苛刻及无故取闹，特此通告。

小工原价壹佰捌拾文至贰佰文的，加为壹角伍分。

小工原价贰佰壹拾文至贰佰叁拾文的，加为壹角陆分。

小工原价贰佰肆拾文至贰佰陆拾文的，加为壹角柒分。

小工原价贰佰柒拾文以上，加为壹角捌分。

大工原价叁佰文至叁佰贰拾文的，加为贰角肆分。

大工原价叁佰叁拾文至叁佰伍拾文的，加为贰角伍分。

大工原价叁佰陆拾文至叁佰捌拾文的，加为贰角柒分。

大工原价叁佰玖拾文以上，加为贰角捌分。

罢工期间工钱和礼拜工钱，矿局是照牌子的多少发的，工人就要照人数的多少分摊。分摊的法子是照大工、小工工钱的多少来分。（譬如有矿局牌子四十块，矿局发一天的工钱，每人贰角柒分，一共拾元零捌角。但工人的人数有五十人（轮班在内），小工二十五人，工钱壹角伍的有二十人，壹角捌的有五人；大工二十五人，工钱贰角肆的有二十人，贰角捌的有五人，这五十人一天的工钱共计拾元零壹角，再以这拾元零壹角除那矿局发下来的拾元零捌角，品下每角应得壹角零陆厘。如是那小工工钱壹角伍的应得壹角伍分玖厘，壹角捌的应得壹角玖分零捌毫；大工工钱贰角肆的应得贰角伍分肆厘肆毫，贰角捌的应得贰角玖分陆厘捌毫）。

窿工每月歇五天，不得扣伙食，轮班亦不得扣伙食。

十三条协约从阳历九月一日起实行。

工头发给工钱尾数，须照实洋扣算，不得壹角只发贰佰。

一年三节神福不能免。

上面的条章，工头、工人如有强悍不遵，故意违抗的，本部必与以相当的处分。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十月五日



安源路矿罢工之经过情形

△工人之最后胜利

△矿局承认十三条

安源路矿罢工风潮之解决，已志昨报。兹调查其罢工经过情形及路矿两局承认条件于左。安源系五方杂处之地，平日秩序极不好。此次罢工，工人至二万人之多，由工人推出监察队二十人维持秩序，翕然听命。查其罢工之起因：（一）路矿两局封闭工人俱乐部所激发；（二）工人俱乐部在安源矿局对门岭上湖北同乡会东边，罢工之前四天，仅有部员七百余人，至罢工之日，报名加入者达一万五千人；（三）虐待工人。工人餐宿处臭气熏天，最为恶浊，一房住至五六十人，监工工头对工人做工稍不如意，棍打足踢，辱骂尤其小事；（四）矿局之黑幕。工头管工人五十名，实有工人三十名，以三十人做五十人工作，每天至十四五点钟，其余二十人之工食，归之工头中饱。闻工头每月可得一百五十元之工资，每工头又每月要报效监工一百元之多。查总监工王某每月要得各工头监工报效费到二千元。又此次罢工迁延五日之久，由于各办事人互相倾轧，甲党打电报攻击乙党，说此次罢工风潮，由他们所酿成。乙党亦如之。卒之黑幕揭穿，势不能与俱乐部言和；（五）罢工期内之秩序。自十四日全体一致表决罢工后，秩序由俱乐部推举监察二十人，手执白旗游行，稽查工人举动，稍秉白旗一挥，

无不听命。有一次戒严司令部请俱乐部李君、刘君谈话，工人以为加害于二人，包围司令部，并有冲入机关内。此时秩序极乱，非常危险。后监察队一至，工人均散归；（六）调军队一旅到山。军队见工人举动极文明，亦表示同情，所以此次未有流血事发生。延到十八日上午口时签字，下午三时在大操坪由李隆邨宣布条约，到者万余人。宣毕，均脱帽大呼中华民国万岁！工人万岁！俱乐部万岁！秩序井然。晚间全体工人均上班，是日即行开车。兹附该路矿罢工解决之条件如下。（条件略）

（1922年9月21日长沙《大公报》）



震惊中外的安源大罢工

丁运梅

一九二二年九月，在我们萍乡爆发过一次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两局工人联合大罢工。这次大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最成功的典范，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安源煤矿（旧称萍乡煤矿）开办于一八九八年，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即汉（汉阳铁厂）、冶（大冶铁矿）、萍（萍乡煤矿）公司三个主要企业之一。到二十年代初，全矿雇用工人一万二千多人（开大工时，人数尚须增加），多系包工制。矿局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拖欠劳工工资、发矿票、发篾筹、强迫存饷等手段吸取工人血汗；包工头又通过“吃点、买空、做窿、买灰”等手段敲诈勒索工人。总监工王鸿卿每月克扣工人工资常达三千多元，而一个矿工辛苦劳累一个月，只能得到五、六元钱工资。工人住在空气恶劣、阴暗潮湿、拥挤不堪的餐宿处；过着衣不遮体，食不饱肚，饥寒交迫的生活。在政治上，工人更无半点权利。帝国主义分子在矿上无所欲为，肆意虐待工人。矿局对工人可以任意逮捕、审讯，并用跪壁块、戴木枷、坐快活凳、尖木马等十几种刑法刑具迫害工人。工人稍有反抗，就要遭受到处罚。株萍铁路“工人待遇，较诸京汉粤汉诸路尤为痛苦，压迫则无所不至，工资则任期延长，”“工人茹苦含辛，敢怒不敢言，此为路工痛苦之实在情形。”总之安源路矿当局如此黑暗，对待工人如此残忍，至使一万三千多路矿工人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同牛马一般的劳

累，酿成了这次大罢工的内在因素，也是这次大罢工最**根本**的原因。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同年秋天，党的湘区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来到了安源路矿考察，开始了党在安源的工作。十一月，中共湘区党支部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派李立三到安源，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

一九二二年初，全国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各地工人罢工斗争风起云涌。一月间，李立三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在安源创办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二月，建立了由李立三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最早的支部委员会。五月一日，安源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国际劳动节，并宣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

七月，同属汉冶萍公司的汉阳铁厂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大冶铁矿工人俱乐部亦相继成立，消息传来，给安源工人极大鼓舞，俱乐部乘机进行宣传鼓动，每日分做几处演讲，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②。”俱乐部在群众中的影响愈来愈大，参加俱乐部的工人亦逐增多。到九月上旬，部员发展到七百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团组织为骨干力量，以俱乐部为公开组织形式的革命队伍，为即将爆发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准备了条件。

安源路矿当局本来对工人俱乐部不加注意，这时却意识到工人俱乐部的日益强大，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感到十分恐慌，但鉴于汉阳铁厂罢工正是由武力压迫俱乐部而引起的，对于俱乐部也不敢径行压迫。于是，他们先以津贴俱乐部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为诱饵，进行笼络收买，但都遭到俱乐部负责人的坚决抵制。接着，路矿当局又污蔑俱乐部为“乱党”机关，暗中勾结官府军阀，要以武力封闭，并大肆恐吓威胁俱乐

部负责人，要他们速离安源，“否则必有杀身之祸。”俱乐部负责人朱少连、蒋先云等响亮地回答：“我们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路矿当局面对俱乐部利诱不动，恐吓不倒，无计可施，于是，呈请萍乡县署出告示，“训令俱乐部自行停闭。”

安源工人本来就无法生活。路矿当局除上年已欠饷三个月，本年又欠饷两个月，加之物价飞涨，工人的生活更无着落。发清欠饷，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已经成为广大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他们寄希望于俱乐部，希望俱乐部能为工人谋利，帮助工人解除痛苦。现在路矿当局要查封俱乐部，解散工人组织，等于要拆除工人的主心骨。路矿工人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恰逢粤汉铁路工人罢工风潮又起。安源工人的怨恨，对抗情绪迅速高涨，斗争要求更加强烈。大罢工如同刀出鞘，箭在弦，一触即发。

正在这形势非常紧急，敌我斗争极其尖锐，迫切需要革命形势和斗争前途有个科学的分析和全盘考虑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代表中共湘区委员会，于九月初来到了安源。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牛角坡主持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当时李立三不在安源）。会上，毛泽东介绍了全国的罢工情况，分析了形势。他指出：从目前安源的形势来看，大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要使资本家屈服，非罢工不可；为取得罢工的胜利，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争取社会的广泛同情。会议通过充分讨论，作出了组织工人罢工的决定，制定了正确的斗争策略，要求每个共产党员站在斗争的前列，带领群众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毛泽东并写信给李立三，要他速回安源领导罢工。

九月九日，李立三从礼陵赶回安源，面对路矿当局的威胁恫吓，态度坚决，表示誓死不离安源。为了加强对罢工的领导，

在罢工的前夕，中共湘区委员会将刘少奇派到安源工作。

九月十一日，俱乐部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揭露路矿当局拖欠工人工资，破坏工人俱乐部等罪行，并向路矿两局提出三项要求：一、路矿两局须呈请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二、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二百元；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七日内发清，限两日内作出圆满答复。否则，立即罢工。

十二日晚，由李立三、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具体研究和布署了罢工。会议上宣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来函。来函说：“……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的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示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的声援！”毛泽东也从长沙来信，指出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依靠工人坚强的团结和顽强的斗志。他要求党组织和工人紧密地团结，有勇有谋，坚持斗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毛泽东的来函，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的斗志。会议对罢工进行了周密的布置，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秘密策应；由刘少奇任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驻俱乐部应付一切。同时扩大工人监察队至二十人，由周怀德任队长，谢怀德任付队长，负责把守各紧要部位和四出巡逻，执行纪律，维护秩序，随时准备同敌人作公开的斗争；成立侦探队，密潜各处刺探消息，监视敌方的行动，防止敌人破坏；确定了各工作处总代表，各工作处联络员。总代表绝大部份由党员、团员担任。会议还制定了具有安源特色的、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了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为基本的战斗口号。根据这一口号拟就了罢工宣言，倾诉了工人受压迫和过着牛马般生活的事实，揭露了路矿当局勾结军阀官厅摧残工人俱乐部的行径，说明工人是死中求活，迫不得已才以罢工为最后手段，“与政治军事不发生关系”。宣言将罢工的目的归纳为三点：即改

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会议并围绕这三点提出了十七项复工条件，号召全体工友“誓以死力对待，坚持到底！”吁请各界援助。

党支部会议以后，李立三、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了俱乐部骨干分子会，传达了党支部会议的精神，布置分头串联和发动群众。李立三还亲自带着礼品去做洪帮头目的统战工作，和他们一起喝雄鸡血酒，讲工人罢工的原因，提出要他们讲义气，多帮忙，支持罢工斗争。并明确提出三条要求：一、关闭鸦片烟馆；二、收起赌摊；三、保证不发生抢劫案。洪帮头目连拍三下胸脯，当即答应，并将前两条写成告示，四处张贴。

九月十日，经路矿当局请求，萍乡县知事公署正式训令俱乐部自行停闭。恰在这时，粤汉铁路罢工风潮又起，当局惊恐万分，连忙请求李立三不要公开县署训令，并答应往官厅疏通保护俱乐部。俱乐部抓住这件事，大力宣扬，大长了工人的志气，使那些疑虑观望的工人也积极行动起来了。

九月十三日晚，俱乐部召开全体部员大会和各工作处代表会议，对罢工的准备工作作了最后检查和部署。为着预防不测，当即将俱乐部的文件和办事机构全部转移到秘密地点，并商定利用凌晨换班的有利时机开始罢工。

午夜，萍乡县署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仍未到，路矿当局对俱乐部提出的三项要求亦未答复。九月十四日零点，罢工指挥部发出罢工命令。震动全国的安源煤矿、株萍铁路一万三千多工人的大罢工爆发了。

凌晨两点，铁路工人停开了开往株洲的元次列车，鸣放气笛，发出罢工信号。三时，煤矿工人砍断电线，通知井下工人罢工。工人监察队在井口竖起“罢工”二字的大旗，把守着各要害部门，堵住通道，只准出，不准进，严防坏人趁机破坏。这时，

矿井内电车停走，马达停转，工人象潮水一般，从各个巷道汇拢，一齐涌出井口，高呼“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等口号。工人出井后，随即用煤桶、树枝堵塞井口，严加把守。矿局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均于十四日上午停止工作。隶属安源煤矿、株萍铁路的紫家冲煤矿、礼陵车站、株洲转运局等地的工人也于当日罢工。整个株萍铁路、安源煤矿除电机锅炉房和发电厂等要害部位继续工作外^③，其他各处一律停止了工作。安源各处部站有俱乐部的布告、标语和《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以及十七项复工条件。俱乐部又以“萍矿全体工人”的名义致电汉冶萍公司，宣布罢工。将罢工宣言邮寄全国各家报馆，吁请各界援助。在罢工宣言中提出要安源商会作调商解决的中间人，使绅商界人士居于中间地位。

罢工开始后，工人都按指挥部的统一布置，各归住房。各处又派出专人与俱乐部保持联系，如有事情，一呼百应。工人监察队在矿山、街市来回巡逻，维持秩序。工人侦探队到处侦察情况，防止坏人破坏。洪帮头目答应三条要求也全部实现，赌场、妓院、烟馆都关了门，商店照样营业，整个安源矿区和街市秩序空前良好。工人这种严格的纪律和战斗精神，深得了各界群众的好评，初次显示了无产阶级管理社会的卓越才能，使社会各界为之震惊，甚至奉调到安源弹压罢工的赣军旅长李鸿程也叹惜他的军队没有这样好的纪律。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得悉安源工人举行罢工，立即拍来电报，表示声援。长沙、上海、北京等地报刊都在显著位置，争先刊登了安源罢工的报导。一时，安源工人罢工的消息传遍全国，震惊中外。

罢工爆发后，路矿当局惊恐万状，一面惺惺地派代表与俱乐部接洽，要求调和；一面却用金钱收买亲友和少数后进工

人，许其下井不做工，仍然照付工资。罢工指挥部及时揭露了路矿当局破坏罢工的阴谋，提高了工人的觉悟，增强了工人的团结。总监工王鸿卿见一计未成，又以六百元银洋为偿金，密遣暗探刺杀李立三。工人得到消息，愤怒异常，声言李主任若被害，就叫路矿当局全体不得生离安源。同时俱乐部严加警卫，不让李立三单独外出。罢工第一天，就将李立三隐藏起来，并频频转移。以后李立三出面办事，除有专人保护之外，常有数百人跟随，使敌人刺杀李立三的阴谋无法得逞。十四日下午，路矿当局又勾结军阀，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由赣军旅长李鸿程亲任戒严司令，并用每个士兵两元钱一天，雇来军队，占领俱乐部和各重要工作处，安置机枪，进行威胁。工人一见武力，愈加愤慨，数千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冲入俱乐部，把军队赶了出来。同时，又极力说服士兵，唤起他们对罢工的同情。军队见工人举动文明，亦表同情，所以这次罢工未有流血事件发生。

工人俱乐部依靠工人的坚强团结和顽强斗争，挫败了敌人的种种阴谋，赢得了广泛社会同情和支持。路矿当局不得不在十五日请绅商界出面调停，并表示愿派全权代表同俱乐部代表谈判。为了应付敌人的反革命两手，李立三冒着风险，亲赴商会，参加了谈判。但路矿当局在谈判桌上仍无诚意，玩弄先开工，后谈条件的伎俩，当即遭到李立三的严辞拒绝。第一次谈判毫无结果。

十六日，路矿当局又要求俱乐部派代表去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俱乐部全权代表刘少奇前往参加。戒严司令李鸿程恐吓说：“如果继续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刘少奇毫不为动，坚定地回答：“这是万余工人的要求，虽把我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戒严司令说：“我对万余工人也有办法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刘少奇愤然说道：“那就请你下令制裁

去！”这时，外面喧声如雷，数千工人把戒严司令部围得个水泄不通，声言谁敢动刘代表一根毫毛，就把路矿当局打个片甲不留，并要刘代表出来和工人见面，要戒严司令和双方代表到工人俱乐部去谈……。”刘少奇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工人的强大威力，沉重地打击了军阀和路矿当局的嚣张气焰，戒严司令和路矿当局感到无可奈何，这才软了下来。刘少奇回到俱乐部，戒严司令立即送信到俱乐部，代表驻军向俱乐部道歉，并自愿充任调解人，请求从速解决问题。

路矿当局头目都是汉冶萍公司的职员，在安源并无资本，不同于拥有产业的资本家，他们内部本来就勾心斗角，都怕在罢工中被对方击倒。地方官厅、军政头目与工人罢工并无直接利害冲突，他们关心的是罢工中的社会秩序和工人的政治动向。而绅商界则怕罢工时间长了，商店无人光顾，影响他们的生意。路矿两局的一般工头、职员，对当局积怨甚多，对工人罢工多处中立，甚至同情。俱乐部针对这些情况，抓住各种有利条件，充分利用统治者内部各种矛盾，区别对待各种不同对象，保证了罢工斗争的顺利进行。

十七日，锅炉房烧煤告尽，面临瓦斯爆炸和水淹矿井的危险。路矿当局感到穷途末路，无计可施了，不得不答应同工人俱乐部代表磋商条件。当晚，路矿两局全权代表在调停人陈盛芳家里与俱乐部全权代表李立三讨论条件，经过一夜紧张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十三条协议。在协议中，路矿当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同意给工人增加工资，偿还欠饷，每月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二百元，取消包工头打骂工人的特权，打破了封建主义的包工制④。最后，李立三严正声明：“条件无可再让步，允则开工，不允则走开，离安源，听众工人所为。”路矿当局担心工人暴动，千数百万元的产业难以保住，只得同意签字。

十八日早晨，矿局全权代表文牍课长舒季俊，路局全权代表机务处长李义藩，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李隆郅（即李立三）在路局机务处正式签订了十三条协议。历时五日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下午，俱乐部召开万人大会，庆祝罢工取得胜利。一万三千多工人聚集在安源大操场。下午两点，数百名工人，手执各色小旗，拥着李立三等人来到会场。全场立刻掌声雷动，欢呼不止。李立三登台宣布了十三条协议，然后发表演说。他简要地总结了这次罢工的经验，号召工人准备未来的进一步的斗争。李立三演说完毕，全体三呼：“劳工万岁！”然后由李立三前导，群众随后，旗帜蔽天，爆竹震地，在安源新街、老街游行一圈，最后返回俱乐部摄影散会。当日俱乐部发表了《上工宣言》和复工通告。上工宣言指出，这次罢工胜利只是“第一次的胜利”，号召工人“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的权力去奋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得到安源工人罢工取得胜利的消息，立即来函祝贺，高度赞扬安源工人“是很有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并明确指出：“诸君这次的胜利，不是诸君终极的胜利，诸君终极的胜利在于把资本家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书记部的来函以“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响亮口号，号召和勉励工人为终极的胜利而继续努力奋斗。

这次罢工，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统治，初次显示了用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齐心协力，努力奋斗，就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敌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次罢工，迫使当局签订了十三条，改善了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争取了团体契约权，第一次使全体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与雇主相对；这次罢工，揭露

社会制度的黑暗，争取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等等；这次罢工，壮大了安源党、团组织，工人俱乐部得到迅速发展，造就了干部，涌现了大批先进分子，成立了安源党、团地委，俱乐部部员也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健全了俱乐部各级组织，并在株洲、紫家冲、湘东、礼陵建立了分部，形成了中国工运史上早期的、组织最为严密的工会；这次罢工，以它的完全胜利影响和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兴起……。正如刘少奇和朱少连在总结这次罢工的经验时所说：“这次大罢工，共计五天，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用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

大罢工胜利以后，党领导工人及时总结了经验，扩大了胜利成果。这年冬天，毛泽东来到安源，召开了干部会议，对罢工胜利后的斗争作了新的部署。他指出：我们工人阶级必须继续扩大自己的队伍，不断增强内部的团结，为实现我们工人阶级的远大目标努力奋斗。

注 释

①安源路矿两局工人总数，史料上说法不一，有说一万二千余人（《史料》85页），有说一万四千余人（《史料》536页），还有说两万的（《史料》540页）……。因路矿多系包工制，人数时减时增，加之以上几种说法均属当时报刊上的新闻报导，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或需要，不免有夸大和缩小。本文以一九二三年刘少奇、朱少连合著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为据。《略史》记载：全矿雇用工人凡一万二千余人（开大工

时，人数尚需增加)。株萍铁路工友一千一百余人。路矿两局合计工人一万三千多人。

②一九二二年三月，成立俱乐部筹备委员会时，为了使俱乐部取得合法地位，将俱乐部的宗旨定为“联络感情，交换知识”，呈萍乡县备案。七月，汉阳铁厂罢工胜利后，俱乐部将宗旨改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

③此两处属矿山要害部位，只要停工二十四小时，矿井将全部报废，经罢工指挥部研究决定，这两处不停工。

④包工制对于工人极不利。自罢工后统改为合作制，将窿工处窿外各处包工悉改为由工人合作，窿工处工头每月工资自十元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规定不改，其余各消耗归合作帐内开支，所得红利工头占百分之十五，管班占百分之五，余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这样，工人除正当工资外，还可得若干红利。于是破天荒地改包工制为合作的办法，在萍矿宣告成功。萍矿工人受包工制之痛苦已二十余年，至此始完全打破。（《史料》163页）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杨放萍

一九二二年，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同志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时，针对安源工人生活痛苦，经济上倍受资本家、商人剥削的状况，创办一所由安源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经营的商店——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轰轰烈烈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消费合作社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抵制了商人对工人的中间剥削，减轻了工人的生活痛苦，增强了工人对俱乐部的信仰，使之更紧密地团结在工人俱乐部的周围。消费合作社的创办，在我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史上是少有的。邓中夏同志所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记载：“安源工人俱乐部当时确有很多的成就，最大的为消费合作社，工人教育等……。”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成立，最初是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的七月间。当时工人俱乐部部员不多，合作社只是少数人组织的，集资伍百元，不能开门面，仅附设于工人补习学校内。贩卖的也只有少量的布匹和日用品，规模虽然不大，但那时合作社的“意义与利益，已深深印入工人的脑筋中了。”

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路矿工人在李立三、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大罢工。罢工胜利后，俱乐部组织得到迅速的发展，部员由七百人激增至一万三千余人。随着组织的发展，俱乐部负责人李立三、刘少奇深知，“要减轻工友生活负担，唯有扩充消费合作社一法。”于是，俱乐部召开代表会议，提议添加股本，扩大合作社。在工人代表会上，俱乐

部负责人将办合作社的意义解说给工人听，指出合作社不为赚钱，而是为工人服务，安源路矿工人深受奸商剥削之苦。听说俱乐部为工人办合作社，无不欢欣鼓舞！“都以自身利益所关，特别踊跃投资。”工人们除捐助旧年年终加薪（罢工胜利工人争得的利益）外，还积极认股。当时合作社股金每股为伍角（银元）工人有认一股的，也有认十数股之多的。至一九二三年，合作社已集资一万余元，加上俱乐部的拨款，共有资本近二万元。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经过改组扩充的“中国仅有的一个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开始正式营业了。”

新开办的消费合作社设有粮食、兑换、服务、器用、杂务五股，还筹备设南货、储蓄、药材等股。兑换股是专为工人兑换银元而设。过去工人兑换银元要付很高的手续费，兑换股则免费为工人兑换。粮食、服务、器用、杂务等股主要是经营油、盐、米、酱、醋、茶之类消费必需品，以及布匹、文具、日用百货等。这些货物多派专人到长沙等地采购，由株萍铁路工人带回。由于不支付运费，货物价格通常比市价便宜得多。

消费合作社的创办使安源工人免受了奸商的中间剥削。过去工资一发，市场涨价，工人毫无办法，只有忍气吞声。合作社杜绝了奸商的生财之路，因此他们想方设法排挤搞垮合作社。开始，因合作社刚营业，经验不足，对买主未加限制，奸商利用这一机会套购物资，转手倒卖，从中渔利。问题出现后，合作社很快采取了凭证购物的办法。凡是消费合作社的社员（俱乐部部员均为社员）都发给购物证，持证可购买优价物品，否则只能购买平价（市价）物品。

消费合作社为工人谋得了利益，使工人认识到俱乐部是真正为工人办事的。只有依靠俱乐部才能解除痛苦生活。而俱乐部也把消费合作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亲自兼任消费合作社的总经理。湘区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也非常重

视消费合作社的工作，不久就派了在经济管理方面有实际经验、曾经担任过长沙文化书社经理的易礼容同志和毛泽民同志来安源协助办社。易礼容来后，就由他担任合作社总经理。副经理由俱乐部刘主任、铁路工人朱少连同志担任。各股的经理分别由毛泽民、唐升起（湖南自修大学学生）、陈梅生、谭茂林（均属矿工）等担任。各股营业员十一人，大多数也是由工人担任。易礼容同志调走后，毛泽民同志继任总经理。毛泽民在任职期间，本着民主办社的精神，经常利用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之机和工作之余，深入工人之中，征求办社意见，问工人缺些什么，急需些什么，然后根据工人的要求去采购。由于消费合作社是由工人管理，工人经营，办社方向是为工人群众服务，得到了工人的热心帮助和大力支持。合作社越办越有起色，生意越做越大，不久又在安源新街增设了合作分社。一九二三年十月合作社进行结算，据统计，合作社开办半年，平均“每月约销米五百石，盐一万斤，菜油四千斤，煤油二千余斤，布匹约三千元，器用约千余元，兑换股换洋约二万元。”销售总额为七万六千九百八十元，毛利二千五百七十六元，扣除固定资产购制，实际还有盈利。合作社初办，“尚能稍有赢余，这确算难得的。”

一九二三年八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改组，消费合作社也进行了整顿，检查了开办以来存在的问题，作出了今后发展的规划。八月十三日，消费合作社总经理毛泽民同志向工人代表大会报告合作社情况时指出：“本社一切设施，均已确具规模。此后已离去开办时期而为整顿时期，本社同人自当努力将事，使社务日渐发展，使我工友应得之利益加多，以副俱乐部设立消费合作社之初心。”为加强对消费合作社的领导，俱乐部干事会作出了“以后主任团每月须去教育股及消费合作社办公数小时，而合作社及教育股诸重要会议每次必须参加”的决

议。为使消费合作社社内事务有章可循，经俱乐部主任团通过，制定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公约中对合作社总经理和各股经理的职责；对工作人员的聘、辞、奖惩；对营业时间及工作制度均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集中全社经济及整理全社帐务起见，合作社还确定设总务员（即经济保管员）一人。各股每日营业收入的银钱及帐目均交与总务员保管查核，条约的制定，对整顿和发展消费合作社的事务，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二五年九月，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勾结军阀，突然袭击，包围了俱乐部，枪杀工运领袖黄静源同志，残酷地镇压了安源工人运动。至此，消费合作社也遭到了完全的破坏。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正式营业到一九二五年九月被军阀破坏，经营了两年零七个月。时间虽然不算长，但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不仅为推动安源工人运动作出了贡献，而且为党培养了经济管理干部，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商业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朱 少 连

胡自国 刘传政

朱少连，又名汉英、孝廉，湖南省衡阳县竹花乡人，党的“三大”中央执行委员，安源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朱少连一八八七年三月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幼年入私塾读书，后来考入衡阳中学。一九一〇年考入湖北省铁路学校，一九一二年毕业。历任火车实习司机、司机，一九一八年来到株萍铁路管理局安源机务段当火车司机，一九二一年提升为路局行车部总司机。

一九二一年秋天，毛泽东来安源考察社会情形时，首先便和朱少连等路矿工人取得联系。同年冬，李立三在安源开办平民小学，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安源地方支部，朱少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二月，经李立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二年一月，李立三在安源五福巷平民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朱少连积极协助李立三工作，担任工人补习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三月，他和李立三开始筹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三月十六日开第一次筹备会议，推选为筹备主任。四月一日开第二次筹备会，即由发起人李立三、朱少连等十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立案，并请出示保护，当蒙批准出示在案。四月十六日开第三次筹备会时，部员已达三百余人，遂选举李能至（即李立三）为正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干事若干人。五月一日劳动节，俱乐部遂宣告成立。

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朱少连受党的委派，到株洲转运局开展工作。八月三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分部成立，朱少连和李立三等专程从安源赶到株洲参加成立大会，带领工人

游行示威。

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大罢工前夕，安源路矿当局对当时在俱乐部主持工作的朱少连、蒋先云等人大施恐吓手段，妄图赶走俱乐部领导人而瓦解工人俱乐部。朱少连、蒋先云等不为所动，并严正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后，朱少连协同李立三、刘少奇一道，领导了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为罢工起草宣言，带领工人挫败敌人企图用武力镇压罢工和赏六百元大洋派密探暗杀李立三的阴谋，取得了“共用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完全胜利，成为我党初期“劳工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壮举。

一九二三年十月，安源工人俱乐部进行改组，朱少连当选为俱乐部路局主任。十一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萍铁路工会和长沙泥木工会等九个革命团体，在长沙组织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十日，朱少连作为株萍铁路工会的代表出席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工团联合会的主任。接着，安源工人俱乐部、株萍铁路工会、汉阳轮驳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人俱乐部和下陆铁矿工人俱乐部联合发起组织汉冶萍总工会，安源工人俱乐部“特派代表朱少连、朱锦棠赴汉阳参与筹备事宜。”并圆满地完成筹备任务。十二月十日，汉冶萍总工会正式宣告成立。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正式开办营业，朱少连担任副总经理，领导工人与资本家奸商进行斗争，锻炼和提高产业工人管理经济的能力。

一九二三年六月，朱少连作为株萍铁路工会党的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三大”工作报告，表扬湖南（包括安源）的同志“工作的很好”。会上，他被选为党的三大中央执行委员。并作为中共中央局的驻湘委员回到安源工作。在此时期，朱少连还曾担任中共湖南

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一九二三年八月，朱少连与刘少奇合写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系统地回顾了安源工人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安源工运今后的工作任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为我们今天学习和宣传安源工人运动史留下了最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组织建筑委员会，负责俱乐部讲演厅的兴建工作，朱少连担任建筑委员会主任。在他的主持下，俱乐部讲演厅于十月十八日动工，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胜利竣工。

一九二五年九月。安源发生“九月惨案”，工人俱乐部遭到军阀的极大破坏。十月十六日，敌人将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枪杀在俱乐部前面的广场，并下令不准工人收尸。当天夜里，朱少连秘密组织三十余名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黄静源烈士的遗体抢了出来，运往礼陵八里坳，进行殓殮，举行悼念活动。

俱乐部被破坏以后，朱少连奉命到广州学习。一九二六年三月，朱少连接受党的指示，在株洲、礼陵、安源等地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工农运动。五月一日，他作为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会上作了《安源工人之奋斗》的发言，分析了安源“九月惨案”发生的原因，总结了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介绍了安源工人在“九月惨案”后的英勇斗争。并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军先遣队进入湖南，朱少连在株萍铁路沿线一带组织铁路工人秘密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迎接北伐军胜利进军。九月，北伐军从礼陵打到萍乡，十日，朱少连由礼陵来安源，恢复工人俱乐部，聚众欢迎者不下万人。大会还决定恢复安源工人俱乐部，并改名为萍矿总工会，同时成立株萍铁路总工会，朱少连担任主任。十六日，安

源工人和各界团体举行集会，纪念黄静源烈士牺牲一周年，决定建立“黄静源烈士殉难处纪念碑。”朱少连为黄静源烈士撰写了碑文，记载了黄静源烈士英勇牺牲的事迹。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朱少连代表萍矿总工会到长沙出席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向大会作了萍矿总工会的工作报告。

一九二七年五月，“马日事变”后，朱少连组织安源工人纠察队，汇同萍乡、礼陵等地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参加了郭亮、柳直荀等领导的十万农军攻打长沙的战斗。不久，受武汉国民政府“整治汉冶萍委员会”的委派，到株洲组织转运所，在此期间，朱少连在株洲建立了党的地方委员会，并担任地委的工运委员，宣传委员等职。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朱少连和安源党组织的代表李涤生一同出席了大会。

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七年九月，朱少连在株洲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举行株洲暴动，配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的秋收起义。暴动失败后，他带领剩余的工农武装，辗转于株洲、礼陵一带乡村，继续开展游击斗争。

一九二七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开展清乡反共，捕捉共产党员。萍乡、安源、礼陵、株洲等地均有重兵把守，一片白色恐怖。朱少连被迫返回衡阳老家隐居。一九二八年底，由于叛徒出卖，朱少连被骗回安源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被敌人打得全身一道道血痕，胸脯被打烂了，裤脚被撕开，脚踝骨露出在外面。但他仍然笑着鼓励同囚难友要保重身体，坚持斗争，不要背叛自己的组织，坚信革命一定能够胜利。

一九二九年一月八日，朱少连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押到萍乡大西门的一块草地上，随着一阵罪恶的枪声，子弹穿过他的头颅和胸膛。朱少连的身驱倒下了，但是他的英名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黄静源烈士传略

杨放萍 李昌学 钟丁祥

黄静源是早期杰出的工运领袖。一九二三年受中共湘区委的派遣到安源从事工人运动，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分部主任兼工人子弟学校七分校主事。一九二四年八月当选为路矿工人俱乐部付主任，以革命热情高，工作认真负责，而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因此军阀与资本家恨之入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竟籍故将黄静源同志杀害，时年仅二十五岁。解放后，当时国家付主席刘少奇曾函安源镇工会，要为黄静源烈士立碑纪念，足见黄烈士生前革命功绩，堪为社会楷模。

静源字家足，号执谦。一九〇〇年生于湖南郴县一个农民家庭，兄三、姐三，静源最小。父黄传礼勤劳忠厚。

静源小时聪明伶俐，好劳动，尤好读书，十二岁即以优异成绩考入天府中学。旋以家境困难，学费无着，即越级考入完全公费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该校设备齐全，图书充足，并且还有不少思想进步的老师和学生，这对静源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静源就读三师后，一如既往，勤勉好学，学业大进，并且品行端正，性情温和，在同学中赢得很高荣誉。有蒋先云者为三师秘密群众团体“学友互助会”的负责人，小静源两岁，但高一年级，为三师有影响的学生之一。特意结识静源，经常一起讨论学习，交换知识心得。在蒋先云的影响下，静源不再单纯埋头读书，而且开始关心社会和形势，不久也就参加了“学友

互助会。”

“学友互助会”的宗旨是提倡科学，反对盲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政，反对封建政治。这一系列的学习活动，静源扩大了眼界，增长了社会知识。他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是民不聊生和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学友互助会的小组讨论中，他提出教育救国的理论，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没有文化。要提高文化水平，就要办好教育，尤其要办好师范教育。这虽是静源同志初步不成熟的见解，也可看到他挽救危亡，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权益，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从而爆发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这场暴风雨般的运动，不久就席卷全国。湖南省在毛泽东同志创建的新民学会的主持下，更加开展得波澜壮阔。静源以兴奋的心情，通过这次运动看到了祖国的前途和希望；同时还意识到，要摆脱中国落后的面貌，想祈求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恩赐，这和祈祷上帝获得幸福是一样不可能的，必须投身到斗争的洪流中去。所以在“五四”运动中他是站在运动的前列。在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斗争中，更是奋不顾身，大声疾呼，做得有声有色。

经过几次运动的锻炼，静源更感到需要精神食粮，更需要懂得救国真理。一九二〇年八月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衡阳设分社），一时《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大量涌到。静源同志真是如饥似渴地日夜研读，以后在他的思想上又出现一次飞跃。

一九二一年三月静源和蒋先云等同志一道，以毛泽东同志创建的“新民学会”为榜样，在“学友互助会”的基础上，于湘南成立了第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秘密组织——心社。心社的宗旨是：“牺牲个人乐利，图谋群众幸福”；“结合纯正同志，谋

求社会实际改造”；“预备为世界总解决时一部份新帮助，建设新社会时做一个健全坚实的基础力量。”同时还规定每个社员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具备些什么条件。心社成立不久的三月十五日，三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心社全体社员吸收为新团员。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毛泽东同志参加党的“一大”后，回到长沙，十月下旬到衡阳考察，在三师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了解团支部工作情况和学生动态。静源亲耳听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他更加明确了革命的道理和革命的方向。这年冬天毛泽东同志在三师发展第一批党员，静源和蒋先云之外，还有雷晋乾、唐朝英等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站在红旗下宣誓的时候，心情异常激动，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湘南地区的革命运动有了核心领导。

腐败的政治是社会落后的根源。在那个时代的学校也充满了压迫、贪污和独裁。校长就是专制首领，不讲民主，任意克扣学生伙食，压抑学生进步活动。三中校长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人物。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受过革命洗礼的黄静源，当然不容许这些情况的存在，他和党内骨干唐朝英、袁痴等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压迫、反贪污、要民主和驱逐反动校长的大学潮。这次学潮因为部署周密，宣传及时，博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省学联并“为此通令”全省中等以上学校紧急罢课一天，以资声援。

运动来势凶猛，反动学校当局惊恐万分，竟勾结军阀，派兵包围学校，采取高压手段，强行开除黄静源等五十三名学生。静源同志离开学校后，毫不气馁，在校外继续指挥学潮。把开除的学生妥善安排转学后，他本人才由组织上介绍到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当教师。经过这次学潮，学校当局也有所忌惮，反动气焰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了。

一九二三年底，静源同志受中共湘区委会的派遣到安源煤

矿从事工人运动。安源是当时江南一个大矿。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后，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先后到这里开展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二月安源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五月成立了安源路（株萍铁路）矿（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成员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并建立了株洲、湘东、紫家冲、礼陵四个分部，静源担任工人俱乐部株洲分部主任兼工人子弟学校七分校（设株洲）的主事。静源以他高度饱满的革命热情，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很快就把工运搞得热火朝天，将一个开不成学的夜校，由一个班增加到两个班。一年来，他的工作成绩得到领导上的信任和工人人们的拥护。一九二四年八月安源路矿工人代表大会他当选为路矿俱乐部付主任，他登上了全路矿工运领导岗位，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有一次他到工人宿舍和工人谈话，他看到四五十个工人挤在一间只有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阴暗潮湿的房子里，吃的是猪食般的霉米饭，可是工人宿舍周围还驻着荷枪实弹，虎视眈眈的矿警。黄静源慷慨地说，资本家把我们工人当作囚犯，难道这也容忍得了吗？同时他和工人谈话又了解到，资本家籍口亏空大多，资金周转不灵，几个月没给工人发工资了。这时腊月将尽，年关即到，往年年终发夹饷^{（注）}，今年反欠几个月饷没发。工人们衣食无着，债主逼债，整个矿山，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黄静源了解到工人这种悲惨的遭遇，满腔怒火，回到俱乐部，立即邀集主任团研究对策，并慷慨陈词地说：工人们处在这种水深火热之中，如果我们负责工运的俱乐部不能出来主持正义，替工人们说话，那我们便失去了革命的立场。当决定派黄静源同志向矿当局交涉，请求发清欠饷并发给年终夹饷。第一次交涉毫无结果，矿当局态度横蛮，拒不发清欠饷，至于年终夹饷，则认为是红利性质，既无红利，根本宣布取消。

静源回到俱乐部再商对策，一致认为：资本家的本性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好言交涉，不开展斗争，不会有结果的。但还是尽量争取和平解决。于是静源一面继续和矿当局交涉并分别发出函电给当地政府和驻军以及外地工人组织，说明安矿工人艰苦的处境，以博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同时连夜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传达资本家拒发夹饷的交涉经过，并研究今后的对策。工人们本已忍无可忍了，一听传达报告，简直象火山爆发似地吼着：“和资本家拼了。”工人们这种昂扬的斗志，说明罢工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为着做到仁至义尽，静源仍旧和矿当局多次进行交涉，希望能答应工人们的合理要求，但是和第一次一样毫无所获。

事实上已无别路可走了。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黄静源同志代表俱乐部正式宣布罢工。当日上午十时，各处工人大多数停止工作，在各地总代表的带领下向各工作处处长要还欠饷。另派纠察团付团长率数千工人，将矿长、矿师、公事房团团围住。临时纠察队一千六百人，密布安源全市，维持秩序，军警驻地、主要机关、邮政、电报房，事先派人联系，说明罢工宗旨，并分别驻守部份纠察队，以防坏分子捣乱。沿途电线，全部割断，一时安源成为孤岛，路矿陷于瘫痪。如此相持两日，地方开明人士出面调停。最初矿当局还想继续顽抗，地方人士认为：欠饷不发，本来就不对，如果再僵下去，问题闹翻了，地方受到损失，矿方应负赔偿责任。矿方迫于舆情和工人们的威力，加以二十多个小时，米水未进，饥渴交迫，无可奈何，矿长答应发清欠饷，请黄静源同志说一声要工人们复工。但工人们不相信空头诺言，必须先发清饷再撤兵，如此又相持了一个时期，最后还是发清了欠饷和夹饷。黄静源同志宣布罢工胜利了，工人们欢声雷动，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泪水。

工人运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帝国主义国家，野心复炽，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更是肆无忌惮，无孔不入。工运的矛头自然而然地直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了。一九二五年“五一”劳动节和国耻纪念日“五九”（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日子）合并举行纪念，这就是把工运结合反帝的具体做法。

狂妄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为中国人民可以用刺刀驯服的。在全国合并举行“五一”、“五九”纪念以后，接连在上海和青岛两地制造枪杀工人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五月三十日上海的工人、学生举行万人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不意一鼻孔出气的英帝国主义，竟向示威群众开枪，死伤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安源后，工人们极度悲忿。黄静源同志立即组织沪案后援会，发动工人游行示威，声讨帝国主义罪行，并募集银元八百元支援死难家属。与此同时又组织工人，加强学习，使工人充分理解到，不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革命是不能成功的。黄静源就是这样以高度的革命热情，不知疲劳的工作干劲。一年多来把安源的工运，领导得健康地蓬勃发展。

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力量总是不能两立的。对安源工人力量的壮大，反动的路矿当局，吓得要死，恨得要命。一九二五年八月底，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由上海窜到汉阳，策划镇压安源工运的阴谋。九月十四日再窜到安源，这天正值安源纪念第一次大罢工胜利三周年，工人们列队游行，高呼着口号，气势昂扬。盛恩颐看在眼里，怕在心里。但是为了麻痹工人，主动发清八月份工资，以讨好工人。当时俱乐部的部份领导，对盛恩颐存有幻想，缺乏足够警惕，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九月二十一日凌晨盛恩颐勾结赣西镇守使李鸿程突然派兵两营，协同矿警，将俱乐部、工人学校、各工人宿舍，全部包围，断绝交通，如临大敌，指名逮捕黄静源同志。静源同志在俱乐部宿舍，一听

警报，立即布置其他工作同志由屋后阴沟趴走，自己则将办公室所有重要文件烧毁后，继续办公。反动军警，破门而入，一看到静源同志，便不由分说，绳索交加，捆绑起来。静源同志怒斥道：你们逮捕我是非法的，是强盗的行径。说罢昂首挺胸，大步随着军警而去。

随同这次逮捕的还有俱乐部一般干部和工人、学校教员共七十多人。工人宿舍的四千工人，见情紧迫，向外冲锋。万恶的反动当局，竟命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二人，打伤二十多人。同时宣布除发电厂、打风机房外，井下井外，一律停工，听候改组。一千二百多工人骨干，全部开除，并用武装押解出境。其余因停工而失业的工人达万人左右，啼饥号寒，惨不忍睹。

这次惨案发生后，舆论大哗，全国总工会、学联纷纷电赣西镇守使，要求严惩凶首并释放静源同志。长沙女师校长徐特立先生也联合几个学校的校长联名电盛恩颐早日释放黄同志。

恶毒的反动阶级，是不会放下屠刀的，盛恩颐看到问题已经闹大了，来一个“一不做，二不休，”连日审问黄静源同志，首先是软化拉拢，继则刑讯逼供、软硬兼施，最后于十月十六日上午将黄静源同志杀害于俱乐部操场。就义时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共产党万岁！”

愚蠢的路矿当局满以为高压可以扼杀革命，公布尸体要示众三天。那知就在当天晚上，由工人偷运出境，送往礼陵装殓入棺。三朝这一天，出现闪电式的追悼会。一会儿，工人们从四面八方俱乐部操场集合，一时爆竹轰鸣，纸钱飞舞。军警闻声赶到，一个人也不见了。只见竖着一块木牌在血迹上，上面写着“誓死为黄静源同志报仇！”

十月二十日黄静源同志灵柩由礼陵、株洲的党组织和群众运往长沙。迎接的工人、学生、群众达两万多人。二十六日在长

沙教育坪举行追悼会，由夏羲同志主持，郭亮同志致悼词。群情激昂，一致表示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奋勇前进。

一九二六年九月，仅在黄静源殉难的一多年一点的时间里，北伐军进驻了安源，军阀赶跑了，路矿工人俱乐部恢复了，二万多人开会隆重追悼我们的先烈。“黄静源烈士殉难处纪念碑”直立在俱乐部操场上。解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黄静源同志的纪念活动。纪念碑装饰得更加庄严壮丽，永远为人们所崇敬怀念。

黄静源烈士的一生是短促的，但是光荣伟大的！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他的革命精神将与世长存。

注：夹饷是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第一次大罢工时矿局与俱乐部签订条约规定的。



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

段家作

卢德铭，字邦鼎，号义新，又名继雄，四川省宜宾县双石铺狮子湾（现为自贡市郊区）人。生于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九日。

其父卢安炳，曾在自贡市“有道生”盐店为人管帐，家有二十一担租的土地。母亲黄氏，是一个封建势力压迫下的善良妇女。卢安炳有子女七人，卢德铭居幼。

卢德铭自小聪明喜动，与邻里小孩玩耍总是起带头作用。六岁即入私塾读书。塾师是他的一个叫兰凤岗的堂姐夫，因此他不十分怕老师，并常常与老师调皮。每当教过“生书”，他从老师桌前回到自己座位上时，拿着书本边走边看，一回到自己座位就把书本往抽屉里一扔，老师问他为啥不读了，他说已经背得了，老师不信，就叫他背诵，果然能一字不错地背诵出来。

一九一九年，卢德铭十四岁了，就在这年春天，他考进了宜宾县属的白花镇高小。一九二一年高小毕业，考入成都公学。

成都公学设中学部和高中部，四二分段，中学部学四年，高中部文理分科学二年。卢德铭在中学部的第二班。他学习刻苦用功，成绩优异；热心运动，爱踢足球；生活清寒，节俭朴素。宜宾在成都的人组织了宜宾同乡会，但卢德铭不参加同乡会，也劝别的同学不要参加。他说同乡会里闹派别，常常闹事打架，没有意思。他平时少开腔，但经常评论是非，讲话很负责任，很有说服力。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四川省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砸

了四川省参议会，并打了议长熊晓岩和砸了他的家。熊晓岩当时还兼成都公学的校长。熊被打后，成都公学高中部，特别是文科的学生，鼓动全校同学抗议省学联，说是打了我们的校长。而中学部多数同学不同意，以卢德铭为首提出反对意见，他说：“省学联打的是熊晓岩议长，不是熊晓岩校长。砸省参议会和省学联的决议，我们学校有代表参加省学联，同意了，现在不能出尔反尔。”经卢德铭这样一讲，一时大多数同学退出了会场，打消了一部份人策动的“抗议”。这一年还有一件事，成都公学的教务长严公寅被委任省立一中的校长，遭到一中全体同学的反对，一中有的学生集伙殴打了严公寅。成都公学高中部文科的王良相等，亦鼓动同学对严公寅进行声援。卢德铭说：“严公寅不是作我校教务长挨打的，我们没有理由去支援他。何况我们都是学生，我们应站在全体学生一起。”这样，也把他们的“声援”吹散了。因此，卢德铭在同学中很有威望，颇得进步老师和同学的赞赏。

在成都公学期间，卢德铭受到“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的影响，阅读了《新青年》、《洪水》和《马克思传》、《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对封建军阀连年混战，强烈不满。那时，四川军阀派系很多，为了争夺地盘，经常混战，每到一处，烧、杀、抢、掠，奸淫无道。成都有个少成公园，军阀在少成公园里打起来，连喝茶的老百姓也被打死了。卢德铭看到这些，愤慨地对身边的同学说：“你看，这些家伙无法无天，能让他们继续下去吗！”为了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卢德铭对同学说：“要有实力，要学军事。”他还对长兄卢德丰说：“要学武，手里要有武器才行”，“大哥，我看还是要自己的武力，自己有了枪，事情就好办了，象你学文，文质彬彬的，总得受人指挥，我瞧不起学文。”

一九二三年冬，卢德铭得知广东黄埔军官学校招生，寒假回到家中便向父亲提出要去报考军校。但父亲不愿他去。他请本乡与父亲相好的老同盟会员李铭忠说服了父亲，于一九二四年春，偕同刘丕绩、刘文波等赴广东报考黄埔军校。离家前夕，正值过春节，他在房门上写了一副春联：“问客何来想是仙风吹到，留君不住须当明月照归。”

因路途遥远，中途耽搁的时间较长，等卢德铭到达广州时，黄埔军校考期已过，在这进退两难之时，他认识了四川同乡谢惠生、卢思蒂、石清扬等人，经他们介绍，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问他的学历，他说初中还没有毕业，孙中山说：

“我们收的是中学毕业生，你的学历不够。”卢德铭说：“学历不够，我会自学；”“年不够，我会长。”孙中山见他对答机灵，便出一作文题叫他做，不久交了卷。孙中山见他文章写得好，疑心他曾做过此题，便又出一题，不久他又做成了。孙中山看过这两篇作文，见他确有才华，立即写一手条给校长蒋介石破格准他入学，编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兵队学习。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卢德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二月，在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战役中，担任黄埔学生侦探队长，带领六十多名学生参战。一九二五年九月，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毕业，卢德铭留校任政治部组织科员。这时，他给家中写信说：因归期不定，请父母将颜家婚事退掉，如颜氏不允，则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卢德铭忙于革命工作，一直未能回家结婚，其未婚妻颜瑞琴等到一九三五年即卢德铭牺牲后八年才嫁，时已二十八岁。

一九二五年八月，在廖仲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广东省长，黄埔军校党代表）被国民党右派谋害后，卢德铭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声讨国民党右派，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军校广大同学的好评。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叶挺独立团（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广东肇庆成立，卢德铭调任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根据党的指示，在广东西江高要县一带，反击地主武装，帮助开展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五年月一日，独立团担任北伐军先锋，从广东肇庆、新会出发向湖南挺进。部队到达广州时，周恩来在司后街（现越华路）叶挺家里，召集全团连以上的党员干部开会，代表党组织给独立团作了指示。卢德铭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行军途中，将周恩来的指示向干部、战士作了传达，鼓舞了部队的斗志。

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独立团进入湖南永兴县。当时刚被广东国民政府收编为第八军的唐生智部队，在安仁附近遭到敌军进攻，如果安仁失守，势必瓦解唐生智的部队，失陷湘南，切断湖南与广东的通道，使广东受到威胁。唐生智急电独立团增援安仁。六月三日，独立团强行军赶到安仁县城，这时敌人正在进攻安仁北边的碌田。叶挺派独立团二营增援碌田唐生智的三十九团二营王东原部。部队到达碌田时，王东原部已撤退，独立团二营即固守碌田。卢德铭带领的四连，在固守战斗中，打得坚定顽强，打垮了敌人，并消灭了敌人一部。敌人北逃攸县，卢德铭未得命令主动带领四连乘机追击敌人，直至攸县城河南岸。此事深得叶挺的称赞。叶挺在干部会议上说：“战功是大家努力得来的，我们的每次战斗，都是得力于你们。比如攸县的占领，就是第四连连长卢德铭指挥的，他替我指挥你们。”

独立团占领攸县后，派出人员分赴长沙、株洲、萍乡等地侦察。七月十日占领了礼陵，十一日长沙工人和郊区农民占领了长沙，迎接北伐军进城。长沙、株洲、安源、礼陵、萍乡的工人、农民大力支援了北伐。

当独立团挺进到长沙、浏阳后，湖南方面的敌人集中于汨

罗、平江一线，构筑坚固工事，以重兵防守。八月十九日独立团占领了平江，在攻克平江县城的战斗中，守敌很顽固，卢德铭率领四连，绕道敌人背后，造成夹攻之势，消灭了敌人。八月二十五日在攻占湖北的中伙铺时，卢德铭带领战士，截断了敌人的铁路运输。八月二十七日打下了汀泗桥，八月三十一日打下了贺胜桥，在这两个著名的战斗中，卢德铭指挥果断，身先士卒，勇敢顽强。九月五日开始攻打武昌城，战斗特别艰巨，几次攻城未克，改为围困。十月一日敌人组织“敢死队”三千多人，突然从通湘门冲出。卢德铭率部英勇阻击，打退了敌人。十月十日攻破了武昌城。在围攻武昌城的战斗中，一营营长曹渊，身负重伤，卢德铭赶去扶着曹渊。曹渊对卢德铭说：“德铭，我已无救了，你不要管我，为了革命你带着同志们冲啊！……”卢德铭派战士将曹渊背下火线，曹即牺牲了。曹渊牺牲后，卢德铭升任了营长。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叶挺升任二十四师师长，独立团改为七十三团，卢德铭任团参谋长。

攻克武昌，独立团牺牲了三百多人，后来把烈士尸骨集中在一起，葬在洪山。这三百多烈士，只了解到一百九十多人的姓名，还有一百多人的姓名不知道。为了表彰烈士们的革命献身精神，墓碑上刻写了已知的烈士英名和“无产阶级的牺牲者”八个大字。为了写这八个字，经过了一场斗争。第三营营长张伯簧等部份人，以国共合作为由反对写“无产阶级”几个字。卢德铭坚决主张写“无产阶级的牺牲者”这八个字，他说：“我们的独立团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们在碑上刻‘无产阶级的牺牲者’，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士的无比英勇昭示于国人之前，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领导权的大旗在雄伟的武汉洪山上高高地竖立起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达到最后胜利。谁反对写这几个字，谁就是不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要革命的领导权，就是不要革命。”经他这样一讲，原

来坚持反对意见的人改变了立场，都赞成写这八个字。

对于攻克武昌城和北伐战争中群众支援的情况，卢德铭在家信中有这样的叙述：“武昌城墙坚固，我们围攻了四十余天，组织了几次爬城都未成功，至十月十日，我们终于打进了武昌城。由于我们作战勇敢，两湖人民给我们一个光荣的称号——铁军。我们这次北伐有这样的顺利，全靠群众的支持，自广州出发后，沿途都有老百姓给我们当向导，并自动给我们搬运子弹等。”他在信中希望大哥卢德丰去武汉参加革命。他大哥接信后，离家前往，行至重庆，因战事道路难行，乃回身返里。

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鄂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部，在沙市叛变，进至武昌附近的纸坊。卢德铭随叶挺参加了讨伐夏斗寅的战役，打退了叛军的进攻，平定了这次叛乱。

一九二七年六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即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我党派卢德铭担任该团团团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想要同乡——广东人担任此职，因此开始未同意。后由张云逸（当时任第二方面军参谋处长，广东人，中共党员）向张发奎推荐，张发奎才同意。

卢德铭出任警卫团团团长时，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长聂荣臻与卢德铭谈了话，传达了党的指示。

卢德铭担任警卫团团团长后，利用这一地位，吸收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左派到警卫团来。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马日”事变后，镇压工农运动，屠杀革命干部，许多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领导干部，如：宛希先、何挺颖、何长工、熊寿琪、张平化，等按照党的指示都来到警卫团，组织了一个干部连。卢德铭对这些同志非常关心，经常与他们谈话，征求意见，注意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六月下旬，卢德铭在全团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说明这个团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部队，队伍要扩编。

除原有的三个营外，要增加新兵营，要派人到湖南去招兵；要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加强团结；同时，要加强训练，提高军事技术。他对部队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经常说：我是当团长的，我一定把这个团带好，训练好，管理好，上下团结得象一个人。他召集士兵讲话，说：“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也就是你们的生命。”他说到做到，言行一致，和战士亲密无间。他在战士中，看不出谁是团长，谁是士兵。当时部队的团长有小灶，可是警卫团却没有小灶，卢德铭和其他几个团一级干部，吃的与士兵一个样。他有马，但经常不骑马，让给伤兵和体弱的人骑，或用来驮东西。因此，他与士兵的关系很好，大家都尊敬他，齐心听他指挥。

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卫步蒋介石的后尘，在武汉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由于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而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领导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了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

八月一日深夜，卢德铭先后接到两个电报，一封是从南昌发来的没有署名，告诉警卫团南昌起义了，后来才知道这个电报是参加南昌起义的周逸群发来的；另一封是张发奎从九江发来的，命令警卫团星夜出发，到九江待命。卢接到电报后，即找团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俊研究，决定：一、坚决响应南昌起义，不回张发奎的电报，利用张发奎命令调动的机会把队伍开赴南昌；二、陆路步行太慢，决定乘船到阳新县黄颡口，经武宁、涂家埠到南昌；三、全团四个营的营长，两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思想进步的人，只有第四营营长是张发奎的人，决定以四营要接新兵为理由，把它留武汉，带一、二、三营走，同时把暂时归警卫

团领导的张发奎的宪兵营一起带走，宪兵营的武器装备较好。

八月二日，卢德铭率领全团二千余人，乘船东下，至黄颡口登陆。部队沿武宁、靖安向南昌进发，到达奉新县后，侦察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张发奎的部队占领了南昌，并派两个团来堵截警卫团。卢德铭召集团的领导干部研究，决定到高安一带待机行事。在高安住了一个多星期，卢德铭考虑到与南昌起义部队相隔太远，追赶不及，决定改变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的计划，到湘鄂赣三省交界（所谓“三不管”）的修水、铜鼓，一面休整，扩充部队；一面筹备钱粮。同时与江西、湖南党组织联系，确定今后的发展方向。

部队到达修水后，与湖南省委取得了联系，湖南省委派人来部队，指示部队仍留原地，按原计划进行活动。部队经过武宁时，遇到了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农军，便相约同行。原来，平江农军与浏阳农民一起接受党的指示，合编为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独立团。因南昌起义部队南下，赴南昌未成，平江农军便与警卫团同至修水，浏阳农军进驻铜鼓，警卫团通过平江农军与驻铜鼓的浏阳农军取得了联系。进驻修水不久，得知该县桃树港有一支由鄂南开来的通城、崇阳的农民武装，由罗荣桓率领。卢德铭即派人将他们接到修水县城，编为警卫团的特务连。由于兵力很快得到扩充，警卫团积极筹备扩建成一个师。八月下旬，警卫团、平江、浏阳农军等单位的负责人，在修水的山口镇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把这几支武装力量合组为一个师。这时，湖南省委领导人夏曦要卢德铭和辛焕文、韩浚三个团的领导人离开警卫团，经武汉、上海到正转战福建、广东交界一带的南昌起义部队去工作。理由是：南昌起义部队战事很多，缺少有作战经验的干部，要他们去参加指挥战斗。卢德铭不愿离开这个团，但湖南省委派人催促，说部队不是个人的，应当服从组织。卢德铭只好服从，遂将部队交一营营长余

洒度负责。因此，山口镇会议决定由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到秋收起义时，就以这个师为基础，加上安源工人的武装，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以警卫团为一团，浏阳农军为三团，平江农军分别补进这两个团，安源工人武装为二团。

卢德铭离开部队时，召集部队讲话。他说：我们走是为革命而走，是服从革命的需要；部队是革命的基础，一定要保存这支革命力量，继续扩大这支力量；今后，一切听从党的命令，党的指挥，大家一定要搞好团结，齐心对付敌人。讲完话后，卢德铭、辛焕文、韩浚三人换了便衣出发，部队干部和战士一直送了五、六里路。卢德铭一步一回头，一步一滴泪，恋恋不舍自己的部队。

卢德铭和辛焕文、韩浚经长沙返回武汉后，找到了当时留在武汉的党的领导人向警予，将离开部队的情况向她作了汇报。向警予将他们的情况提交组织研究后，第二天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准备秋收暴动的计划，坚决否定了调他们去南昌起义部队的错误主张，指示他们速返修水，带领部队，参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并指示他们，把湖南、湖北两省的农民武装集中起来，扩充部队，组织一个指挥部，由卢德铭任总指挥。还给了他们六个干部，三千元活动经费。卢德铭等三人接受党的指示后，即由武汉乘火车至赵李桥，经通城返修水。当时敌人搜查很严，卢、辛、韩三人各带二名干部和一千元活动经费一路先后分行，至大沙坪时，遇地方民团阻击，辛焕文牺牲，韩浚被俘，卢德铭由当地农会干部护送回到修水后，便和毛泽东取得了联系。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毛泽东为首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爆发了，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九月九日，他在修水县渣津向部队授旗，宣布秋收

起义，指挥部队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大军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当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和起义部队已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提出改变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和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正确主张。会中余洒度顽固地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卢德铭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意见，批判了余洒度的错误。他说：“毛委员的意见，我完全赞成。这是个英明的决策。现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打我们，这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我们再去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虽然是一个战略撤退，但有光明的前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向反动派展开更有力的进攻。”由于卢德铭是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的意见对会议统一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九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在卢德铭的陪同下，来到里仁学校操场，动员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毛泽东讲完话后，即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是夜部队宿营萍乡桐木，二十一日宿营萍乡小枧，二十二日到芦溪镇宿营。二十三日清晨，从芦溪出发，毛泽东和卢德铭率领的指挥部随一团在前，三团在后，左右两路隔沿河上行。部队从宿营地出发不久，江西军阀朱培德部的江保定特务营和江西第四保安团（又称“四大队”）便从萍乡赶来尾随追击。至离芦溪镇十五华里的山口岩，部队与敌接火。由于敌数路夹击，且占领河边的白泥坳山头，控制了起义部队过河和继续前进的道路，至使走在后面的部队前进受阻，同时仓促应战，部队损失很大。在这危急时刻，卢德铭挺身而出，率领一个连的兵力，返回到山口岩，夺下白泥坳山头，阻击敌人，掩护后续部队转移。后续部队全部

转移进山后，卢德铭率领连队从白泥坳撤下来，通过一片开阔地和油茶林进山与前面部队汇合，这时敌人又占领了白泥坳，居高临下向撤离的指战员射击。卢德铭骑着白马，目标较大，不幸中弹牺牲。敌人走掉后，当地群众将卢德铭以及同时牺牲的其他四十多个同志的尸体，就地埋葬。

卢德铭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作战英勇，临危不惧，指挥坚定果断；他谦虚谨慎，尊重领导，团结干部，关心士兵，与战士同甘共苦；他平易近人，和颜悦色，不以官压人，训人，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干部战士都愿接近他；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积极完成党的任务，坚定地跟随毛泽东进军井冈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在北伐中，在组建警卫团和秋收起义中，在进军井冈山实现中国革命战略的伟大转折中，都是有重要贡献的。他的英勇牺牲，是值得我们子孙后代永远怀念的。



李寿铨与安源煤矿

李为扬

编者按：李寿铨，字镜澄，江苏扬州人。同盟会会员，南社社员，于清光绪维新时，从事安源煤矿开发工作。筹备期间，任机矿处长；建矿完成，任会办。辛亥革命后，被全矿员工推举为矿长，直至一九二四年告老辞职返扬。计在矿近三十年，为安源煤矿主要负责人。他擅诗文，工书法，撰有《药石轩日记》、《药石轩诗稿》、《药石轩知行录》，以及《萍矿说略》等多种著作；并遗存大量有关安源煤矿的可贵史料。惜绝大部分毁于十年浩劫。本文作者系李寿铨之子，原在安源出生，八〇年曾应安源纪念馆邀请，前往参与校勘鉴别史料工作。为了保存吾乡人物史志，庶免湮没；特由作者依据目前仅有资料，并佐以回忆，撰写此文。

（一）大桥出生和扬城执教

李寿铨的父亲叫李慎保。祖籍原是山西闻喜。当宋末元初的动乱年代，其始祖名李天爵的，可能因逃难或者移民关系，从闻喜迁至江苏丹徒定居。由李天爵十七传至李慎保，正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清朝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像两把钳子一样，紧紧包围着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咸丰六年（1856）

到咸丰十年(1860)的五年间，太平天国屡次攻破江北、江南大营。一面是围而复破，一面是破而复围，大江南北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其间，太平天国曾三次进军扬州，旋因兵单不守，又三次撤退。年轻的李慎保夫妇，便在兵荒马乱中由丹徒过江到大桥镇岳家避难。咸丰九年十一月十七日(1859年12月10日)，李寿铨便诞生在扬州大桥镇外祖陈家。次年四月，年方二十岁的李慎保由大桥镇渡江前往常州访友，正遇忠王李秀成攻克常州，他便在这次战役中失踪，从此杳无音信。后来李寿铨便把常州城破之日，作为他父亲的忌辰，并将李慎保遗著《金沙纪事诗》二十首珍藏起来，请当时友好多人题跋。其中吉亮工①的题词是：“有诗未成帙，胡为死于贼？②有子未成立，胡为死于贼？呜呼公死如不死！公有诗，公有子。”

可以说，李寿铨自出生以来，就失去了父亲。外祖家经济也颇拮据，他便在母亲一手抚育下成长。在他六岁那一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江苏一带恢复了安定生活。他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就靠他母亲做些女工活计和纺织等维持生活。他母亲是一位贤良正直的妇女，勤俭持家，粗通文墨，要求严格，教子有方。在母亲的教育和熏陶下，他秉性刚正不阿，刻苦勤奋读书，尚侠好义，嫉恶如仇，常为乡里排难解纷。以致淡泊仕途，寻找拯救国弱民贫的道路。到后来清廉自守，性甘恬淡，都是与幼年时代的生活和教养分不开的。他后来为了纪念母训，有一首诗曾这样写道：

“髫龄曾几时，倏忽五十余。念我始束发，吾母授我书。篝灯夜课读，书声机声具。过目辄成诵，吾母心为愉。鞠我爱我慧，责我怜我孤。读罢谈往事，母子涕涟洳。弱冠驰文坛，神骏飞声誉。纷难出排解，直声动里闾。慈训为加严，勖我砥廉隅。及今数十年，如冰在玉壶。小德或出入，大闲不敢逾。我今教子孙，益叹母氏劬。一一守家法，勤俭为规模。惜哉世道

衰，奢惰趋时趋，今日少年人，不复如当初。世态纵万变，我仍安我愚。愿我子若孙，事事效法余。吾母有往训，庶几其宝诸。继继复绳绳，吾母心当娱。”

《春晨放歌》中也有几句是：“我亦自得何所求，不愿身封万户侯；不愿万倾营田畴。但得随处筑屋如小舟，宅可泛兮家可浮。”③

由于他勤奋好学和天资聪敏，他的阅历修养和文学造诣，深得当道的赏识，便被吸收到扬州安定和梅花两书院任教授。他在三十岁前后这一段时期，主要是和文字打交道。如改试卷，监考场，写文章刻印，授童生等。平日也替亲友书写匾额、横幅、对联、扇面等，从而在文学和书法上也有了进一步地提高。

这时已到光绪年间，欧风东渐，积弱图强，纷纷引进西方技术，兴办邮电、铁路、银行、矿山诸端。先是军事工业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马尾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接着又出现了民用工业如交通运输的上海招商局和开平煤矿④等。光绪廿二年（1893）湖广总督张之洞因兴办湖北汉阳铁厂⑤，久无成效，便委托铁路总公司大臣盛宣怀⑥负责招商承办。盛宣怀便计划将已勘测到的湖北大冶之铁⑦、江西萍乡之煤⑧、为汉厂服务，合组为一联合企业，以萍煤冶铁炼钢于汉阳，这样就可以就近直接解决原料和运输的问题。方针决定以后，便委任张赞宸⑨负责开发萍乡煤矿。张赞宸接受了任务，首要是延揽人才。经过友人的推荐，李寿铨便和张赞宸在上海会见。由于振兴实业，彼此志同道合；他们畅谈之下，真是一见如故，深感相见恨晚。从此李寿铨便被张赞宸倚为左右手，并肩战斗在安源土地上。在工作中两人推诚相与，倾心置腹，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他在后来一次写给友人⑩的信中曾提到这一段友谊时说：“铨本无才，谬襄矿务，自问毫无把握。幸承敝总办⑪指授机宜，信任专一，乃得竭愚公之愚，矢精卫之精，勉从诸同

事之后，厕身实业，希附末光。”他在远赴江西前夕，在姜埕镇赋《茶亭远眺》一首，抒发了他胸中的抱负。

“极目平原望，青青一色齐。几人哀笠小，四合水云低。树远风难动，松高雾不迷。我今临此地，阡陌畅东西。”

前四句由写景而看到未来，前途无限开阔。五六句表明他此去安源，坚强的意志，不为一切困难所动摇，廉洁的操守，不为一切尘垢所污染。七八句表明要发挥才能，决心把实业办成。务期萍煤和冶铁一道，盈充畅达，左右逢源。

（二）安源建矿

安源，当时是江西省袁州府萍乡县治东南十四里的一个山村。荆榛满地，茅屋数椽，荒草萋迷，岚烟四锁。远在唐、宋时代，萍乡境内就发现了煤源，已有九百年的历史。后来逐渐多处有煤露出地面，当地居民，俯拾即得。到清朝初年，小规模土窿开始出现，也不过是利用原始工具——土镐之类进行小型开采。当一旦挖到水时，只得被迫停止，于是放弃旧窿，另开新窿。因此难以持久，往往作息无常，不可能正常生产。像这样开采，深度即浅，效率又低。经过两百年来，只见土窿遍地，商井如林，密如蜂房，漫无秩序。有的相距不过几丈路远，两家就各开一井。而这些小商小井，又大多依附于几家巨绅，仰仗他们的庇护。等到彼此将土窿挖穿，或发生淹水，熏烟等纠纷，就时常引起聚众械斗，甚至酿成巨案。由于土商资本微弱，无法挖到深处，很难达到最好煤层^⑫；再加上闭关锁国的影响，内地居民乃至大部分官吏，都非常守旧排外，不可能做到借助外籍矿师覆勘，运进外洋机器，采用西法开采。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阻碍了资源开发和有效利用。

光绪廿三年（1897）秋，张赞宸偕李寿铨及德国矿师赖

伦^⑬等，问道赴萍，跋涉入山，进行实地考察。他们携带乾粮，披荆斩棘，栉风沐雨，跑遍深山密林；尽访窿区，逐井考核。历时数月，对萍乡产煤地区作了全面地调查和深入地了解。认识到：

（一）萍乡县境东南一带为产煤之区。比较大的山主，有紫家冲文姓，黄家源张姓、钟姓、黄姓，双凤冲甘姓，天滋山彭姓，锡坑周姓，高坑欧阳姓，安源贾姓等。城北太平山则有许姓等。有的一个山主在其它山区也有领地。如钟姓不仅在黄家源善竹岭有大片山地，并且在龙家冲、张公塘和高坑水窝里也有山地。而这些用土法采煤的商井，有时也由山主自开，但大多是商人向山主付纳租金，租山开业，打井挖窿。各商井均有牌号，如太和、万盛、全利等。许多商井又往往联合成一较大的商号，便于对外营业，如和茂福商号、同荣福商号、合和福商号等。当湖北汉阳铁厂开办以后，就由一个叫广泰福商号的承包汉厂焦炭。原来萍乡当时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文廷式^⑭，他原是光绪皇帝宠爱的珍妃的师傅，因为得罪了慈禧太后被革职回乡。文家本是萍乡望族^⑮，就由文廷式的族兄负责组织了广泰福商号，珍妃的哥哥志锐^⑯便是其重要经济支柱。但经过调查了解，广泰福实际是由文、张、钟、彭几家控制的商井临时拼凑起来的。虽由文家出面承包，但对其余各家并无约束力量。而内部则矛盾重重，彼此门户之见很深。有时各井商意见分歧，形成南辕北辙，文家则碍于情面，竟然无可如何。可以说，内部组织异常涣散。所以广泰福尽管在和汉阳铁厂签订的合同中，规定了焦炭成份、价格、运量等项，由于以上原因，实际形同具文，从来没有好好照约履行，因此直接影响着汉厂的煤源供应。

（二）萍乡一带，丛山峻岭，交通梗阻。历年厂商对外运出煤焦，都靠水道。总是由萍溪起运，经淥江转入湘江到湘

潭，再转载到汉阳，水道极其迂回漫长。而且上流赖小河运输，全靠天时。一遇天旱，溪河枯涸，就无法行舟。若逢春季发水，淫雨成灾时，较深土窿，几乎全遭水淹。土窿原来就已漫无秩序，等到大水才退，到处还是泥泞没胫，窿工们为了生计，彼此横冲直撞，互争煤路，到处掀起纠纷。一言不合，动辄可以聚众，发生械斗，经常闹得乌烟瘴气。这样落后的运输系统，也大大阻碍了运量的顺利完成。

（三）从萍乡县境东南一带采煤各山，沿线逐井，进行考验，确是脉旺质佳^⑰，蕴藏丰富，非沿江各处煤矿所能比拟。再就小坑、紫家冲、安源、黄家源、龙家冲、高坑等处，反复比较，其中以安源^⑱地当平原和丛山交接之处，是最理想的建矿基地。

他们经过调查了解，鉴于广泰福商号的组织力量薄弱和运输条件落后，既不能适应汉阳铁厂的需要，担负源源运济焦炭的任务，又使丰富矿藏委弃于地，得不到充分利用。惟有改弦易辙，采用西法，运用机器，大举开采，才能达到兴办实业的目的。并提出了筹巨款，修轨道，造浅水轮驳，设官钱号，派兵筹防等设想。这次考察报告迅速得到盛宣怀的赞可，当即会同张之洞奏明清廷奉准开办萍乡煤矿。同时，广泰福亦以商力匮乏，土法浅鲜，运道纡滞，难以为继，请求给予优惠价格，自愿将所经营的一切业务全部转让。从而于光绪廿三年冬收并了该商号设于紫家冲等处同顺等七厂十八井，作为建矿基础。

那时开平是全国最早用西法开采的煤矿，而湖南省是最早办矿的省份，所以建矿的法律根据便是“湖南矿务奏定章程”和“开平成例”。内容是：“遇有大矿用机器开采者，依脉十里内，无论何人之业，均不得另开窿口。其小矿用人力开采者（指土法开采之窿），依脉三里内，无论何人之业，均不

得另开窿口。均要指定一窿起算，不得游移。并禁止商人别立公司及多开小窿，抬价收买。”

光绪廿四年戊戌三月初一日（1898年3月22日）是萍乡煤矿成立纪念日。由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盛宣怀颁发关防印信，以昭信守。文曰：“萍乡等处煤矿总局”八个大字^{①9}。所以便简称为“萍乡煤矿”；因矿址在安源地方，所以又素称为“安源煤矿”。矿局成立，张赞宸任总办，下设三大处，进行建矿事宜。李寿铨任机矿处长，杨绍椿任煤务处长，刘文炯任材料处长。另外在宋家坊设转运栈，由薛宜琳任栈长。并聘请文廷式以地方首绅地位，协同照料。从此由光绪廿四年起至光绪卅三年（1907）建矿完成止，历时九年，张赞宸经常奔走沪汉一带，处理筹款、交涉、联系工作等大政；而建矿工程的全部领导工作，就由李寿铨常川坐镇安源，一肩承担。他在此期间，经常披星戴月，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席不暇暖，真是惨淡经营，艰苦备尝。所以后来盛宣怀有“萍乡李寿铨为该矿创始之人，熟悉地方情形”^{②0}之评语。

萍乡煤矿系引进德国技术进行开采。向德国礼和洋行^{②1}借款四百万马克^{②2}，其中以三百万马克购买机器物料，派德员福克驻德采办，另一百万马克扩建工程。聘赖伦为总矿师，以三年为一期订合同，先后延聘德籍工程人员史密特等多人^{②3}，协助进行。

当时安源地方，共分六区，俗称六境。经过二百年来用土法采煤，废窿新窿，触目皆是。既然实行机器开采，如果近矿窿多，势将穿乱槽路，危害工程的进行，必须有步骤地买尽各山土井。因此根据已颁矿章，矿局首先租定安源境内的山场，进行查井工作。把逼近机矿的商井，先用优价收回。近矿一带，不准另挖窿口。对于废窿，给以适当的津贴，禁止续开。凡因办矿而损坏了的田园、屋宇乃至树木，都分别定价，

由矿赔偿。并约定在机矿开办以后，对于六境居民，永远以廉价售给烧煤，以示优待。这些措施，都照顾到地方人民的利益，大有利于机矿的进行。

光绪廿四年（1898）夏五月，矿局就先后在安源地方购买的宋家山、桐梓坡、大冲尾、蟹形咀、罗家坡、栎树下等处一千七百余亩地段，择期兴工，开始建矿。六月，萍乡县知事顾家相出告示，保护机矿进行。根据矿务章程并结合萍乡本地具体情况，规定：在观仙、观清、观崇之一二图^②境内，在五月建矿以前，既经开挖民窿，应准照原开挖；在五月建矿以后，不准另开新窿，已停已废各窿，要全部封闭。愿意出售的当酌给优价。并列出名单，准开复顺等十四井，禁开全裕等十六处废井。

对于其它商井多家，虽距矿稍远，但煤质极佳，合炼焦炭之用，乃于光绪廿五年（1899）二月，由矿局帮他们组成“保合公庄”。遴选士绅，负责经理，办理调查、登记、管理等事宜。并且将他们所出产的焦炭，按照化验结果，根据灰磷轻重，分别定价，由矿局统一收购。“保合公庄”成立后，矿局派卢洪昶会同保甲局长王化行和公庄员董，根据矿章，进行了一次安源机矿十里四至的查勘工作，初步调查了矿区的范围。计：东至观化乡清江里二图，毗连名惠乡三保二图，地名张公塘尾赖姓屋后之山岭为界。过岭即千步墩。东偏南至长丰乡二保一图，地名黄家源钟能公祠门首河为界。南偏东至长丰乡五保一图，地名紫家冲之横冲山为界。南至长丰乡七保一图，地名双凤冲新桥苏家屋后之杉木岭为界。南偏西至观化乡仙桂里一图，地名五陂下牛屎岩，亦名大罗坪之笔山岭为界。西至钦凤乡、萍城大西门外教场坪为界。西偏北至观化乡仙桂里二图下冲杨姓门首为界。北至观化乡清江里三图，地名白源之荷田坳为界。北偏东至观化乡清江里二图过云居埠之乱石岭为界。

光绪廿六年（1900）是有名的庚子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抗击帝国主义，各地会党相率响应，人心极为浮动。因此市面上银根奇紧，销场不旺。受到这种不景气的影响，土窿商井，难以维持，纷纷请求归并。光绪廿九年（1903）七月，“保合公庄”以文国华、黄士霖等三十人^⑤为代表，经过公议，认为要挽救危机，只有请求归并，才能解除困厄。并经过再三要求，最后矿局同意，以廿余万元代价，收并了天滋山等处发顺等卅二井。并在几个重点如紫家冲等处留出通顺等十三井，供民用烧煤。

九月，矿局派查井委员俞燮堃，会同萍乡县所派委员王存忠、萍绅公庄首士黄显章进行了全矿收并商井后第一次普查工作。共计收并商井276口。以后逐年都还有其它商井请求归并。

矿局非常注意防范外权暗侵。鉴于光绪廿三年湖南就出现过洋人勾结奸商私买矿山之事；已往萍乡也有过一个教民名刘美才的，曾经勾结法国教士串买龙家冲的商井。所以在安源建矿开始以后，听说还有人暗中勾结日本商人，打算在萍乡合资开矿，正在秘密进行中；张赞宸闻讯，立即驰赴汉口，向日本领事严重交涉，对方终于不得不销毁契约，使阴谋未能得逞。还有在前后归并商井过程中，有一个叫和茂福商号的，他原在紫家冲开了一个钰盛井，在小坑开了一个玉和井，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并在长沙、湘潭、醴陵等处，开设字号售煤。实际资金内主要是湘潭天主教堂的股本。和茂福看到境内商井纷纷请求归并，又知道钰盛、玉和两处正当机矿冲要之地，认为奇货可居，竟扬言洋人愿出高价购买产权，准备自行开采，以相威胁。矿局早已洞察其奸，不受要挟，宁可暂缺，断然拒绝。如此迁延数年，直到境内其它商井全部归并，教士感到大势所趋，自己处境孤立，这时才无可奈何，只得托人向矿局表示，情愿按时价出售。于是双方在光绪卅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由教

士亲自签字立据成交。到此商井彻底收清，总计前后收并商井代价共达五十余万元。其后矿局并将钰盛改名安顺，玉和改名吉顺。并分别建成紫家冲分矿和小坑分矿。

光绪卅二年（1906）七月，矿局派俞燮堃、文从读、张德煌进行第二次商井普查工作，前后共收并商井321口，界内已无一口私井。只留开中恒等十五井^{②6}，其余封闭，使槽路不受穿乱之害，以便保证机矿顺利进行。同时，正式进行勘界，并绘制了地图。计从萍乡城外教场坪起，中经大罗坪、竹篙坡、双凤冲、社上、黄泥塘、许家坊、大塘下、周家坊、燕塘里、乱石岭、荷田坳等处，复环绕至教场坪止，周围共长92.7165里，面积504—506平方里。

为了照顾十几万家居民烧煤，更进一步提供方便。特规定：
（1）距矿较远，煤质较次，而又不关机矿正脉之处，准留民间开挖烧煤，并移县立案，永禁将井售给洋人，免致外权侵入。
（2）距矿较近，有关机矿正脉之处，民间所需烧煤，即由矿局各于扼要之处，酌留一二井，派专人负责，定价低廉。
（3）安源烧煤，由机矿出售。紫家冲、小坑、双凤冲等处烧煤，由紫家冲、小坑分矿出售。

按萍乡境内的煤田，称做“盆式大槽煤”。当初勘测时，就因为山势突兀，不便于直接开采。为了避免翻山越岭，钻凿坚石的困难，特选在地势较平坦的安源，向山腹开采，开成隧道，砌成砖瓮，上旋钢梁，下敷铁轨，利用电车运出所采内山盆式大槽之煤。一面向地下纵深凿井，逐层开横巷，专采安源境内各槽之煤，包括过去土窿没有能挖到的煤层，利用起重机车，运出地面。这样就完成了平巷和大直井两大系统的窿内工程。

在窿外工程方面，先后建成了大小洗煤台、炼焦炉、煤砖机、电机房等。为了改变原赖小河运输的情况，开始时先向西

修筑铁路十四里通宋家坊，连接淶江运输。继而逐步修通到湖南醴陵，再延伸到株州，从而和粤汉路北段衔接。当煤焦由铁路运到株州江边以后，有轮船卅余艘，分期顺湘江而下，运到岳州总煤库，然后转销他处。由株州运济汉阳时，则可越洞庭湖进入长江而达汉口。此外并在株州、湘潭、长沙、岳州、武汉等处，或设立堆栈，或成立运销所和转运局。

根据业务逐年的发展，逐步健全了矿局内部的组织。先后成立了机矿、收支、稽核、煤务、材料、制造、铁路、造砖、化学、餐宿、巡警、杂务等十二处^⑳。下面还设置紫家冲、小坑等分矿。后又增设高坑分矿。

自从采用西法，购置机器，大举开采，到建矿完成时，工人近万人，在矿餐宿者即在五千余名以上^㉑。随着业务的发展，年产量迅速上升。如光绪廿七年（1901），年产量仅二万六千余吨，到光绪卅三年（1907），年产量就上升到四十二万余吨。这时机焦价在安源的成本为每吨银五两，汉口交货为每吨银八两五钱^㉒，和当年开平焦价比较，不但已经大大降低，还能保证源源不断地运济汉厂。

萍矿的业务，除主要供应汉厂外，还代路局等处制造车辆机件，售给汉厂和礼和洋行以火砖，运销沿江各省的工厂和供应各大商埠轮船火车以烧煤。甚至有一个时期，还远销到日本和美国旧金山。

当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安源煤矿的出现，成为中国早期最大的煤矿。从此，“北有开平，南有安源”；而安源后来居上，且超过开平，名满中外。英国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开部来萍采访，在该报上发表。赖伦后来也在德国报刊上撰文介绍。在国内则被列为“中国十大矿厂”之一，当时人们都誉为“小上海”。时有中外来宾，前来观光旅游。当下车伊始，只听到巨雷般的有节奏的“轰、轰……”之声，山鸣谷应，仿佛一颗巨大心

脏在跳动，一幅蓬勃的矿区景象呈现在眼前：车站附近地势平衍，街市、学校、民房都在西南一带，东北则峰峦高耸，山腰为煤窿及各重要厂处的所在。煤窿以北区总平巷为最大，东区的直井次之。由东区斜上，过锅炉厂，则见电厂门口有电鼓一座，内有小车飞转，每天可发电一万三千多度；另有新式大车两部，开动后可多发电至两三倍。由电厂可达直井。前为八方井，其井口有起重架，分设大小起重机，工人由吊车上下。后为六方井，前后两井口径均约八九尺。前井深约四五百尺，后井深约三四百尺。井内设有砖墙、钢架、车笼俱全。其内并开有横巷，每层横巷各有唧筒房安设唧筒架，唧筒的抽吸力极快。巷口附近是打风房，有两座空气打风机和两座汽磅打风机，不停地在呼呼的运转。井前有铁轨，直通小洗煤台，一列列煤斗车经此运去受洗。井外有西平巷，适与地平；又有上平巷，较平地高百余尺。过修理厂前行百余步，到总平巷。巷高约六七尺，宽一丈许，长约三千多尺，和六方井相通。全砌砖瓮，通铺钢轨，两巷接通风路和车路。巷内有各号钻石机，钻石开煤，由电车头挂一列列车斗装煤运出。窿内全部装设电线，上悬电灯，当列车通过时，只见电线上绿光闪闪不绝，“察察”作声，引人入胜。总平巷每天约产煤一千八百余吨，直井每天约产煤八百余吨。沿铁路前行为大洗煤台，台高六层，装置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洗煤机。各层都由马力机或电力机运转，或启闸门使煤块翻转，或用水激使煤、壁分离；或冲击，或水筛；或打煤成粉末，或捞壁入斗仓。动作协调，各尽其妙。最后煤净如漆，点壁无存，总计每小时可洗煤七八十吨。需人不多，事捷费省，洗法精巧，实为国内首创。其所分出之壁石，则自动运往倾弃壁石之小山。由坡底至山顶斜敷平行小铁轨四道，有四只车斗，两两用电缆牵引，不断地此上彼下，运壁石上顶，倾倒于山谷中。在大小洗煤台之间和左右两

边，有西式炼焦炉共三处。炉用坚结火砖砌成，格数甚多，分廿四格、三十格、六十格三种，状如鸽笼。炉墙内有横直火路风路，旁通周绕。自开炉升火后，火不止息，焦出煤入，炉身通红，火不再升。大约四十八分钟，炼完一次，异常神速。其余厂房如林，目不暇接，不及备述。另在直井斜坡上，辟有公园，内建红漆小亭三座，因山结构，林木荫森，颇饶佳趣。此外有国民两等男校、端本女校、储蓄银行、积谷仓等。市面则有新街、老街、笕箕街和南市菜场等，其中以老街最繁华。东南隅则有土法炼焦炉五十座，昼间为日光所蔽，入夜则火光万道，和矿区万盏电灯，相互辉映，蔚为壮观。③

光绪卅三年建矿完成，李寿铨撰《萍矿说略》二十章纪其事。他在序言中写道：

“萍乡煤矿肇于南皮相国张文襄公，而成于毗陵宫保盛侍郎之手。溯自光绪廿四年，盛宫保会同张文襄，奏准仿用西法，购机大举开采萍煤。仅历十稔，而荒僻无人之境，一变为通衢繁富之场。矿以外天梯石栈，厂房云连；矿以内轂系肩摩，煤巷如市。萃西欧各名厂之新机，开东亚数千年之宿蕴，煌煌乎一巨观也。然当创办之初，内地风气未开，百计阻挠，事多棘手。基础甫立，旋值庚辛之岁，风鹤频惊，地方不靖，工程因之窒滞。嗣后又遭匪乱，工虽未辍，屡濒于危，此皆开矿以来叠经之磨折也。而卒以当事者坚忍镇定，上下一心，历尽艰难，得有此成功之一日。萍煤产富，甲于全球诸大名矿。脉绵层厚，得未曾有。盆式大槽在东南小坑、紫家冲、黄家源、龙家冲、高坑等处。周围九十余里之遥，包孕五百兆吨之多，均在萍矿范围之内。无如山岭连绵，不便运道。惟距城十四里之安源，地势平坦，而又得峰峦回抱，洵天然之绝大工场也。从此入手，开巷凿井，钻石通隧，历时八九年，费款数百万，始由山腹取直径达盆式大槽之煤田。今则煤槽铁轨，六通

四达；煤窿电车，往来不绝。外而洗煤机、煤砖机、炼焦炉附设之机器厂、火砖厂；余如医院、学堂、米仓、料库之属，因地制宜，规模完备。用工几及万人，沾利奚止万家，实业之兴之大有造于地方也如此。现在日出煤二千万吨，月可炼焦一万二千万吨，年可造砖六七万吨，造火砖数万吨。尚在推广炉座，展拓运道，逐有进步。而转运分销，如湘之株洲、湘潭、长沙、岳州；赣之九江、南昌；皖之安庆、芜湖、大通；苏之南京、镇江、常州、上海，各有分局。而于汉口设运销总局，以汇上下游各分之总。轮艘囤储之厂栈，逐年加增，咸足备用。额定销数，除专供汉阳铁厂焦煤外，如长江各项商轮，京汉铁路火车，长江各埠各局厂，及其它西洋之兵轮，东洋之制铁所，咸取给焉。而美属旧金山各厂商，亦以货高价廉，远来议订。蓬勃之势，声振遐迩，此诚我国第一之实业也。”

光绪卅四年（1908）“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成立于上海，盛宣怀任总理。萍乡煤矿便和大冶铁厂，汉阳铁厂一起成为这个联合企业的组成部分，此后就直接受上海总公司的领导。

在那艰苦建矿的十年岁月里，李寿铨利用公余时间写下了许多充满了热爱事业，热爱安源，奋斗自强，感时愤事的壮志豪情的诗篇。如一首《看山》这样写道：

“日日在山中，看山看不厌。四时景物殊，瞬息幻千变。我意忽不平，山亦奇形现。我心倏怡然，山为开笑面。我有神交友②，乍别恒恋恋。胸中有邱壑，长此捐俗念。”还举几首如：

《寄家乡诸前辈》

“豪气当年压九州，摧锋折锷鬼神愁。明知我本非鸾凤，悉听人呼作马牛。万事无如能忍辱，十年从不梦封侯。江东父老如相问，一领青衫到白头。”

《读饮冰室主人著书有感》

“不因时势造英雄，独有千秋寄此胸。一片精诚保黄种，百年浩劫回苍穹。弭兵端赖开民智，行政何须患国穷。四万万
人能合力，中邦屹立地球中。”

《砺志》

“不经磨炼岂良材，小草希荣实可哀。试看栋梁成器后，都从冰雪植根来。人情变幻胸如镜，世局艰难志莫灰。一任海
枯山石烂，安危终仗济时才。”

《端阳偶成》

“国势成孱弱，予身尚倔强。从公甘作仆，算债合称王。东海滕鲸鳄，西邻逼虎狼。榴花含血泪，无兴问端阳。”

《初夏闻蟋蟀》

“尚未秋风起，何来蟋蟀吟。偶惊凉榻梦，顿触故园心。振翼嫌犹早，藏机悔不深。趋炎非尔性，娱俗让蝉琴。”

《愚公》

“百事一不就，因自号愚公。愿立移山志，成兹一篑功。拙能安我分，巧自夺天工。世乱纷无定，生机在此中。”

《今日》

“今日全球势，天涯若比邻。何人能守旧，如我亦维新。心热都成病，身强不厌贫。儿孙知学武，欢笑一堂春。”

在建矿期间，李寿铨就工作经验总结，写下了《药石轩知行录》。其中许多条都为友人或同事传诵而脍炙人口，并作为“座右铭”。如：

“人犹鱼也，书犹水也。鱼不可一刻离水，人不可一日离书。”

“多吃苦，少要钱。多做事，少说话。是拙主意，是真本领。”

“事事见得人之不是，何如事事见得人之是处之为博大。”

事事见得人之是处，又何如事事见得己之不是处之为谦虚。”

“古今来英雄豪杰，未有不立志者，未有多情者，未有不耐苦者，未有不爱才者，未有不惜阴者，未有不虚心者，未有不好学者，未有不勇于改过者。”

“惟下乃大，惟勤乃精，惟质乃实，惟诚乃神。”③③

办事有三字诀。曰：板、简、斩。

板：起居有节，号令必时；一日百年，不愆不移。

简：删尽浮文，独求实际；纷者一之，真能解事。

斩：当几立断，奏刀**騞然**；眼明手辣，得上乘禅。

办事有三字忌。曰：懒、散、反。

懒：贪安嗜逸，众恶之根；筋脉懈弛，是谓废人。

散：宇宙经纶，贵在团结；头绪纷如，必至决裂。

反：何谓事理，顺乎人情；坚僻执拗，厥祸匪轻。”③④

（三）从保矿到长矿

光绪三十年（1904）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魏光燾奏请将江南制造局厂，从上海向内地迁建。清廷特派兵部尚书铁良，前往各地，详细查勘，研究和选择可作新厂的地址。这年十二月，铁良由安徽湾沚来到江西萍乡，最后选定安源邻近的杨家场，③⑤可作枪炮新厂的基址；还可利用株萍铁路以供运输。这时安源正在大举建矿，铁良仔细参观了全矿规模，极为嘉许。认为兴办实业，坚苦卓绝，成绩斐然。为了奖掖人才，特于光绪卅二年（1906）奏准清廷调张赞宸任天津银行总办。可是张赞宸由于十年以来，手创实业，备历艰辛，心力交瘁，只得先赴沪就医，然后履新。不幸在治疗期间，正处于建矿大功告成之前，便于光绪卅三年（1907）农历三月初一日，在沪滨积劳逝世。享年四十五岁。张赞宸的逝世是实业界的损失。李寿铨后来在安源辟地修建“张公祠”，以纪念张赞宸创

办萍矿的业绩。③⑥到盛宣怀逝世后，又将“总局”改名“盛公祠”，纪念盛宣怀。至今这两处名称一直在安源沿袭下来。③⑦

张赞宸逝世后，汉冶萍总公司任命林志熙③⑧为总办，李寿铨、薛宜琳③⑨为会办。林是公司的人，对安源情况并不熟悉，才具也平常，④⑩时而在矿，时而回沪，长期不来，形成遥控。薛虽是盛氏故旧，不能专心致力，工作反多掣肘。到了辛亥革命后，爆发了“夺矿”和“保矿”运动，这对于李寿铨说来，是他在办矿事业中的一个转折点。

原来萍乡县在江西省最西部，和湖南省醴陵县接壤，所以一直和湖南关系密切。自安源建矿后，由安源向西修筑铁路，经过萍乡、醴陵而达株州，和粤汉路北段衔接，成立了株萍铁路。④⑪那时粤汉路南段尚未修建，安源向东也未修建，因此安源和湖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从交通上来说，安源距醴陵只九十里，且通火车，转瞬可至；但距江西省会南昌，却远达五百八十里，行人则赖独轮人力车或山轿，途程迂缓。因此安源矿工大多来自湖南，所以当时安源矿区是讲长沙方言，四乡却保存萍乡方言。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局动荡。由于十余年来，李寿铨和湖南方面人士很熟悉，其中尤以和黄兴，谭延闿交谊最深。光复后，湖南推举谭延闿为都督，他对于安源叠经危难的处境，或分兵保护，或拨款接济，都大力支持，使萍矿能维持下来，照常工作，秩序不乱。以致一年多来，没有一天停工停产。不料江西推举出来的都督李烈钧，此时忽听信谗言，也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管主权法纪，觊觎萍矿，意图染指。民国元年（1912）八月下旬竟以江西都督名义派欧阳彦谟为总理、周泽南为协理，前往安源接收萍矿，并以武力作为后盾。理由是：

“矿在本省，收归省办。”他不理会萍矿是汉冶萍公司的一个企业部门，受公司董事会领导，而董事会又向股东大会负责。

欧、周到安源后，即大造声势，贴出布告，谓奉赣督之令前来接收。并向李寿铨、薛宜琳发出咨文：限九月五日将全矿产业，一律点交让他们接收。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变，顿时引起全矿骚动，同声愤慨。这时林志熙久居沪滨，薛宜琳则看到赣方气势汹汹，形势危迫，竟于九月三日不辞而去。^④这个应变的重担很自然地就落在李寿铨的肩上了。

他首先义正辞严地向欧、周表示：“只知保矿，不知送矿。”对于赣方无理强迫接收，坚不承认，并将咨文退还。但面对严峻的现实，他确感到举足重轻。在这群龙无首之时，他再退避，矿必崩溃。如要保全，又赤手空拳，孤掌难鸣。他审时度势，认为公司远在上海，鞭长莫及。但公司有立场可据理向各方呼吁，就得有一个缓冲时间，必需采取紧急措施，设法使欧、周延期接收，并请湖南以实力援助。根据这一方案，他一面急电沪总公司报告情况说：“合矿同人，矢志虽坚，力量太薄，”请公司速电呈大总统、付总统、湘督呼吁，并请赣督取消接收，应与沪公司直接交涉。一面急电长沙谭延闿都督、赵春廷师长称：“处兹时局，已极为难。倘一动摇，必至暴动。祸不独矿一方面。萍一方隅。贵省附有重股，接壤最迩，情急期迫，用特电求始终维持。”并要求援兵赶到，“籍重威镇，即保治安。”与此同时，挽请萍乡有名望的士绅出面，连日和欧、周酬应，并反复磋商，再四交涉，最后于四日达成口头协议，允展期至九月十二日。到时如无赣督明确指示，十三日一定接收。

湘督谭延闿接电后，首先电复李寿铨表示：“湘省断难膜视。”一面电达赣督说明：“延闿曾言及萍矿为公司产业，非得股东承认，政府未可遽行干涉。”请“和平解决，总以保全东南大实业为心，知必采纳。”一面经电欧、周指出：“去年光复时，萍矿系湘省全力维持，现在赣省如此举动，必启争端，祸不独萍乡一隅；应静候李都督电示和平解决，切勿暴动。”

赵春廷师长并立即电飭驻醴陵李培之旅长就近来矿保护，其所部谢安国第三团即于九月六日进驻安源护矿。

当李寿铨正部署对策之时，林志熙还要实行摇控，竟于九月五日由沪密电李寿铨，指示妥协。谓：“如仍无效，限满必强占、只可暂时听令，既可保全，再图挽救。”李寿铨不同意，认为“倘稍示弱，待接收后，再图挽救，无可救矣。彼若到矿，本摇匪入，立即哗溃。破坏者不在同人，而在土匪。矿力固内有权，抚外无策。一到霉烂，争回何用。”决心“竭尽心力，为众股东保此矿产。”表示要和欧、周辈周旋到底。

这时欧、周活动并未停止，仍然声势汹汹，并多方恫吓，作十三日接收的打算。而全矿上下，敌忾同仇，感到形势危迫；矿如被接收，则全体溃散。林志熙人不在矿，还实行摇控；薛宜琳又临危退却；李寿铨已展现其应变才智，应该由他领导全矿，团结众心，度此危难时期。乃于民国元年九月七日召开全矿大会，推举李寿铨为临时矿长。并由高传柏、屠鹤清、俞燮堃代表全矿向有关各方发出通电称：“矿无主权，合矿同人公推李君镜澄为萍矿临时矿长，有办理萍矿全权。同人等为矿苦求，李君勉允，矿内外人心大定。”通电发出后，湘军首先表态支持。赵春廷师长覆电谓：“李君镜澄，在矿多年，廷素钦佩。诸君乐推，廷亦极表同意。”沪总公司董事会亦复电称：“矿务须人主持，现本会公议委任君为临时矿长，担负窿路机厂一切完全责任，约束工匠，照常工作。”以后便委任为正式矿长，总办全矿事务。

展期是一个最好的策略，公司可以赢得时间，进行外线活动。乃于九月十日电赣督解释：“尊电所称萍矿在贵省行政区域之内，未便放弃一节。窃谓行政界说，自以为弹压保护为限。若派员干涉，即侵及营业自由范围，有碍公司权利。如贵省意在投资，自可向公司购买股票。与工商部等股分，同享权

利,无须以行政名义取矿代办。”并告以公司将派员来南昌直接交涉。北京工商部亦于接报告后,于十日电赣督,谓已提交国务会议,并即派部员来萍调查。并指责:“赣督有既侵人民财产之自由,复碍国家行政之统一。希严电撤回该委,静候中央解决。”

但在安源方面,“夺矿”和“保矿”,双方仍在对峙,剑拔弩张。因为十三是预定接收之期,所以到了十一日晚,已是风声鹤泪,草木皆兵。湘赣两省边界,都受震动。李寿铨看出了欧、周“故意持强,诡以武力恫吓,”立电湘督,告以“赣员外示和平,暗增兵力;限迫、请电李旅长严加戒备。”谭延闿即电李培之旅长指示:“湘省保护该矿,已及一年。断不能未经商允股东,逕交他人收办。该旅长务须严重交涉,非经股东代表将办法商妥,万勿将该矿交出。”这时湖南股东代表龙绂瑞等也向社会上呼吁:“赣省强夺萍矿,非经股东承认,不能擅自割弃。”这样形势就急转直下。九月十一日午后,萍绅又会同湘军旅、团长将有关函电持示欧、周磋商。他俩看到在情、理、法诸方面,都处下风,乃于十二日下午同意和平解决,不再作武力接收打算。一场风波,顿告平息。赣督李烈钧也乘此下台,当即于十二日电李培之、谢安国、欧阳彦谟、周泽南称:“矿事和平解决,湘、赣益敦于好。皆由贵旅长、团长,深明大义,一力协助,实业前途,增进无量,电到无任感佩。至此如何如何进行,如何防范,凡有借重之处,该总、协理事务宜悉心妥商,彼此接洽,保收完全效果,是所至盼。”

对于此次“夺矿”和“保矿”运动,李寿铨向总公司作了总结性的报告说:“矿围幸解,堪慰远廛。近时变端百出,应付几穷。惟定静尚有一线生机。旬日办法,悉与青电暗合。极力保守,专主和平,做足完全商办性质,前途初以矿无主权,有隙可乘,多方迫胁。公推一举,彼已气馁。犹复故意持强,以至谣言纷起。真夜、文晨,风潮极大 邻界震摇。我矿同

人，不为所动。内固众心，外籍湘援，得就青二电和平解决，人心大定。萍民亦感全矿从未停工，毫无损失。铨在矿一日，必尽一日之力。务求大力维持，随时指教，为股东、为民国，保此完全实业。”又分析应变之经过说。“此次非解围，万不能保矿。非得赣电，万不能解围。非展期，万不能得电。非全矿一心，万不能展期。尊处与敝处一气呵成，始得和平解决。仍求消息常通，实力进行，密电代表，慎重协商，力保主权，万勿松动。全矿同人，爱矿心坚，断不肯放弃，更不忍破坏。铨一力担承，不负委任。……湘督实力保护，许铨救急。适王铁山军统驻湘，系赣督老师，素重公义，展转求其一再严电诘责，四面松恨，乃得暂解。”后来工商部派张轶欧、张景光、余焕东三部员来萍矿调查；王铁山和公司派徐元瀛、萍矿派俞燮埏也到南昌和赣督协商；黄兴来矿参观后亦过南昌斡旋，赣省夺矿之企图，遂未得逞。事后公司发勘电给李寿铨和全矿，特予慰劳。但是李烈钧夺矿未成，为了争面子，还是做了一些小动作。乘萍矿矿警局长周季湄请假期间，突派赣军营长高继霄强迫接任矿警局长。好在高为人爽朗，他既知矿警系公司内务，不应越俎代庖；又不能违抗上命而不接。因此他表面虽于十二月八日强接警长，而对内则不更动任何一个人员，并且还和矿局搞好关系。他的作风赢得了公司的赞赏，随后便由公司予以加委，夺警一事也就这样戏剧性的圆满解决了。

民国二年（1913）李寿铨正确处理了德国工程人员殴打工友的事件。《药石轩日记》记述了全过程，现摘抄如下：

民国二年十月十七日下午，达夫来报告：西礼夫特殴伤该公事房当差。当函嘱西医哈德礼验治。

十月十八日 午后，西医来复信，该工人伤未破皮，已给药服，望其不久可愈等语。

十月十九日 午刻，经别工人将伤工易瑞林抬送 总 汇请

验。经验身有三伤：一在左边小腹，一在背后腰下左边，一在右边背后肩际；均色现青紫。并询其受伤后，三日大小便不通。询殴踢情由：系因十六日西礼夫特未出窿时，爱斯特、梯尔往晤未遇，遗有算码纸条。迨西出窿到公事房，即迁怒于工人，拳足交加，殴踢受伤。

十月二十日 缮函交文涛译成洋文，申饬西礼夫特。

十月廿一日 下午四点钟，西礼夫特来公事房，道歉认错。云：“以后谨遵合同做事，请为原谅！”当嘱其无论工人、当差，以后不动手打人。五句半钟，医生哈德礼来言：

“易瑞林已愈。前日所验出青紫色者，乃系敷药所致。”当同往验，仅有左边腹际一青色矣，不日可愈。④③

按萍矿延聘德籍工程人员，除赖伦外，都是三年一期合同，期满解聘，逐步由中国籍人员接替。如工作需要，再续订合同三年。他们的工作，一是总工程处，二是窿内工程，包括总平巷和直井。民国初年时，赖伦任总矿师，西礼夫特任总平巷总管，白米任直井总管。民国三年欧战爆发，德政府征召年二十至四十岁者服兵役，艾仕德、徐福史、西礼夫特、梯尔、史奈德、哈斯那、小白米七人于八月份应征；白米、哈德礼二人于九月份应征，均离矿服役入伍④④。总平巷总管由仇达甫接替，直井总管由程炳堃接替。赖伦于光绪二十年（1894）冬来华，合同二十年，建矿后任总矿师。当第一次洋焦炉未能如数出焦时，赖伦曾负责向礼和洋行追赔，罚款银二万九千一百一十两；后一度兼任大冶和马鞍山矿师。株萍路建成后，又曾兼管铁路行车。于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合同满期，退休驻上海公司当顾问。他的总矿师一职，由黄绍三接替。民国六年（1917）黄调汉阳铁厂副厂长，总矿师便由金湘生接替。到这时所有德籍人员均先后于合同期满离矿，只是因工作需要剩下电机师非已那一人了。

(四) 和黄兴等友善

李寿铨在长期工作中结识了许多知名人物。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前期以张赞宸为风尘知己；革命军兴后，和黄兴、谭延闿最称莫逆。

黄兴，字克强，湖南长沙人。在清光绪时，孙中山组成兴中会，黄兴组成华兴会，致力于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1905年兴中会和华兴会等合并为统一的同盟会。李寿铨和黄兴友谊很深，并结为文字交。当清代末季，政治腐败，丧权辱国，李寿铨痛感国事日非，认为已非变法维新所能挽救。他表达于诗中的有：

辛丑年：《罪言》“北望京华泪眼枯，銮舆何日返皇都。冠裳酿祸于今烈，符咒谈兵自古无。百战争锋犹霸楚，廿年酣豢竟亡吴。旧章新政休轩轻，试问中朝几大儒。”

癸卯年：《谈医》“先儒有遗言，死病无良医。问今是何世，气象适类之。痿痹数百年，及今将垂危。病深入膏肓，仅存骨与皮。戕贼尚百端，丝毫无滋培。卢扁不复生，生亦无能为力。我生胡不辰，壮岁丁其时。知病不知医，言之心中悲。”

乙巳年：《阅报愤书》“东邻强暴胜西邻，枉极蒸民气不伸。终古有天难论理，九州无地可容身。任凭外族奴蛮我，甘作中朝醉梦人。博得维新好名目，靦颜各自诩勋臣。”

由于具有迫切要求变革的愿望，当新的革命组织成立以后，首先便经黄兴介绍参加同盟会和南社。其时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清廷予以严禁，只能秘密传播。李寿铨获书后，挑灯循环诵读，击案三叹，并加批注。基于彼此结下的深厚友谊，李寿铨以萍矿为基地，积极支持和多次掩护黄兴的革命活动。

黄兴先后手赠李寿铨照片多帧。黄兴工书法，当1911年黄

花岗之役，其右手之中指、无名指、小指均被炸去，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用拇指、食指拈管作书。后又练成左书，有时则标明“左手拈笔”字样。黄兴曾亲书对联赠李寿铨。联曰：

“襟怀欲吐天开朗，意气相倾山可移。”

可见两人感情之深。又曾书赠横额“博雅”两个大字，其上加盖一长方白文图章。文曰：“铲除世界一切障碍 使者”十个字，当为稀世珍品。也可想见黄兴气魄之雄伟和抱负之宏远。

民国元年、黄兴任南京孙中山临时政府陆军总长。不久袁世凯任临时总统，政府北迁，黄兴任南京留守；曾有意邀约李寿铨来留守府襄助，由于彼此复鉴于两地时局，均在动荡，致这次共事未能实现。不久袁世凯撤销南京留守，迎孙、黄入京定国是。孙中山受任全国铁路督办，黄兴受任全国矿务督办。民国元年冬，黄兴返湘省亲，并来安源参观。十一月九日，李寿铨亲赴长沙迎迓。十六日黄兴率随员七十余人由李寿铨陪同正式访问安源。临时把德国工程师史密特和娄格士的住寓腾出来作为行辕。举行全矿盛大欢迎会于张公祠，^{④⑤}会后公宴，并摄影留念。接着逐日在窿内外详尽地进行参观。于廿一日返湘。不到一周，李寿铨又应黄兴电邀，由廿七日到十二月一日，去长沙盘桓畅叙友情，并疏通萍矿和赣督间的隔阂。此后李寿铨便放大黄兴巨幅半身像悬挂在弹子房大厅^{④⑤}景仰。^{④⑥}并修建“黄兴桥一座，以资纪念”。

民国二年(1913)黄兴在沪，因送宋教仁入京，在上海北站迁袁世凯所派刺客，险遭不测。^{④⑦}后由沪赴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事不成，东渡日本。其后因病回国，于民国五年(1916)十月卅一日在沪逝世，享年四十二岁。李寿铨闻耗，甚为感伤。有《悼黄克强》二首：

“一别三年久，音书迄未通。襟怀包宇宙，踪迹渺西东。儿中魔王毒，行嗟大道穷。苦心天不负，一将竟成功。”

“还我共和国，全凭笃实人。伤时频呕血，忧国倍怆神。白

昼昏无色，长江惨不春。英雄今已矣，何以慰斯民。”

黄兴逝世后，次年国葬于长沙岳麓山。民国十年（1921）李寿铨有《吊黄克强墓》一首：

“顿触沧桑感，来游岳麓山。阴晴三月暮，烽火十年间。国事纷无定，英雄去不还。欲回尘世劫，自愧鬓毛斑。”④⑧

谭延闿，字组庵，湖南茶陵人。光绪进士，辛亥革命时，被推为湖南省都督。他和李寿铨交谊深厚。当江西都督李烈钧覬觞萍矿时，谭延闿紧密配合李寿铨，作为坚强后盾，给予有力支援，终于转危为安。他曾亲书对联赠李寿铨。联曰：

“天上官府可千亿，江左人物第一流。”

从所赠对联可看出他对李寿铨倾慕之深。

北伐后，李寿铨已告老回扬时，谭延闿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于1927年电请李寿铨出山。李寿铨虽应电邀前往南京，会晤老友；但表示业经息影山林，无意重作冯妇，因以年老力衰为辞。返扬后，不及一载，即病逝。谭延闿特赋以祭幛致电。

赵声，字伯先，江苏丹徒人。原在江阴训练新军，任卅二标标统。于光绪卅二年随两江总督端方来安源，得晤李寿铨。因同盟会同志和同乡关系，一见倾心，彼此又均能诗，遂订交。李寿铨且以合法身份，掩护了赵声的革命活动。

王治昌，字槐青，直隶天津人。民国初期，任北京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商品陈列所所长等职。和李寿铨公私交谊均厚。民国六年（1917）李寿铨任用王治昌之弟王道昌为萍矿制造处工程师。民国七年李寿铨因实行减政，裁并机构，便先从亲属着手，将其子李为光停职，以为表率。王治昌即召其至北京商品陈列所供职。当时王治昌住北京前门内绒线胡同，李为光住北京前门外西河沿，时可趋前承教。王治昌于民国八年初一度出国考察实业，回国后并兼任汉冶萍公司顾问。

至如南社中人，则与吴江柳亚子，镇江冷御秋，醴陵卜芸

庵、文牧希辈友善。

又与吴兴杨绍椿、萍乡欧阳跃斋因生同庚而交最久 结为“岁寒三友”。

(五) 经历安源大罢工

民国十一年(1922)九月,安源煤矿爆发了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大罢工运动。这时安源煤矿有工人一万二千余人,株萍路局有工人五千余人;简称“路矿两局”。从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1912)起李寿铨任矿长,到1922年4月,公司增派舒修泰^④任副矿长。并暂兼矿警局长。^⑤这时株萍路局局长是王昌学。^⑥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原名李隆郅。字能至。于1921年底由党派来安源,做组织工人的工作。1922年1月开办工人补习学校。五月一日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隆郅任俱乐部主任。七月汉阳铁厂工人罢工。九月十日,粤汉路工人罢工。九月十一日刘少奇由党派来安源,协助李隆郅领导和组织罢工。九月十四日晨二时,株萍路局工人罢工;晨四时,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共历时五日。刘少奇1923年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中罢工部份,亦有“于是矿长李镜澄氏乃出而主张实行调和,从事磋商条件”之叙述。九月十八日,萍矿总局、株萍路局、工人俱乐部三方面全权代表签订了十三条协议,大罢工遂告胜利结束。关于安源大罢工运动,在许多书刊、报章、杂志上都登载过有关文章,可供参阅。现将《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⑦一书中所引用的《药石轩日记》,全部照录,^⑧另增补数条,(用☆号标志)并附录十三条协议全文,阅者即可得一梗概。

《药石轩日记》摘录

民国十一年九月

☆十四日。热极。

今晨二时，株萍路局工人罢工，元次车未开出。四时，本矿窿工人罢工。路局罢工后，李毅寰、⑤④刘箴生、陈毓斋来谈。窿工罢工后，金湘生、仇达甫、程炳堃报告。六时到公事房，发镇、县两署电报，上海总公司电报。旋即会同路局李毅寰赴城，报告萧镇守使、⑤⑤范知事，⑤⑥并商办法。午后一时回。镇署当派李团长带兵驻矿。约商会张绍楨、谢兰芳及陈盛芳商量。

十五日。晴，热极。

今晨罢工工人在两窿口（直井、总平巷）聚集多人，当以电话请镇署饬李团长派兵分扎两窿口弹压。李旅长⑤⑦从城来，又约陈参谋长来。午后，李旅长商约安源商会调停。并由路矿派代表同晤李隆郅谈判，未得结果。晚饭后，商会张绍楨、谢兰芳、陈盛芳、王守愚、贾暘谷来谈，仍拟调停。

十六日，晴，热极。

晨八时，直井有兵与工冲突之事。当由团、营长解散。

上午十时，李旅长到公事房会客厅，适俱乐部递呈。当由旅长派副官约该部头人刘少奇来，面询一切，极力开导。谕以三事：一、直井锅炉打风机须保护；一、电机及电机锅炉房须保护；一、安源地方须保守秩序。刘少奇均承认。旋由刘少奇出公事房演说与工人听。其时工人已聚集二千余人以上，三条均承认；惟路局每日开火车二次，不承认。

下午，查锅炉烧煤已将脱，俱乐部虽承认派工挖烧煤，迄未来，万靠不住。当派刁炳麟向土矿密购生煤数百吨，以应急。

晚在弹子房陪旅长、参谋长、李毅寰便饭。饭后，商会张绍楨、谢兰芳、及绅士王守愚、贾暘谷来见旅长、参谋长，报告向俱乐部商先开工，后议条件，该部坚不承认，无从着手调停。旅长仍殷殷劝慰。

夜十二时，陈盛芳来报告紧急消息。谓：如商量条件即开议，如无商量，李隆邛即离安源，听工人暴动云云。当约李毅寰会商，只有保产之一法。毅寰极以为然，表示同意。

十七日，晴，热极。

晨八时，开首领特别会议，磋商能允之条件。

商会谢兰芳、张绍楨，绅士王守愚、贾暘谷来劝，事急仍愿极力调停。当允派代表路、矿各一人。

下午四时，路局代表李毅寰、矿局代表舒季俊，^{⑤⑧}偕商绅四代表，假民房与俱乐部代表李隆邛磋商条件。至夜分二时始定议，计十三条。据各代表签称：据李隆邛云：条件无可再让步。允则开工；不允则走开，离安源，听众工所为等语。即是听其暴动。时机紧急，当约舒楚生、金湘生，迄不能定。又据金湘生云：须约各首领会议，又遍约之，时将天明，各首领到，纷纷议论，迄不能定。已至十八日八时，而各代表与前途约九时回复，为时已迫。予告各首领，事急如此。设有暴动，千数百万之产业，即不能保。我何以对公司。惟有姑订条件，开工以息其风，容另图善后之策。一面报告公司，请董事会派员来矿，妥筹办法。舌敝唇焦，始克定议。派代表与李隆邛订条约。路局旋即开车；矿局因为时已迟，准予今日料理，明日开工。

接长沙凌子贞电，当复急电，并快函。

二十日。晴，凉。

发报告罢工至开工情形，请经理转请董事会派董事两位，来矿察看保存之产业，主持善后之办法；并派正、副矿长来此

接替。函附抄件。

晚约刘麓生、李隆邛谈。陈盛芳同李隆邛来，其言甚恳切。

秘书黄少吾到公。

☆二十四日。晴，暖。不爽。

昨谢浴淮来矿，询及开工后情形。伊与李隆邛世交，如有隔阂之事，愿为疏通。当往晤李隆邛。今得其切函，可解决一二事。浴淮午后车回醴。

民国十一年十月

一日。晴，凉。

李隆邛今下午来见，刚从醴来。

今晨陈盛芳来报告，昨日醴绅丁花南等来安源。因李隆邛罢工事，醴人对不起我。缘我上年曾代请上海义赈三万数千元救醴，而醴人如此对矿，甚为抱歉；拟劝李隆邛回醴云云。不知李隆邛尚须在此料理善后也。惜花南今晨回醴，未一晤面。

☆二十九日。晴，和暖。

下午四时，俱乐部刘少奇、余江涛来谈：东平巷九段刘厚卿所管点簿，日夜班正副监工往往漏签；又点簿名数与工头进班牌记，往往不符，此系监工不负责之证。并将簿、牌送来核对。当约金湘生、邵逸周、程炳堃与刘、余切实考究。

民国十一年十一月

☆十日。晴，寒。

下午三时，与王海涵及路、矿首领往践李隆邛之约。席散，便过曹华清畅谈近事。

☆十一日，晴，寒。

晚，李隆邛来谈，将有远行。并开各处住址：一、长沙小吴门正街自修大学；一、衡州第三师范张秋人转；一、武昌大堤口利群转。

民国十一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晴和。

下午，刘少奇、余江涛来谈工人求加半月工资事，当剴切告之。

二十五日。晴和。

午刻，王海涵来矿。当约俱乐部刘少奇、余江涛，告以路矿困难，达于极点。加工资半月，万做不到。嘱其劝导工人，勿再要求。并发一路矿公函与之，俾可持示工人。当将以上情形告知各首领。

二十八日。晴和。

上午十一时，刘少奇带同俱乐部之工人代表来，商加工资半月，不必急急索款，须设一特别办法。当切实开导，谈三小时。

民国十二年一月

☆三日。风，寒甚。

下午，与李能至谈至七时始散。

二十四日。雪，寒。

上午因洗煤处工人要求每人发铜元（照银元一元之数），牵及各外工程。经金湘生议照发铜元；复经李隆郅商以矿票发窿工每人二元。当分知萍、安两商会，向各铺收一元矿票，暂以五元矿票兑换。

民国十二年三月

三十日。晴热，早晚凉，难望雨。

晨八时走晤赖伦。上午十一时赖伦来寓谈，俟其进窿考查后，再商办法。

下午据吴幼甫报告，有上埠工人多名，手执白旗来安，当嘱派警驱逐；一面质问李隆郅。放工后亲至警局，适李隆郅、余江涛先在。询据称上埠工人行动，实在不知，于安源俱乐部

无涉。当嘱其严重干涉，令其立即出境。

民国十二年六月

十一日。晴，热。

竟日为工人加钱事，纠纷不已。直至放工后，犹无办法。约刘少奇来，勉强散去工人。

十四日。晴，热。午后雨。

午刻工人又为加钱事哗噪。又约刘少奇来，散退工人。

十五日。上午晴，闷热。下午大雨。

上午十时，刘少奇、陆沉来，为工人加钱事，商两时半，略有眉目，仍做不到。

下午请各首领会议，就其眉目，商量从轻，如是解决。

十七日，晴，闷热。

工人为支钱事，又喧嚣竟日，至晚八时始回寓。

晚约幼甫交俱乐部一函，托其约刘少奇、陆沉商量办法。约定十九日上午前十时再议。

十九日。晴，热。

上午十一时，刘少奇、陆沉来商二时之久，金湘生、吴幼甫在座，仍无眉目。

下午四时开会议，各首领到。正议间，刘少奇来，拟一办法，似可就范。至六时，刘少奇、陆沉同来，商之至再，苦口千言，始有解决。

二十日。晴，热。

下午刘少奇又来谈，约王贯吾商修理厂事。陈斐成亦来商洗煤处事。

民国十二年七月

十八日。晴。

吴幼甫来报告李隆郅来安演说宗旨：一、宣布谢怀德不法事；一、劝导工人须出煤每日在二千三百吨以上，方对得过萍

矿（照现在人数）；一、以后工人不得无故聚众要求，须由俱乐部与矿局接洽。

民国十二年十月

☆五日。晴，燥。

昨夜筹算发米，恐接济不上，仍不若发钱。急向城市及安市两处商收铜元，代为汇长。适工人俱乐部刘少奇来商，亦恐米少不能接济，亦以发钱为然，遂定计发钱。当派黄彬文赴城，商之各铺。一面商安源商会张克丞会长，代为搜罗铜元。定于本日下午发外工程工人每二元；八号发窿内工程工人每一元，不在食宿房吃饭者发二元。当知照各处查照。

二十日。阴。

午后，刘少奇、陆沉与金湘生商工人工资事，有工人代表及工人约二、三十名随来，经金湘生与商时许，始散。

二十一日，晴和。

午刻始与刘少奇议定，明日外工程找清八月份工资，九月份发三分之一，俟向市铺再借，约至迟本月底发窿内工程工资亦三分之一。

公司既无款来，又不复电，而此间工人又催索工资甚急，真无办法。

民国十二年十一月

七日。晴。

上午司事风潮尚未平，工人俱乐部刘少奇、陆沉均来问，当责成各首领开导化解。

☆二十一日。晴。微寒。

李隆邨昨从汉口来安，今同陈盛芳来谈。据云：明日即回汉。

二十七日。雨竟日。

下午，刘少奇、陆沉来，畅谈甚久。意殷而心虚，可佩。

《三方协议全文》

(一) 路矿两局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 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三) 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夹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四个月为限，但须有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

(四) 每年十二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

(五) 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百五十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年，在百五十元以下者，给一百五十元，一次发给。

(六) 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饷，但工资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十元为限。

(七) 路矿两局存饷分五个月发清，自十月起每月发十分之二；但路局八月份饷，须于本月二十日发给。

(八) 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九) 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二百元，从本月起实行。

(十) 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一) 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日自一角五分递加至一角八分，大工自二角四分递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

(十二) 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三) 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百分之五。

萍矿总局全权代表舒 群（印）

株萍路局全权代表李茹辛（印）

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李隆邨（印）

民国十一年九月十八日 协订

（六）告老还乡

民国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大罢工甫结束，李寿铨即于二十日向上海总公司引咎辞职。文中说：“窃念此次罢工，虽属世界潮流所至，无可如何；而事前不能防范，当事仍复迁就，办事不善，咎无可辞。所稍堪问心者，产业幸为保存，损失亦不甚巨耳。”以后又一再坚决辞职，公司又一再慰留，^⑤最后提出荐贤自代，方卸仔肩。从下面所摘日记，可以看出他这一时期内确实是心力交瘁已极了。

十一月三十日：“此一月内，难艰困苦极矣。平心忍气，竭力维持，姑尽心焉耳矣！”

民国十二年二月三日：“从上年四月起，至今十阅月，无日不在犹患之中。近一月中，上无一文来款，下有叠起工潮，百计千方，刻刻危险，为生平未历之苦。一俟时机稍转，誓必卸肩，老年万不堪任重也。”

四月十九日：“公司事困难已极，而难办之处，不在困难，而在复杂。”

六月十八日：“今为阴历端午节，一年已过去四个月，照阳历则已过去半年。公私交困，无一刻有宽闲之境，老年万当不起。不跳出牢笼，徒苦无益。”

六月二十日：“放工后，觉病深，舌苔厚焦，力不能支。季俊力劝休养数日，回寓即约文采卿诊视。据云：脑经受伤，今晚先服安神丸药。照服。”

六月廿一日更在致公司报告中提出：“督率无方，疚心更切，应付已穷，脑经全坏，万万支持不住，只能维持现状至本月底止，过期不敢负责。”

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六日，李寿铨接到上海汉冶萍总公司董事会微电云：“李矿长并转黄绍三兄均鉴：前为李矿长函电辞职，曾嘱经理一再慰留；嗣复来函，荐贤自代，情词恳切，难再勉强。兹如请委任黄君绍三接任萍矿矿长。⑥镜翁一俟交代后，即请来屈为总公司顾问，仍支愿薪，以便遇事有所咨询。除再委任并函经理外。董事会。微。”他在十二月卅一日记道：“此一年中，牵于时局，累于矿事，变幻百出，以至心血亏耗，智虑难周。决计坚辞重任，宁自刻苦，不肯负人。综计从事萍矿廿有六年，长矿十二年，诸艰历试，一尘不染，率眷还乡，安我清贫，尚不失读书本分。”并赋七律一首：

“迂儒本不惯经商，当轴犹如背刺芒。况复年华周甲子，更兼时局变沧桑。乱丝只合抽刀断，美玉何妨韞椟藏。正是吴江风景好，丹枫两岸送归航。”

他素来洁身自好，公私分明，很重视手续清楚。他亲自检查各项经济帐目上报公司，直等到上海公司派员来安源查对后，才离职守。日记中均有纪实：

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四日：“在矿二十六年，长矿十二年，向不及私。而因公各帐，头绪纷如，至此查清具报，全凭一人神智，殊费脑力。”

民国十三年一月八日：“晚七时，公司查帐员顾仙洲、陈文涛到，住盛公祠，当往晤洽。”

一月九日：“上午与查帐员对帐，有凌子贞在座。午刻，对讫无讹。”

对于这样一位把毕生心血都浇灌在安源土地上的萍乡煤矿奠基人，在他告老还乡之时，全矿员工和各界友人，都深切地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缅怀他几十年来鞠躬尽瘁的劳绩，给予了非常崇高的荣誉。

赣西镇守使萧安国、矿局各首领、路局、本公事房和采办

处、劝学所、六堂商会、萍安有关各界等以及同事分批组织，都分别举行公宴饯行。有的还和他互赠照片留念。

北区区长范启胜单独送匾，总局工人、矿警局官兵、安源商会分别都用集体名义送匾和纪念牌。这些匾送来后，即由各单位把它立刻钉在住寓内各处门头上，表示“留去后思”之意。

民国十年，醴陵大旱，哀鸿遍野。李寿铨对于邻省邻县灾情，极为关注。特赴上海为醴陵灾民募集捐款三万数千元振济，顿抒急困，邑人常感念其义举。而醴陵磁业素享盛誉，因此地方人士特委托醴陵磁业公司专门烧制李寿铨半身磁像两屏，并将事迹铭刻其上，作为临别赠礼，永留纪念。

湖南又为驰名中外的湘绣之乡，故友人所赠礼品中，便有许多绣制品。如绣屏、绣诗、山水绣、绣岳武穆所书中堂、绣史可法、徐菊人所书对联等。

其中最具有纪念意义的是李寿铨半身巨幅绣像，系请长沙驰名湘绣女工集体绣成，神采奕奕，和照片纤毫不爽。周围绣满赠送人姓名，上嵌厚玻璃，配上镂花木框，系仿效战国平原君时“买丝绣像”的故事。但比较起来，更加新颖。这件珍贵的礼物，至少需要四个人才抬得动，等到运回扬州后，墙壁负荷不了它的重量，竟无法悬挂。但在千丝万缕之间，却交织着无限深厚的隆情高谊。

民国十三年（1924）一月十二日，是李寿铨一生中最难忘怀的纪念日。他历经建矿、保矿、长矿，而这却是他最后一天离矿。当他想起几十年前光绪年间刚到安源时写的《安源山四韵》，抚今追昔，不胜感触万端。那四首诗句是：

“我居安源山，山高而无峰。登临复何望，邱壑藏吾胸。

夕阳无限好，倚树听泉流。恍处无怀世，旷焉谁与俦。

西有豺狼嗥，东有鸱鸢飞。回首望家乡，能归不能归。

尝胆不知苦，卧薪犹恐闲。长安望不见，天步此时艰。”

一月十二日，天刚黎明，在李寿铨住了近三十年的安源半山腰桐梓坡寓所，送行的人客，就熙熙攘攘，纷至沓来，只见里里外外，黑压压人头攒动。其中有各界首领、职员、工人，还伴着看热闹的人。在人丛中夹杂着无数的鞭炮，在不停地燃放，一片硝烟弥漫，震耳欲聋。那时还没有送花篮的风气，人们从山上采撷鲜花扎成一顶顶的花轿送来。到处人声鼎沸，热火朝天。上午十时，燃放的鞭炮围绕着整个人群，缓缓移动，由桐梓坡下山，向安源火车站进发。只听到一路鞭炮之声，万山响应。株萍路局早备好专列花车，最后一节车厢满置鞭炮，已有人用竹竿伸出窗外不断燃放，一直随车放到长沙才停止。本矿各首领、员司、全矿工人、各界代表，还有特地从醴陵先期赶来的友好以及地方人士等，都齐集安源火车站送行。矿区职工家属和居民，几乎全家出外，参观这一难见的激动人心的场面。真是万人空巷，热情洋溢，盛况空前。当车轮徐徐蠕动时，不知有多少人都黯然神伤忍不住眼眶中噙着惜别的泪花。车过萍乡城时，赣西镇守使萧安国、镇署参谋长陈毓斋、萍乡县知事夏子荷以及萍乡绅商各界代表都候在萍乡车站送行。副矿长舒修泰随车送到株州，采木处长刘文炯^{⑥①}和路局专员胡省三候在株州车站迎送。文牍课长舒群随车送到长沙，会计处总书记龙应图、长沙转运局长刘泰生候在长沙车站迎送。所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只得临歧挥手，互道珍重。车轮滚滚，继续驶向武昌，接着改乘长江“岳阳丸”轮船顺流东下而去。当时有人报导说：像这样发自内心的生动感人的热烈欢送场面，确实是极其罕见的。

李寿铨回到扬州后，租赁彩衣街卞总门一号江姓三进房屋作为寓所。^{⑥②}他从来不营私产，无房地田宅，提倡后人自食其力。他一生靠工资维持全家生活。自从民国十三年返扬后，上海汉冶萍公司支给顾问薪金；但他到这年底，便上书公司自请

停支顾问薪金。在矿近三十年，真是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恪遵母训，砥砺廉隅。他不迷信鬼神，反对赌博，所以家中从不拜神敬佛，从不打麻将牌。他平日读书、写字、赋诗、和老友茗叙、蒔花籍娱晚景；生平最爱兰花。每日黎明即起，做健身操，几十年如一日。他回扬州后，一面感到“树高千尺，叶落归根”的安慰，一面也经常引起对安源的无限憧憬和怀念。好在萍矿的许多老同事，随时给他来信，报告一切近况；对他来说，也可从中得到莫大的慰藉。我们从题为《还乡》的两首诗中，可以概括他晚年这段时期的思想感情。

“得遂还乡愿，扬州又卜居。园林经几易，风月近何如。难觅微时剑，重温旧日书。不须华屋住，天地一蓬庐。”

“我到扬州夏亦凉，晚风时送读书堂。当年争说萍庐好，绕屋棕榈出屋樟。”

民国十七年农历四月廿八日（1928年6月15日）李寿铨在扬州寓所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九岁。生有三子四女，子李为光、李为扬、李为章（参加新四军后改名彭谷）。女李为顺、李为勤、李为惠、李为嘉（参加新四军后改名毛维）。后裔殷繁，散居川、黔、桂、沪、杭、扬诸地。

李寿铨告老还乡后，一直未能回到他热爱的安源。八十年代初，他的次子李为扬终于实现了他父亲的遵好遗愿，并写下了情意绵长的诗篇。兹录两首于下：

水调歌头·李为扬·

一九二四年，因先父李寿铨告老离矿，遂与第一故乡惜别。迨八〇年十月，始偕三女李天田回安源探亲；屈指逾半个世纪。昭萍山水，时萦梦境，天涯咫尺，无限低徊。旧地重临，倍增亲切，情难自禁，率赋斯篇。

跋涉三千里，联袂上安源。一路蓼红浦白，黄叶碧云天，五十六载离别，乍见似曾相识，风貌胜当年。游子还乡日，喜泪湿征鞭。

凉薯嫩，茶花艳，米酒甜。罗霄奔来眼底，淥水绕襟前。巷轨纵横交错，厂舍鳞次栉比，高突吐长烟。无限留连意，心际永回旋！

（上词转载《萍矿工人报》）

注释：

- ①吉亮工，扬州著名书画家。后称“风先生”。
- ②李慎保的墓是衣冠冢。当时以一平民而死于非命，亦不知被何方所戕，故泛指为‘贼。’
- ③全诗收在1981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南社丛谈》第403页。
- ④开平煤矿在直隶（今河北）滦州乔家屯，光绪四年（1878）就开始用机器开采，民国元年（1912）和滦州

煤矿合并为开滦煤矿。

- ⑤湖北铁厂的厂址在汉阳大别山麓，所以被称为汉阳铁厂。
- ⑥盛宣怀，字杏蓀，江苏武进人。在清末任邮传部侍郎、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等职。创办汉冶萍公司后，担任总理、董事会会长等职。卒于1916年4月27日。
- ⑦据当时勘测：大冶矿脉在麻石、白石之中，倾斜四十度，直线约二百尺，含铁质百分之六十四以上，露出山面的有二千七百万吨。在地下的尚不计其数。
- ⑧据当时勘测：萍乡蕴藏煤量五万万吨，年采百万吨，可持续五百年之久。按规定合炼钢标准之煤，含硫量不得超出千分之十，含磷量不得超出百分之十。萍乡煤含硫量在千分之四以下，含磷量在百分之十以下。
- ⑨张赞宸，字绍甄，江苏武进人。当时任汉阳铁厂提调。
- ⑩光绪卅二年二月十一日致湖南聂俊威观察信。
- ⑪指张赞宸。
- ⑫萍乡地质属于古生代煤炭纪，煤多夹岩石间，煤层凡十。有老槽、列碧槽、三夹槽、底板槽诸名。
- ⑬赖伦G. Leinung德国著名采煤矿师。一八九四年十一月被延聘来华，合同二十年。多次勘矿，后任萍矿总矿师。
- ⑭文廷式，字芸阁，江西萍乡人。光绪庚寅科榜眼，侍读学士，瑾妃、珍妃的师傅。卒于一九〇四年。
- ⑮文家是萍乡大族。其族中人文觐龙、文觐墀、文觐光、文从读、文从说、文从谦、文从谏、文从评、文之纯、文之仁、文之智等都先后在矿局供职。
- ⑯志锐，字伯愚，满洲镶红旗籍。光绪庚辰科翰林，瑾妃、珍妃之兄。后任新疆伊犁将军。

- ⑰色黑如漆，光泽，挥发性少，粘结性高。一九〇五年经英国著名矿业专家史戴德化验研究，可以和英国最优质的达汉焦媲美。
- ⑱安源位于天滋山之支脉，高690尺，斜29度，其脉来自莲花之马迹岭。
- ⑲关防系朱文篆字两行，长九公分，宽五点五公分，边框宽四公厘。萍乡“等处”系包括上珠岭铁矿、白茅山锰矿、盆形岭锑矿、白竺山铅矿等而言。
- ⑳见1960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盛宣怀未信刊稿》第251页。
- ㉑Carlowitz & Co.
- ㉒其中五十万系股票。四百万马克当时合银一百四十四万两。
- ㉓先后据合同延聘的还有：娄格士、艾仕德、密海礼、土黻莱、伊士特拉、西礼夫特、布奄却脱、斯脱兰嘉、道尔伦、哈德礼、徐福史、梯尔、史奈德、哈斯拉、白米、小白米、非已那、邓考士、乌生勃里克等卅余人。
- ㉔三观是乡的名称，‘里’、‘图’相当于‘保’、‘甲’。
- ㉕三十人：文国华、黄士霖、李位堂、文廷钧、萧端翼、苏志林、李文沼、彭用世、李资堃、黄以筠、张弼汉、钟应德、文廷直、黄序明、苏灏、甘醴源、文乃麒、黄显章、黎慕尧、黄庭芬、张可嘉、萧嵩彬、李日华、易炳昭、李景勋、刘跃鳌、颜承筹、李显廷、倪镜蓉、李景云。
- ㉖十五井：黄家源中恒二井；龙家冲星顺利二井；高坑信顺三井、泰顺三井；紫家冲安顺二井；小坑吉顺三井。
- ㉗后来根据业务进行的情况，逐有新设和裁并之处。如增设洗煤、炼焦、电机、仓管等处；裁撤造砖、杂务等

处；合并材料、机料、买办等处；巡警处改矿警局；铁路处独立成铁路局。

⑳见《萍矿说略》第13章：“于总平巷外，次第建造平房十栋，计四十间。楼房两大栋，计六十六间，厨房仓房俱全。每一房屋住工人四十八名，共容工人五千余名。”

㉑汉厂过去向英、比等国购进洋焦，每吨价银廿余两，开平焦十三、四两，连杂费在内十六、七两。萍矿开采后，萍焦由十二两逐步下降，到光绪卅二年即下降至八两五钱。

㉒抗日战争期间，萍乡煤矿设备大部被拆运广西，其余亦被日军占领。历经沧桑，变化甚大。现在只剩总平巷、张公祠、盛公祠、办公楼、医院等少数建筑物，还依稀保存原来面貌。

㉓此诗收在《南社丛谈》第404页。

㉔‘友’指安源‘山’。

㉕此条当时为许多人书在扇面或挂在壁上作“座右铭”。

㉖此条当时被人们称之为“办事六字真言”——板、简、斩、懒、散、反。

㉗基址勘定后，清室临近覆亡，因款项支绌，新厂停建。

㉘安源建矿是戊戌年农历三月初一日，张赞宸逝世是丁未年农历三月初一日，因此李寿铨以后每年这天在“张公祠举行纪念会。

㉙“张公祠”现作安源镇公所，“盛公祠”现部分作职工宿舍。

㉚林志熙，字虎侯，江苏无锡人。

㉛薛宜琳，字贡玉，江苏武进人。

㉜据《鸿痕老人自述》丁未条：“时萍矿总办张又病故于沪，继任者为林君虎侯。林材具平常，开源节流，皆无

成效。

- ④①株萍路修建时，由矿局铁路处领导。成立株萍铁路局后，改隶交通部。
- ④②薛宜琳于建矿日起，历任宋家坊转运栈栈长、萍河稽查、巡警局长、株萍路局局长、会办等职，在矿十四年。此次竟临危退却，从此再未回矿。
- ④③中国科学院出版的《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一期第6页上刊登了这一篇日记。
- ④④符合应征条件者，先到德国驻长沙总领事署检验合格，即开赴青岛德军营入伍。其眷属亦即离矿回国。
- ④⑤“弹子房”俗称“波房”，相当来宾招待所。
- ④⑥此巨幅照片直至1924年仍悬挂该处。
- ④⑦民国二年三月廿日宋教仁应袁世凯电召入京商国会问题、黄兴等送行。甫入月台遇刺，宋教仁中弹牺牲。
- ④⑧江西省萍乡市《萍矿工人报》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在81年10月10日刊登了这三首诗。
- ④⑨舒修泰，字楚生，湖南长沙人。家住上海。
- ④⑩当时矿警局长沈成麟去职，由舒修泰于七月暂兼至同年十二月吴连庆任局长时止。
- ④⑪王昌学，字海涵，江西萍乡人。家住丹江嘉梓庙太史第。
- ④⑫1981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 ④⑬原书中所引，错误卅余字，天气漏列十三处，三天日记排错位置，现均经逐一校勘订正。
- ④⑭李茹辛，字毅寰，株萍路局处长。三方签字时任路局全权代表。
- ④⑮萧安国，字良存，湖北黄冈，赣西镇守使。使署在萍乡城。
- ④⑯萍乡县知事范子宣。

- ⑤⑦李鸿程，字翔侯。赣西镇守使署旅长。
- ⑤⑧舒群，字季俊，湖南湘乡人，萍矿总局文牍课长。三方签字时任矿局全权代表。
- ⑤⑨1922年9月20日发50号函，1923年1月16日发谏电，3月1日连发3号、4号两函，4月7日发阳电，6月20日发号电，6月21日发23号函，6月24日发27号函，均系辞职。6月25日接公司漾电慰留。6月29日发艳电，同日发29号函继续请辞，7月3日接公司江二电再次慰留。7月3日发江二电，7月11日发真电再三请辞，荐贤自代。
- ⑥⑩黄锡赓，字绍三，江西九江人。时任汉阳铁厂副厂长，经李寿铨荐举继任萍矿矿长。
- ⑥⑪刘文炯，字哲君，江苏武进人。建矿之初，任材料处长，民国三年兼采办处长，民国九年后任采木处长。
- ⑤⑫当时彩衣街东到盛世严关。解放后，关被拆去，卞总门改属东关街。

（转载《扬州文史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二辑）



地质学家喻德渊

李锡正

喻德渊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的高足。爱国爱党，著作丰富，对我国地质方面的成就，作了卓越的贡献。可惜在动乱期间，横遭迫害，疾病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才智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在六十八岁这一年，饮恨去世了。这的确是我国地质界一个巨大损失。

青 年 时 代

喻德渊字次回，一九〇四年在我国传统欢乐的春节的第一天，出生于萍乡市福田乡青溪村的一个中农家庭里。兄弟四人，排行第二。父喻际星，为人诚朴浑厚，在本村经营小药铺，经常为贫苦人民施医送药，颇孚众望。

一九一九年喻德渊就读萍乡县立中学。那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强占德国在中国的的租借地。而巴黎和会正式予以承认，从而爆发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喻德渊以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满腔热忱参加到这次运动的浪潮中去，做了出色的工作。一九二三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当时的北大，是一所兼收并蓄，较为民主的学府，各种新思潮，都可以自由发展。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同志，这时也在北大执教。喻德渊受到进步思想的薰陶，于一九二六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各种革命活动。后来李大钊同志被害，白色恐怖笼罩北方。而喻德渊仍不顾个人安危，深入长辛店铁路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罢工等活动，被张作霖的特警所察

觉，几次围校搜捕，均在同学们巧妙掩护下，脱离险境，最后化装潜至上海。

潜 心 科 研

喻氏到上海后，举目无亲。组织关系，在极端隐蔽的情况下，一时无法接上，茫茫大地，无所适从。刚好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到达上海，喻氏不失时机地前去请见。因喻在校为高材生，素为蔡所赏识，得悉此中情况后，深表同情，即出面而担保并荐入刚成立不久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从此喻氏便和地质学结下不解之缘了。

据他自己说：开始做磨片工。因为地质研究所购有大批关于地质的报刊书籍，他首先随便看看，越看越感兴趣。他的语文基础知识本来扎实，加上刻苦用功，经过一段时间，竟积累了丰富的地质学知识。地质研究所经常召开专题讨论会，如名教授李四光等也常到会讲话。喻氏经名师讲授，学业大进，陆续写出不少论文，李四光大为赞赏。

辉 煌 成 就

喻氏在地质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还不满足。他认为一种科学理论一定要和实践相结合，没有通过调查或者实践的理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秦岭地槽褶皱带的形成时代问题，过去一般认为是加里东期或海西期。喻氏作了调查之后，力排众议，认为是淮阳运动，即中生代早期形成的。后来几位专家相继深入调查，证明喻氏的看法是对的。已将此划为印支褶皱带（印支运动相当淮阳运动）。又如南方的板溪群是一套浅变质地层，过去认为是前震旦纪地层，喻氏经过研究认为是震旦纪，并写入了他的著作《中国地质学》一书中。现在许多学者都承认喻氏的立论是正确的。

他调查过南京、镇江间的岩石矿产，苏州地区地质及庐山构造，是研究这些地区地质的第一人。著有《宁镇火成岩地质史》、《苏州花岗岩》，绘制了《庐山地质构造图》等著作。

一九三一年他深入淮阳山调查地质矿产，写出了《扬子江流域之震旦纪地层》、《淮阳造山运动》、《大别山南坡之冰川现象》等报告和论文。中国第一幅地质图——《淮阳山脉地质图》就是他和朱森、李捷三人，在李四光教授的指导下编绘的。

一九三七年他继续对鄂西煤矿、湘西、黔东金矿进行了调查和勘探，都有重要发现。这些研究成果，资料详实，见解精确，至今仍为地质勘探部门广泛参考应用。

喻氏的著作很多，除上面已经提到的外，还有《宁镇火成岩地质史》（与叶良辅教授合著）、《中国的大地构造与矿产分布》、《庐山的寒武纪地层和岩浆活动》、《世界大地构造概论》等书。就笔者所知的《中国地质学》一书而言，有三十六万字。一九五八年八月地质出版社出版，到六〇年一月再版。只此一点，即可窥见喻氏著作影响之大了。

一九四六年前后，喻氏出国考察，最初到英国伦敦大学研究变质岩矿床，后又在剑桥大学研究地质学及岩石学。一九四六年秋到瑞士研究阿尔卑斯山脉地质构造及冰川，随后又到瑞典、挪威、美国等地考察。

在国外考察期间，工作认真，成果卓著，受到外国学者的推崇。有人劝他利用国外优厚条件，长留海外，从事研究。喻氏毫无为动，概行谢绝，于一九四八年回到国内。

这时中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国民党政府覆灭在即。喻氏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多年来的夙愿可以实现了。他断然拒绝了伪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威胁利诱，不肯与伪中央研究院一并迁往台湾，并拒绝了台湾大学高薪招聘而回到萍乡原籍，一家八口

过着清贫的生活，以待天明。

人 民 战 士

雄鸡一唱天下白。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喻氏接到周总理的来信，催他出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真使他欢喜若狂了，等不及在家过春节，立即简装进京。当即被任为中央科学院研究员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地质勘探局副局长。

新生的祖国，百废待举，但在千头万绪之中，各有其基本要图。站在地质战线来说，首先就要探明重点地下资源，以作发展工业的依据。作为地质学家的喻氏，对这些当然是最理解的。他首先提出勘探内蒙古自治区（北满）地质资源的意见，这个意见很快就获得批准。五〇年春喻氏率领地质研究所第七队开赴完达山及小兴安岭勘察。踏遍千山万水，终于找到了大煤田和铁矿。这年八月九日李四光同志给喻氏的回信说：“看来煤、铁矿均有希望，可谓幸事。此次北满之行，可谓不虚矣。”

五一年喻氏再率东北资源调查总队扩大勘察范围，对于好几个煤田及马蹄河铁矿，都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

通过两次勘察，喻氏深深感到祖国的地质人才远远满足不了地质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他向有关部门和领导提出要兴办地质教育，培养人才的建议。这一建议也正好符合当时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及东北局负责同志的意图，因此建议很快得到采纳。并派专人到他的驻地双鸭山，向他征求意见。旋由中央地质指导委员会和东北人民政府委托他主持长春地质专科学校（后改为东北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的筹建工作。虽然他的建议是被采纳了，但是要他放下多年从事地质勘察研究的实际工作又有些犹豫了。他去信问李四光老师的意见，李回信说：“今天人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喻氏听了老师的

话，毅然担起开创地质教育的重担了。

长春地质学院在喻氏的主持下（任副院长、院长、主管科研和教学一级教授），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种形式办学。基本建设，专业设置，长远奋斗目标，他都有设想有抱负。截至一九六六年度已经形成了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新型社会主义大学。十几年来为国家输送了上万名各种地质人才，并完成了大批科研项目。为祖国的地质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病魔与横祸

长期艰苦的野外工作，磨损了他的身体。一九五九年冬突然患脑溢血，一时病情相当严重。朱德委员长来电慰问，吉林省委、长春市委、学院党委均临床探望，并由副省长徐寿轩同志、吉林医大副校长徐选和同志、医大教授刘多三同志组成抢救小组。经过数天的悉心治疗，喻氏终于转危为安。

病后喻氏深深感到党的温暖，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党爱国的热忱。他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要求，矢志把学院办得更好，他不顾身体的虚弱，拖着偏瘫的左腿继续紧张地搞繁重的科研和教学工作。

一九六六年，风云突变，浩劫来临，喻氏横遭迫害。这时他又患着急性黄胆型肝炎，但是不准治疗，强迫带病接受“批判”。喻氏咬紧牙关忍受着，仍然坚持著述。三十多万字的《世界地质》一书，就是在这凄风苦雨中带病完成的。

恶毒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要置喻氏于死地，给喻氏扣上“资产阶级大学阀”、“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积极推行者”等罪名。以老弱病残为口实，赶出了学院，下放回乡。一九七〇年，喻氏和老伴，被迫迁回老家——萍乡。他离开了苦心孤诣创办的长春地质学院；他离开了朝夕相处的男男女女学生，心情是何等的沉重啊！

回到萍乡后，子女不准随同迁回，父母早已亡故，其他亲友谁又敢向“反动权威”接近呢？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每天坚持七、八小时工作。架着放大镜，压下格尺，继续著述和修改一些已出版了的书稿。

一九七一年五月四日李四光同志逝世了。李四光是喻氏平素最敬爱的老师，他们师生间的关系，至为密切。一九二九年间，喻氏按李的安排，在庐山搞地质调查，不管喻氏回来多晚，李氏夫妇都要等到自己学生回来，才去休息。几十年来相处共事，薪尽火传，高情厚谊，喻氏怎能不哀痛欲绝呢？

喻氏的身体经病魔、“人魔”一再折腾以后，已经很虚弱了，加以恩师的逝世，内亏外感，黄疸型肝炎复发了。看护没有人，营养谈不上，医药只几片维生素而已。可惜一代为国家为人民奋斗终生的科学工作者，还未来得及看到“春天”的再临，子女一个也没在旁，就这样含冤饮恨而终了。这多么可悲啊！

喻氏除地质专业职务外，还曾任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吉林副主任委员；民盟长春市主任委员；长春市政协副主席等职。一九七六年，元凶尽除，春回大地，喻氏冤情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祖国已象喻氏生前希望的那样兴旺发达。喻氏地下有知，也应含笑九泉了。

张学良在萍乡

周光明

谈起张学良将军，大家都会联想起“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前的头一年，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及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十七路军，因受中国工农红军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合抗日。人民公敌蒋介石仍坚持反共卖国政策，并亲自到西安布置“剿共”，残酷镇压抗日运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张学良到临潼，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痛切陈辞，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声泪俱下，蒋介石不听“哭谏”。张学良回到西安后，与杨虎城商妥，实行“兵谏”。于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八时，在骊山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一到南京立即被扣留起来，进行软禁。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开始了全面抗战。同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沦陷，十一月下旬南京失守，在此战局紧急时候，大约在一九三八年二月间，张学良在宪兵（一个连）的监护下，从安徽黄山来到萍乡。首先住在赣西饭店（即解放初期的昭萍餐厅，现在的萍乡镇税务所所在地），以后住在李子园一座宫殿式的楼房“绛园”里（即现在市人大的办公楼房），他身穿学生装衣服，外出时有两个穿便衣的宪兵跟随着。张有余同志（二中老教师、市政协委员）有一次看见他在土冲里（现在江

西煤炭学校所在地的柑子林里)打猎。熊痕戈同志(赣中报编辑主任,省政协委员)还看见他与赵四小姐在鳌中(当时萍乡南门石桥头的乐英堂内)打乒乓球。据钟石麟先生(城关区政协委员)回忆:“张学良在“绛园”时,了解到黄道腴先生(清朝秀才、曾任中山大学史地教授,解放后一九五四年任萍乡县委副书记,五五年又兼任萍乡县政协副主席)住在对面的一栋楼房里,便写了一张便条送给黄道腴,便条上写着:“黄道腴先生:有事相商请即来。毅庵启。相商什么呢?他要向黄道腴先生借《明史》看。”五十年代中期,我在县政协与黄道腴先生在一起工作时,他说:“张学良住在“绛园”时,多次要我去他那里坐,谈谈话。谈的是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他在萍乡逗留了两个多月,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了一封信,信中的大意是说:“现在我要离开萍乡到别地去,后会有期。”

最近查有关资料,张学良离开萍乡后,到了武汉,以后又转到长沙岳麓山。一九三八年十月又被转押到湖南沅陵县的风凰山,在一座古庙里住了一年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被押去贵州时,他在那座古庙的墙上写了一首诗:

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

少年鬓发渐渐老,惟有春风今又还。

我们不难想到,诗中那种“孤影远”、路漫漫”,是感叹自己和杨虎城将军。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全国形势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抗日烽火燃烧了大江南北,大好的信息如万里春风,吹遍神州,“惟有春风今又还”,这充分体现了张学良将军坚定乐观的情怀。

西安事变距今已四十七年了,然而神州早已换了人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欢迎张学良将军旧地重游。

日军侵略萍乡记叙

自一九三七年日军发动芦沟桥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卖国集团一直采取不抵抗主义，日军到处流窜，使中国南北广大地区人民遭受日军长期蹂躏。萍乡地处要冲，受害严重。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日军由岳阳强渡新墙河，平江、湘阴相继失陷。迨长沙陷落，遂采取进攻萍乡，经莲花、茶陵会师衡阳之计划。其左翼第十三师团全部、第三师团一部，共约三万人，分北西二路，侵入萍乡。六月十三日（阴历闰四月二十日）午后，北路分由澄潭江侵入湖坑，由大瑶埠入东峰界，十四日陷上栗市，复分为两部：一部折窜醴陵白兔潭、浦口市，十六日绕金鱼石入萍乡西境。一部于十六日南窜瑶埠、庙岑、马栏冲、杉木（别队由醴陵拖田、逾雪子岑、水碓冲、西坑来会）、螺丝山、赤土坡（分支走城下、石溪、黄亚冲、辽冲至芭蕉坑）、洞山，十八日陷长平里（别队由赤土坡经夏家岑、南源山、斑竹陂、老祖庵至长平里）。十九日长平里日军复分股向各方搜索前进，一由土壕里、太子庙、淡背，窜横冲嘴、岩鹰山、下坪洲、长坑、马岑，旋折北行，经架古石、石溪至淡坑，兜圈回窜。二十日，别队自醴陵桥岑，经盆头岑来会，后分为数股：一自城下绕回赤土坡，二十一日至芭蕉坑，流窜黄泥坑、大坑、泉冲一带，掳掠食物。二十二日，一自石溪，经土壕、淡背，至下平州，趋荷尧，与西路日军会流。一自长平里经槐岑、温盘、朱家坊、田心至长冈。一自枫树岑经双山至福田桥。一自佛岭经边坑，至昙华、王家坊。二十一日（阴历五月初一）由浏阳增援，再陷上栗市之日军

窜至南源、关下，复分为二：一股于二十二日经案山关、文甲陂、清溪、石背至县华；一股经水尾、中墩、杨岐、小槐至东源冲、河口前。二十三日，一由县华、王家坊、长冈、院前、田心，分窜彭家桥、周江边各地区；一由田心、米筛岑、道士观，窜彭家桥及县城北门；一由河口前、江峡岑、冷田，窜赤山桥。二十六日，自观山庙与县日军会流西撤，此北路各股流窜之大概情形也。

西路日军，自上栗分股绕醴陵、东富，于十六日晚窜入金鱼石。二十日陷荷尧，分为二股；一股于二十一日陷湘东（日军别队曾由美田桥经小西路，窜至县城），窜赵家店、葡萄岑、马岑，二十二日陷萍乡县城。一股自喻家湾经杞木、下埠、浏公庙、庙岑，复分支：一经麻山、桐田，窜小桥下；一经三山、大田、五陂下、丹江与县城日军会合。西路另一股约三千人，自视头洲窜入老关，经登官、腊树下、麻山、三山、沅头、走山僻小径出乾村，于二十二日陷南坑，与县城及小桥下之股，合攻五陂下、乌龙桥，又经丹江窜入县城。县城日军复据安源，东窜九里坪、锡坑、白沅、大坪各地区。此西路各股流窜之大概情形也。

日军之撤退，自二十四日即开始向县西南移动，曾由麻山分股千余人，经牛头、牛尾、白竺窜入攸县，至二十八日，全部经美田桥退出萍乡境。

自长沙国民党守军退至上栗市后，日军乃调其三十四师团之一部与二十七师团之一部，共万余人，于七月十二日（阴历五月二十二日）由醴陵白兔潭窜麻石进犯上栗，未能得逞，乃改用迂迴战术，分为三路：中路自麻石绕白兔潭、浦口市，十六日窜入金鱼石及老关，二十一日至长春铺、黄花桥，二十二日陷湘东，向县城进攻。南路则由老关绕美田桥，窜登官、下埠、杞木、浏公庙，二十二日窜麻山，复分股：一经小桥下、

略下、水口，入大西门；一经井冲入小西门，大部自麻山窜茅坪、三山、白云山、乌云冲、大田，经槽水沅、轿田、沅头、乌龙桥于三十日陷南坑。北路由白兔潭经上栗之马鞍山，窜火石桥、南沅、案山关、烟竹圪、青草窝，于二十五日至小枳，再东绕上埠，越宜春院前、山背，经石观前、银凤岑（分支窜京竹）、南陂、东圪美，于二十六日午前九时陷芦溪。二十七日窜上埠、茅埠岑、易家坊，二十八日至新村，又分支由高冈埠与县城之股会合。由庙前与南坑之股会合后，由株树下窜坪村，至三十一日分三路向南移撤。一由南坑经宗里，一由坪村经杂下，一由白竺经上村共窜莲花。此日军第二次窜萍乡之大慨情形也。

总计日军流窜萍乡，第一次自六月十三日入湖塘，至二十六日退美田桥，几历十八天。第二次自七月十二日进犯上栗市，至八月九日，分由大、小西路退去，几历二十九天，合计两次流窜，几历四十七天。

日军窜萍，几所经过之处，附近数十里之村庄均遭其蹂躏，奸淫掳抢，劫洗一空。庄稼饲战马，木器充柴烧，牲畜家禽，宰杀无遗。难民转徙深山，又被国民党军追踪搜检，所携盐米衣物，掠夺净尽，虽伞扇巾鞋，亦难倖免。妇孺老弱，逃匿丛莽，忍饥耐渴，祈保性命。昔人谓：“寇过如梳，兵过如鼠”，今信然矣。

（市志办供稿）

日军入侵萍乡受灾情况

根据馆藏资料记载，日本侵略军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和七月，先后两次侵犯萍乡。在萍乡境内盘踞四十七天，除桐木、廷宣、大安、新安四个乡镇以外，全县各乡镇都直接被日军骚扰。

日军第一次侵犯萍乡是六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历时一十八天。侵犯的兵力，有第十三师团全部和第三师团一部，计三万余人枪，并附有骑兵一联队和大炮数十门。第二次侵犯萍乡是七月十二日至八月九日，历时二十九天。侵犯的兵力，有第二十七师团和三十四师团，约三万人枪，并有相当骑兵和炮兵。当日军侵犯萍乡时，虽有国民党军队二十六军、五十八军、七十二军、一八三师、一六二师和九十九师，先后在萍乡布防和阻击。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有的国民党军队不打则逃，致使日军所犯之处，奸淫掳掠，无所不用其极。第一次侵犯萍乡时，恰逢春荒季节，遭灾很重。第二次侵萍时，正值早稻成熟时节，驻扰最久，蹂躏更甚，遭灾更惨。鬼子进犯，百姓逃难，躲居山谷，日饿夜露，谈何耕耘！至使早稻收获不及三成。死人死牲，臭气难闻，疫痢流行，损失惨重。据当时的统计，日军两次侵犯萍乡共死亡人口达二万九千零一十七人（其中被日军杀害一千三百一十八人）；被掳二万一千二百三十六人（其中充伕五千余人）；被奸辱六千三百八十九人；房屋被毁八百零一栋；谷米被损四十万零七千七百零六石；杂粮被损一十九万六千二百九十六石；棉花被损一万八千八百八十五担；服饰被损（法币、下同）十亿零七百七十六万四千八百五十九

元；食品被损九亿零七百七十九万二千二百二十九元；大小耕牛被损五千五百七十二头；猪被损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五头；鸡鸭鹅被损一百七十万零四千一百五十八只；农机具被损八千七百零六万七千二百一十七元；公物被损四千七百四十八万二千六百六十三元；公务员物资被损二千零四万一千二百九十六元。

（市档案馆曾祥丁供稿）



萍乡人口统计资料

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08年），全县二万二千七百二十二户，五万一千一百四十八人。其中主户七千五百六十九户，一万七千七百三十五人；客户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户，三万三千四百一十三人。

宋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全县三万五千四百五十九户，六万六千四百人。其中主户二万二千八百九十六户，四万五千三百一十六人；客户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三户，二万一千零八十四人。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全县一万五千一百二十五户，七万九千四百三十一人。其中民户一万零九百九十六户，五万六千零九十二人；军户三千六百一十九户，一万九千七百八十七人；匠户五百一十户，三千五百五十二人。

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全县一万五千七百二十八户，十万零九百零五人。

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全县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五户，十万零五千一百五十一人。

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全县一万六千八百一十七户，一十一万二千零九十八人。

明宏治十五年（公元1506年），全县一万六千六百四十一户，一十一万六千七百五十五人。

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全县一万六千六百四十八户，一十一万六千七百八十四人。

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全县一万六千五百九十

五户，一十一万八千六百三十七人。

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全县一万七千三百四十七户，八万四千六百四十四人。

明万历年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全县一万七千三百四十七户，一十一万八千零九十二人。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全县四万八千一百九十八人。

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全县三万九千二百八十五人。

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全县四万三千六百二十五人。

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全县一十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四人。

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全县一十三万六千三百九十五人。

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全县一十三万六千七百七十一人。

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全县一十三万七千三百九十三人。

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全县一十三万七千九百一十六人。

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全县一十三万九千三百二十六人。

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全县一十三万九千八百二十八人。

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全县一十四万零五百一十五人。

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全县四万六千八百九十一户，一十九万四千七百七十一人。

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全县四万七千零一十四户，二十一万五千六百五十八人。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全县十万零一百九十二户，五十万零八百九十三人。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全县五十五万人。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全县三十七万三千七百六十八人。

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全县四十万零八千三百四十六人。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全县九万一千八百零七户，四十三万零一百一十二人。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全县一十四万五千六百八十四户，六十一万二千三百零八人。其中：男三十二万四千零五十一人；女二十八万八千二百五十七人。

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市一十六万五千户，八十万零四千六百八十五人。其中：男四十二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女三十八万零七百六十二人。

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市二十三万二千八百九十六户，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六十二人。其中：男六十三万四千七百零五人；女五十九万零五十七人。

（市志办供稿）

民国时期

萍乡的历任县知事、县长

钟石麟

萍乡，自“三国”孙吴宝鼎二年（公元267年）设县，至清末止，各朝代均于城内设有“县官衙门”，或称“县正堂”。

“县官衙门”置“县官”（七品官级）一人（士人称之为“公祖”或“父台”，一般老百姓称为“父母官”）来掌握全县一切政事，操生杀予夺实权。清朝在萍乡最后（1910年）一任“县官”为汤兆舆，随政局大变，官制改革而告终。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萍乡县官衙门”，则更为“萍乡县公署”。“县官”改称为“县知事”。直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下期，北伐军到萍乡，取消“县知事”名义，改称“县长”。“县公署”的名称仍保留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上期止，从七月起，“萍乡县公署”便改称为“萍乡县政府”了。

从民国元年（1911年）起，至1949年7月萍乡解放，这一段时间，在萍乡县的历任“县知事”和“县长”姓名，按时间前后次序，分别回忆如后，供作史料参考。

第一任县知事钟震川，别名钟涤源，萍乡南路七保人。清末秀才，留学日本。1912年上期，经地方民选为萍乡第一任县知事，任期半年，当时年约三十岁。钟在日留学时，加入孙中山先生创建的革命同盟会，并担任组长。钟任萍乡县知事期间，依法惩办了一个冒充都督，在赣西境内到处勒索民财的胡渊。人

心大快。

第二任县知事欧阳绍益，江西分宜县人。留学日本。1912年下期至1913年上期任期一年。当时年约四十岁。

第三任县知事王琨，东北人。1913年下期至1915上期，任期二年。当时年约五十岁。

第四任县知事刘乃晟，东北人。清光绪时举人，1915年下期至1917年上期，任期二年。当时年约五十岁。

第五任县知事沈桂华，别名沈泰岩，湖北黄冈县人。清末拔贡，法政学堂毕业。1917年下期至1919年上期，任期二年。当时年约四十岁。沈在任职期间，“五四”运动发生，曾布告禁用日货，发动学生、市民游行宣传。

第六任县知事范镛，别名范子宣，湖北黄冈县人。清末秀才，法政学堂毕业。1919年下期至1920年下期，任期一年半。当时年约四十岁。在任职期间，兼任“赣西镇守使署”军法官。

第七任县知事夏家鼎，别名夏子芳，湖北黄冈县人。法政学堂毕业。1921年上期至1923年上期，任期二年半。当时年近四十岁。在任职期间，兼任“赣西镇守使署”军法官。

第八任县知事张鹏翮，湖北人。北大法科毕业。1923年下期至1924年下期，任期一年半。当时年近四十岁。

第九任县知事沈桂华，别名沈泰岩，湖北黄冈县人，清末拔贡，法政学堂毕业。1925年上期至1926年上期，第二次任萍乡县知事，任期一年。第二次到任书写对联“六载重来，幸此地关怀犹切；一言相告，与帮人相见以心。”对联悬置大堂两楹，以予表态。

第一任县长朱孜蓉，湖南礼陵县人。湖南大学毕业，共产党员。1926年下期至1927年2月，任期七个月。当时年约三十岁。在任职期间，建立了县党部（国共合作）、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县妇女联合会、县学联会及县属各人民团体。1926

年11月某日在萍乡召开六万余人公审大会，朱县长亲自主持，公开审判处决土豪恶霸叶先均（又名叶紫屏），人心大快。

第二任县长潘振纲，湖南礼陵县人。1927年三月至同年四月，任期一个多月，因与地方舆论不洽而自动走了。当时年约三十岁。

第三任县长方芝祥，江西抚州人。当时年约三十岁。这个人是国民党右派政府派来萍乡接任县长。在未接任之前，住在县城凤凰池周兴街民生旅社。为时几天，到处进行反革命宣传。经当时各机关革命人民团体侦悉，逮交人民特别法庭公审，确有反革命事实，判处死刑，予以枪决。

第四任县长罗运磷，别名罗松岩。江西萍乡上栗市人。北京大学毕业，共产党员，原任萍乡中学校长。1927年5月，民主选举为县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军阀许克祥五月在长沙发动“马日”反革命事变。六月初，罗县长会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及萍乡各革命人民团体，成立军事委员会，组织工农自卫军，支援湖南工农革命。六月五日，湖南军阀许克祥派出两营兵力前来萍乡镇压工农革命，捣毁县党部、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及各革命人民团体。在这危急关头，罗县长与大队长蔡苏民领导工农自卫军奋力抵抗，不幸在十里铺战斗中二人光荣牺牲！这就是萍乡历史有名的“六、五”事件。罗县长当时年约四十岁。

第五任(代)县长钟爱菊，别名钟锦珊，萍乡湘东樟树下人。清末秀才。钟在朱（攷砻）、潘（振纲）、罗（运磷）历届县长期间，连任萍乡县公署第一科科长，管理刑、民事务。“六、五”事件后，萍乡政治，几成真空。六月十日，萍乡县各界人士公举钟为代理县长。同年八月中，钟辞去代县长，任期两个月。当时年约五十岁。

第六任县长(县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树韩，别名张亦璇，萍乡南门外张家大屋人。江西法政大学毕业。1927年8月中旬

钟爱菊辞去代县长职务，由当时所谓“五路”（东、西、南、北、小西）士绅出面组织“萍乡县政委员会”。以张树韩、彭师武、肖异群、张运鸿、陈锡衡、刘晴岚、刘万顷、彭敬业、喻兆芬、何竹荪、李春明、李国栋、潘卓等十三人为委员，并推举张树韩为主任委员。至同年11月底，任期三个月。当时年约四十余岁。

第七任县长傅作霖，别名傅润和，云南人。原充任北伐第三军（朱培德部）参事。傅随第三军步兵独立团团团长陈傅文（云南人）带一团兵力，驻扎萍乡和安源，专事清共。至1928年6月底任期半年。当时年约四十岁。

第八任县长张豪，江西抚州人。国民党南京政府内政部主办县长考试及格。1928年7月至1929年6月，任期一年。当时年约三十岁。张在任职期间，共产党员邓贞谦、张宗和、文瑞云、段家琦、钟焕全等革命烈士惨遭杀害。

第九任县长张军略，湖南人。原充任湘军校级军官。1929年7月，由驻军指派为萍乡县长，至同年12月，任期半年，当时年约三十岁。

第十任县长王政诗，湖南湘潭人，军校毕业。1930年1月，由湘军驻军指派为萍乡县长，至1930年5月，任期五个月。当时年约三十岁。

第十一任县长袁贤荣，江西南昌人。江西法政大学毕业。1930年6月至同年10月，任期五个月。当时年约四十岁。

第十二任县长王衡，湖南人。中央军校毕业。1930年11月，由驻军六十二师指派为县长，至1931年10月，任期一年。当时年约三十余岁。在任职期间督建碉堡，在北门外建飞机场，并在北门土城里设置电网。

第十三任县长谢旗章，江西万载县人。法政大学毕业。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任期八个月，当时年约五十岁。

第十四任县长柳民均，萍乡上栗市人。法政大学毕业，1932

年7月初接任县长。办事主观，肆意增加税收，侵犯商民利益，遭到各公法团体开会反对。接任后十天，即自动离职。当时年约四十岁。

第十五任县长危宿钟，别名危励凡，萍乡麻山小桥下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曾任师长及湖南警备司令等职。1932年7月在任“江西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区保安司令期间，兼江西省保安第四团团长，又兼任萍乡县县长，至同年9月，任期三个月。当时年约五十四岁。

第十六任县长吴建中，别名吴作民，萍乡芦溪东阳人。江西讲武堂出身，曾任赣军师、旅长。1932年10月在任江西省第二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期间，兼任萍乡县县长，至1933年4月，任期七个月。当时年已五十岁。

吴建中、危宿钟在任职期间，配合蒋介石围剿革命根据地，残杀共产党员，镇压革命根据地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第十七任县长宋寿梅，湖南浏阳人。1933年5月至10月，任期半年。当时年约五十岁。因与专员公署不协调而自动辞职归籍。

第十八任县长肖淑兆，别名肖池云，萍乡彭高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任国军团长，军、师部参谋长，浙江温州防守司令等职。1933年11月至1934年6月，任萍乡县长八个月。当时年约四十岁。

第十九任县长易白庚，湖南人。军校毕业。1934年7月，由驻军（何键部）指派为萍乡县县长，至1935年2月，任期八个月。当时年约四十岁。

第二十任县长危宿钟，别名危励凡，萍乡麻山小桥下人。1935年3月以“江西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第二次兼任萍乡县县长，至1937年11月，任期二十个月。当时年已五十六岁。

第二十一任县长朱志纯，别名朱朴安，江西赣县人。法政

学堂毕业。曾任专员公署第一科科长。1937年12月至1938年9月，任期十个月。当时年约三十岁。因积劳吐血而死，灵棺运往赣南，当时有人书写挽联：“十月宰萍乡，未舒抱负身先死；一棺回赣水，长使亲朋泪满襟。”

第二十二任代县长李帮直，别名李赣夫，萍乡桐木人。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毕业。1938年10月任专员公署教育科长时，朱县长吐血而死。专员危宿钟即报呈江西省政府，保荐李帮直代理萍乡县县长，至1939年5月，任期八个月。当时年约五十岁。李在任职期间，正是芦沟桥事变之时，抗日战争爆发。李在萍乡组织县、区“抗敌后援委员会”，派民工修筑国防工事，拆毁城垣，毁坏公路、铁路和北门飞机场，炸毁铁路桥梁等。

第二十三任县长缪忠模，别名缪少鹤，江苏武进县人。大学毕业。曾任江西省瑞昌县县长。1939年5月至1944年4月，任职五年。当时年约三十岁。

第二十四任县长曾敬持，别名曾时中，江西永新县人。黄埔军校毕业，曾任中央党部干事。1945年5月至1948年2月，任期近三年。当时年约四十岁。

第二十五任县长李治华，江西永新县人。法政大学毕业。1948年3月至1949年3月，任期一年。当时年约三十岁。

第二十六任县长吴义方，江西赣县人。大学毕业。1949年4月由江西省指派，至1949年6月底，萍乡即将解放。吴离开萍乡，任期不到三个月。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萍乡最后一任县长。当时年约三十岁。

吴走后，不久萍乡解放。县政府各项移交手续，经地方公推黄道腴先生会同原县政府许以刚、赖清辉、冯基斌等向军代表办理移交。

以上所列举的民国时期的历任县知事、县长的资料，因原无记载，全凭回忆写出，难免遗漏或差错之处，望知情者予以鉴核、订正、补充，以利存真。致感！

萍乡上栗花爆古今谈

王以茂

(一)

“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这一副春联生动地表明了人们燃放鞭炮，欢度春节的情景。其实鞭炮的作用，远远不止此，每逢国家大典，鞭炮声表达万众欢腾之象；私人喜庆，又是以掀起热烈欢乐的气氛；在吊唁丧礼中，它具有肃穆沉痛的意味；在时疫流行时，它又有杀菌消毒的功能。有人说鞭炮是迷信用品，这是偏见。鞭炮已成为人们需要的生活用品。

鞭炮俗称爆竹。公元六世纪即南北朝时期，我国南方就有正月初一在庭前燃烧竹筒的习俗，用以驱散山岚瘴气，预防疾病。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用硝石、硫磺、木炭制成火药。元朝广泛使用。东汉蔡伦造成纤维纸以后，人们将竹筒改为纸筒，由单响制成连串响，始有鞭炮。多少年来，墨守成规，迄无改进，新中国成立后与焰花炮相继发展，现已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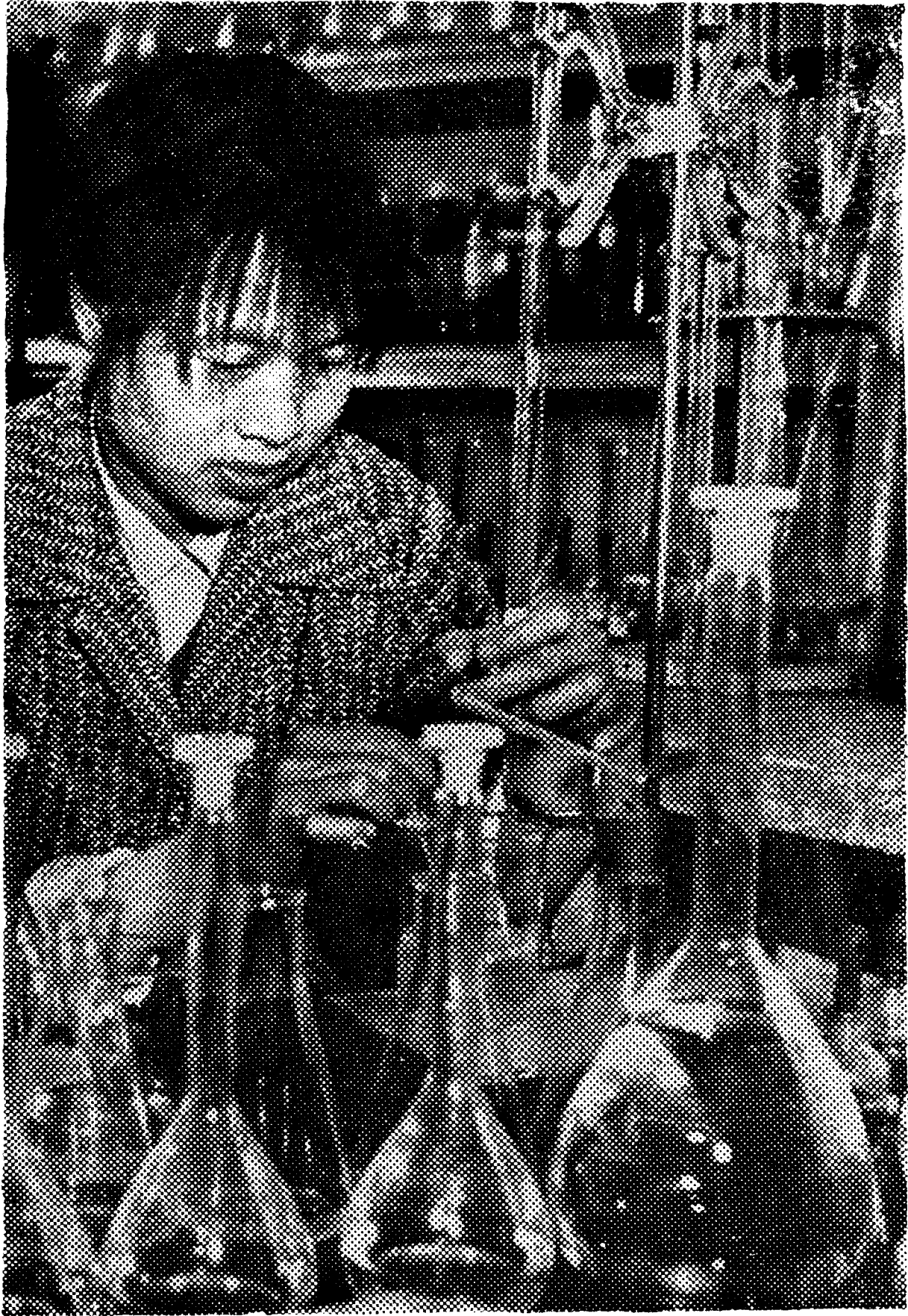
上栗毗连湖南，系萍、浏、礼交界的中心集镇。交通方便，水路可由渌水达湘江，陆路有浏万公路畅通长沙、南昌。上栗是个半山区，盛产毛竹。毛竹是造纸的主要原料，为发展鞭炮业创造了条件，加上其它原材料资源丰富，早在明代即以盛产鞭炮闻名。因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上栗地区城镇居民和广大农村

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有做鞭炮的技术和习惯。农忙耕田，农闲做鞭炮，家无闲人，老少咸宜，成为当地群众的主要付业。上栗鞭炮不仅畅销国内市场，同时还远销国外。如：香港、南洋及全国各大商埠的鞭炮商人，相继云集上栗。最盛时期，当地有鞭炮手工业作坊千余家，经营硝纸业务的二十余家。代客收购鞭炮子庄三十余家，专门从事经营鞭炮业务。有名的爆庄如：豫庆美、元记乾、元记震、正利乾、元记本、鼎元和等。均以多财善贾著称。其中鼎元和老板丁佑魁还在香港开元隆行、上栗设和珪本庄。这些有名的爆庄多数发行本票，兼营钱庄，资金充裕，周转迅速，获利甚巨。上述经营鞭炮生意资金雄厚的除“西客”即香港、南洋等地的外商外。当地又以原籍湖南浏阳的人多，故以上栗收购成箱出口和内销的鞭炮，从每封包装到整箱封面上，都印刷有“楚南”二字，故长期以来人们都视湖南浏阳为“花炮之乡。”其是历史悠久、驰名中外的出口广装如：顿边、八扣、满红鞭炮，则全是上栗地区生产，历史上购销的集中地也是上栗。据不完全统计，清末民初出口广装鞭炮生产达40万箱。内销全国各地加花达100万箱以上。由于上栗的鞭炮生意发达，带动了百业兴旺，市场繁荣，处在栗江两岸的集镇，曾一度有“小南京”之称。

抗日战争前夕，原在江西省国民党党部的周步光（萍乡人），曾打算将上栗鞭炮独树一帜，打开外销局面，曾通过江西裕民银行在上栗设庄收购鞭炮出口香港、南洋等地，树江西萍乡上栗监制的名牌。后因受习惯势力的束缚，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在旧社会，因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地方工业要想得到充分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上栗的鞭炮业就是这种情况，有个时期似乎很兴旺发达，曾几何时便一落千丈，加上日军入侵，抽丁频繁，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人民生活陷于绝境，鞭炮业也就随之奄奄一息了。



编织编炮



配制烟花药料（方敏摄）

(三)

解放后，人民政府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大力扶助工商业，上栗的鞭炮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五〇年上栗镇有大小工商户400多户，其中便有鞭炮业30多家，硝纸业30余家。香港元隆行设在上栗和姓本庄，兼营代客买卖业务。全国各大商埠如：上海的裕湘、湖南长沙的天闻声、福记。浏阳的蔺同仁、刘飞阁，汉口的福华，福建厦门的林立生，以及广州汕头，广东湛江等地的鞭炮商亦云集上栗，鞭炮业又重新活跃起来，产量逐年有所增加，这一方面的资金达40万银元之多。

解放前上栗只产鞭炮，没有焰花。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助下，随着社队企业的发展，增加了焰花炮的生产。特别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工农业生产稳步上升，各行各业欣欣向荣，上栗的花炮业务有了新的的发展。尤其是出口焰花从无到有，发展很快。目前全区有社办的出口焰花及鞭炮厂19个，厂房成片，规模壮观，拥有职工3557人，资金1178.35万元，其中固定资产419.35万元。年定额平均流动资金759万元。大队办鞭炮厂91个，拥有职工4401人。产量逐年上升，78年上栗出口焰花24568箱，83年出口焰花65371箱，鞭炮19757箱。全区辖八乡一镇，有人口38.5万，人平耕地仅五分，80%以上从事鞭炮焰花生产。年产出口内销焰花和鞭炮30万箱，按焰花税率5%，鞭炮税率35%筐算可向国家纳税830万。此外，做一箱焰花或鞭炮，分发广大城镇居民、农民的下手工序如：扯筒子、闭筒子、钻眼、裁引、紧口、编织等的厂外加工费每箱计达31元。一年可给群众增加付业收入930万元。对发展国民经济，促进四化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萍乡花果话今昔

王舜笙

(一)

萍乡是赣西的重镇，夙以产煤闻名于外。其实萍乡的花果，也是独具风格的特产之一。本市人以此作为馈赠亲友的佳果，外地人购作纪念的珍品。这种花果造形美观，雕制精巧，风味独特，见者无不啧啧称羨，大有掌上赏玩，爱不忍咽之枕。

近年有人把花果辗转寄给海峡彼岸的亲友，据接回信人谈：远方游子，接到花果品后，见物生情，凄然泪下，故土之思，油然而生。别小看这小小的花果，它对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呢！

(二)

花果的制作，有切、雕、煮、荡、晒、糖、渍等二十多个工序。工人们要付出辛勤的劳动，还有许多技术工种，不是一般工人所能胜任的。原料则选用幼果（没有成熟的水果），如：橙、梨、桔、桃、李、枣和橄榄等，还有瓜类、豆类、萝卜、辣椒等也可。工人们按照原料的形状颜色，雕成各式各样的成品。有形态逼真的飞禽走兽；有栩栩如生的花卉虫鱼；有玲珑精巧的楼阁浮屠；还有镂空剔透的绣球宫灯，真是千姿百态，不一而足。

在造型精美的同时，还要不加任何色素，保持果菜原有本色本味，做到色、香、味、形四美俱全。有人说萍乡的花果，不仅是一种高尚的食品，而且是一种精致的工艺品。这实在没有夸张。

此外橙桔还有止咳化痰，润肺生津之效。无怪乎萍乡花果之誉，不胫而走，远近闻名了。

(三)

萍乡花果产于何时？很难说出一个准确时间。不过按萍乡习俗，每逢举办婚礼，或者节日款待宾客，都要摆出花色别致的高级果品，以相炫耀。花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但正式作为商品加工出售，则始于萍乡城内，月光塘的私营日新德花果店。该店系由名叫欧阳子裁的熟师及其子女开设。据其第六子欧阳晋回忆，这片小店在一九一四年间就开设了。最初是欧阳子裁的长女欧阳巧英掌管加工，长子欧阳泉溥负责经营，家中几个人小吹小打，小买小卖，花型品种也不多，收入有限，仅足糊口。其他四个儿子相续出生长大后，除老二外出学徒外，其余都陆续参加花果生产。从一九二九年到三九年这十年间，子女儿媳共有十余人组成一家班的生产经营，这段时间的生产逐步扩大，也是日新德花果销售最旺时期，一般年产量达五千余斤。当时的橙花每一百朵卖价银洋一元五角，其他雕花因花工多，卖价达三元多。

由于他们在技术上日益求精，能广泛地利用多种果菜加工，故花型品种均有很大增加。为了方便群众，采用玻璃纸盒盛装的办法，装璜精美，深受群众欢迎。花果的花型品种由原来的十余个扩大到八十余个。销售由近而远，遍及湖南长沙和本省南昌等地。尽管这个小小的花果店设在偏僻的街巷里，外来旅

客仍风尘仆仆地找上门来购买。特别是湖南长沙客商，经常来店成批购往当地销售。在湖南国货馆里，曾经设有专柜陈列萍乡日新德的花果出售，受到群众的赞赏。

随着产品销路日益扩大，不仅国内闻名，而且还远销到国外东南亚一带。曾一度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得过奖，起到了为国争光的作用。当时江西省的有关部门，还给日新德发过三次奖状。

但在当时，花果生产完全靠手工操作和日光曝晒，由于条件的限制，实际加工每年只有四至十月份七个月的时间。规模小，产量不大。尽管如此，这个一家班的花果店还是努力经营生产，因而扩大了业务，获得了相当利润，积累了一定的资本。

过去晒制花果的白糖完全依赖进口。抗日战争期间，外糖供应中断，食糖紧缺，加上战火漫延，遍地疮痍，花果产销逐渐萎缩。日新德的家中成员也先后弃置本业，转事其它行业经营。故后来日新德的名牌虽在，花果生产却已一蹶不振。临到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这种珍贵的民间工艺传统食品也接着日益凋零，由盛而衰，几乎绝迹于市场，熟悉日新德花果生产者颇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

(四)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萍乡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百业复苏，欣欣向荣。原日新德从业人员欧阳亿中，虽已另开百货商店，但他既有一定文化，又全面掌握了加工花果的技术，亲眼看到党对民族工商业政策的正确贯彻，国民经济很快走上了恢复和发展，遂产生了重整旧业，恢复花果的打算。经过工商联的鼓励和帮助，他和爱人李咸宜终于拿起了花刀，重新开始了花果生产。凭着他的专长，推陈出新，创造了很多新的花

型。萍乡花果于是又以逗人喜爱的丰姿，重现于市场。

一九五八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欧阳亿中及其爱人均被安排在食品厂花果车间工作。由于党的耐心教育和鼓励，使他提高了认识，在工作中认真发挥自己的专长，与职工群众一道，努力进行工艺革新，改进产品质量，加强技术培训等工作。例如橙花销量较大，全靠手工操作，产量较低，满足不了市场需要。一九五八年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他经过反复琢磨，制成了压花机。并与职工一道，研究改进了烘房设备，从而有效地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效，扩大了生产。他还根据自己的经验，设计绘制了花果图案一百三十余个，并写出了有关制作方法材料，对促进生产和加强技术培训，起了一定作用。

由于党和政府对花果生产的重视和支持，保证了原材料的供应。在三年暂时困难期间，食糖比较紧缺，还对花果生产给了食糖专用指标的照顾。特别是加强了对职工的技术培训，扩大了厂房设备，开展了对花果的科研工作，使这一著名的传统食品，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重新获得了生机，出现了百花盛开的景象。与解放前比，一切都有巨大的变化。

现在，萍乡花果厂的厂房已由解放初期的小型作坊生产扩大到一千多平方米的面积；烘房由原来合营时的一小间现已增加到十个大间；在技术革新方面，由手工压花改为电动压花；由手工拌糖改为半机械化拌糖；由手工缩水改用离心去水机缩水，从而加快了生产过程，适时供应了市场需要。在加工花果的同时，又结合发展了蜜饯生产。一九八二年有专业加工人员三十余人。全厂产花果30余吨，蜜饯30余吨。一九八三年的花果产量增加到50余吨。清洁卫生条件已比过去有了很大改进和提高。整个生产旧貌变新颜，业务蒸蒸日上。

但随着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提高，现有花果生产远远

（下转5页）

杨 歧 山

杨歧山位于萍乡市北部，距市城35公里。东邻宜春水江，南靠东源，西连上栗，北毗宜春慈化。绵亘55平方公里，跨萍、宜边界。主峰张口岭海拔947.6米。相传为战国初期为我国思想家杨朱泣歧之处，故名杨歧。明葛琨《杨歧山诗》有句云：“却笑杨生异，无端泣路傍。”

杨歧山大部地层为变质岩。气候温和，雨量充足。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盖面积4万余亩。以松、杉、油茶、毛竹为主，间以灌木林。地下矿藏以煤为主，现有黄冲、金鸡、南源、中段、三垄、焦源等矿开采。此外，还有较为丰富的水利资源，萍水和栗水分别发源于其东麓和北麓。现建有枣木、新坝、多宝寺和杨歧等水库以及小型水电站，总蓄水量达1738万立方米。

杨歧山风景秀丽，山之峻，水之绕，岩之峭，石之奇，皆足以娱人。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主峰张口岭，俨如雄狮昂首，张口滚球，登巅远眺，百里风光尽收眼帘。万仞峰高峰冲列，陡峭崎岖，望之如参天半。龙峰盘旋夭矫，势若游龙。罕见的山南阴水洞，常年累月山溪流入洞内，落之地下，出至何处？无人知晓。曾有人试倾万箩谷糠，仍然未见出处。山南奇特的子午泉，又名雨涌泉，每逢子午时辰巨灵泉喷，过时则细流潺潺。宋周兑曾有“杨歧山下出灵泉，与海相通亘古传，汹涌便知天欲雨，为言阴石不须鞭”的诗句。偃松台苍翠幽奇，千态万状，唐刘廓诗云：“景异寻常处，人须特达来。松杉寒更茂，岚霭昼还开。”此外，还有千丈路、观音岩、牛斗石、九房石、罗汉洞、乌龟潭等奇特景致，统称杨歧十八景。另有被植

物学家视为珍物的观音竹、墨竹、方竹、实心竹长满山间，亦可供人赏心娱目。

杨歧山有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迹杨歧寺。它建于唐开元年间，中国佛教中的杨歧禅宗就发祥于此，且在日本佛教史上亦占相当地位。寺内现存的唐碑、唐塔、唐柏是极其珍贵的唐代文物。有一块唐碑是进步思想家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为乘广禅师撰写的碑文，对研究唐代历史有着宝贵的价值。此外，清代著名文学家、戊戌变法的积极支持者、榜眼文廷式之墓亦葬杨歧山腰。

杨歧山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远在元朝就有彭莹玉和尚揭竿起义反抗元帝国的统治。在近代，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进军井冈山途中曾宿营于杨歧山下之快荣小视。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是湘鄂赣老苏区。一九二八年中共安源市委在杨歧山区领导了著名的斑竹山起义，起义武装攻打上栗反动武装，缴枪数十，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解放战争时期，杨歧人民为配合解放军又举行了天台起义。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萍乡市地名办公室供稿)



杨 歧 寺

杨歧寺位于萍乡市城北面35公里的杨歧山寿桃峰下。巍峨葱郁的一字山横亘寺前，陡峭巉峻的观音岩竖立寺东。古朴肃穆，玲珑剔透。雕檐画栋的殿宇在茂林修竹之中，给人以幽静飘逸之感。

据《萍乡县志》载：杨歧寺创建于唐开元年间，由乘广禅师开山，始名“广利寺”，宋庆历年间普惠禅师改寺名为“普通禅寺”。元毁，明初僧嗣观重建，清乾隆元年整修，道光六年毁于山洪，二十二年邑人甘宝贤等再建至今，嗣后以寺座落在杨歧山下面改名杨歧寺。

杨歧寺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我国佛教禅宗五家七宗之一的杨歧禅宗的发祥地。北宋末僧方会创立杨歧禅宗。嗣后不仅弟子众多，而且高僧辈出。据清吴门聂乐读所著《指月录》载：自南宋建炎至清康熙年间，全国高僧710人，杨歧宗派就占470人，且东渡日本授法的就有29人。乘广、甄叔、元聪等尤为佼佼者，其生平事迹在《江西通志》、《袁州府志》、《萍乡县志》、《辞海》、《佛教大辞典》、《中国名人大辞典》等典籍上均有记载。宋庆元五年(公元1199)，日本泉涌寺僧人俊芳来中国，从杨歧宗第六世元聪受法。不久，辨园到中国从无准师范嗣法，回国后，为日本东福寺开山。由此可见杨歧寺在日本佛教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页。鉴真东渡日本，俊芳西来中国，二者交相辉映，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与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杨歧的骄傲。

杨歧寺有很多珍贵的历史文物，现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尚保存的有唐碑、唐塔、唐柏。唐碑有二：一是唐代诗

人进步思 家刘禹锡为乘广禅师撰写的碑文，由刘申锡篆刻，建于唐元和二年(公元807)；另一块是《甄叔禅师塔铭》，唐大和元年建(公元827)沙门至闲撰文，僧元幽书写。前者是刘禹锡得意之作，后者书法如行云流水，实属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唐塔是乘广、甄叔禅师等高僧埋存骨灰的标记。塔石浮雕古朴雄浑，乘广塔雕人物腰腹间有一古式锁状物，是珍贵的唐代文物。其余三塔失考。唐柏在杨歧寺后，系甄叔禅师手植，故称“甄叔柏”，亦呼“倒栽柏。”36高米，直径2.2米。苍劲挺拔，枝繁叶茂，生气勃勃。

杨歧寺所处环境异常幽美，诚如宋郑强《普通寺诗》所云：“绿蓝青黛染晴山，院锁层峦叠嶂间。庾岭插天云漠漠，曹溪泻地水潺潺。”寺占地约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它肃穆庄严，金碧辉煌，富有我国南方古刹的独特风格。山门、院落、大雄殿、观音堂、住宅等一应俱全。寺内原有如来佛、观音、关帝大型塑像，还有护法韦陀、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等木雕神像，庄严威武，栩栩如生。仅从现有的少量装饰品——雕刻狮子、间扇小木格上的牡丹、芙蓉等浮雕看，即可知我国当年建筑艺术的高超。寺院兴旺时，有和尚一百余人，解放后皆返俗务农。于是寺院无人看管，更惜“文革”浩劫，佛像、雕刻、图案等陈列和装饰品都被作为“四旧”而焚毁殆尽。现仅存年久失修的空荡大殿，到处杂草丛生，断砖残瓦，梁断檐塌，墙壁裂缝，面临倒塌危险。亟待维修和整理。

萍乡市地名办公室供稿

萍乡文史资料征稿第一批参考题

一、党派、团体

- 1、解放前后，民革、民盟、工商联、九三学社在萍乡的发展情况与活动情况（分开写）；
- 2、国民党、三青团、政学系、复兴社、中统在萍乡的发展情况与活动情况（分开写）；
- 3、青帮、洪帮在萍乡的发展情况与活动情况（分开写）；
- 4、国民党时期的萍乡参议会。

二、政治事件

- 5、文廷式与戊戌政变；
- 6、同盟会在萍乡的情况；
- 7、罗凤冈领导的农民起义；
- 8、肖克昌与安源工人罢工斗争；
- 9、北伐军到萍乡；
- 10、贺信早（又名贺六将军）领导的农民起义；
- 11、欧阳如宝制造芦溪爆业工会惨案；
- 12、处决大恶霸叶紫屏纪实；
- 13、萍乡学潮；
- 14、保甲制度；
- 15、六、五事变始末；
- 16、萍浏礼起义之经过；
- 17、兴建萍乡飞机场之始末；

- 18、新生活建设协会活动情况；
- 19、中美合作所、交警队、反共救国军、别动队在萍乡的活动情况（分开写）；
- 20、赣西镇守使在萍乡始末；
- 21、张公塘煤矿穿水事故惨案；
- 22、解放前夕的护矿斗争；
- 23、萍乡青年自救会的演变；
- 24、8.15暴动组织情况；
- 25、日本侵略军入侵萍乡的罪行；
- 26、日军侵入萍乡的罪证——湘东尸骨塔；
- 27、一九二五年惨杀黄静源烈士；
- 28、红军上井冈山后的萍乡白色恐怖；
- 29、大安里的大屠杀；
- 30、枪杀刘鹏的内幕；
- 31、58军在萍乡的所作所为；
- 32、邓友生事件引起的工潮；
- 33、黄兴到萍乡。

三、各界要人

- 34、黄再生、易俞、姚纯、邓钟梅、陈天鸿、陈义腾、陈峙车、贾江恩、胡轨、贾锡谷、王鸿卿、刘存一、文仲伯、钟震川、沈一古、蔡少南、蔡梦坚等；
- 35、复兴社、CC头目吴建中、危宿钟、何允勉、樊立仲、李陶。

四、工商、经济

- 36、萍乡煤炭工业发展史；
- 37、上埠陶瓷工业发展史；

- 38、上栗、芦溪编爆焰花发展史；
- 39、萍乡花果发展史；
- 40、萍乡铁路史；
- 41、萍乡公路史；
- 42、萍乡邮电史；
- 43、萍乡航运事业之兴衰；
- 44、中、裕、交、农四银行在萍乡（分开写）；
- 45、李笃斋与九和绸缎店；
- 46、黄序鸪与他的经济史长篇；
- 47、文经五与工商界；
- 48、国民党时期的合作事业；
- 49、黄满甫的发家史；
- 50、文群与萍乡的合作事业；
- 51、彭泳樵与萍乡的合作金库；
- 52、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五、文化教育、新闻出版

- 53、“五四”时期的萍乡新文化运动；
- 54、安源工人夜校；
- 55、鳌洲书院；
- 56、萍乡中学；
- 57、萍乡高工；
- 58、萍乡师范；
- 59、萍乡女师；
- 60、萍乡鳌洲中学；
- 61、正本女学、凌云女子中学；
- 62、萍乡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 63、私人藏书家黄道腴；

- 64、文物收藏家黄友梅、文舟书；
- 65、肖觉因、肖赣与萍乡的教育事业；
- 66、《旅湘萍乡学友会月刊》；
- 67、解放前的萍乡新闻事业；
- 68、《春潮》；
- 69、《大铁锤报》；
- 70、《民报》；
- 71、《群报》；
- 72、萍乡图书馆藏书情况；
- 73、解放前新闻界有影响的人物；
- 74、萍乡的湘剧；
- 78、刘筱和与《昭萍志略》。

六、宗 教

- 76、道教在萍乡的组织与活动情况；
- 77、释教在萍乡的组织与活动情况；
- 78、天主教在萍乡的组织与活动情况；
- 79、耶苏教在萍乡的组织与活动情况；
- 80、回教在萍乡的组织与活动情况；
- 81、洪江会、哥老会在萍乡的组织与活动情况；

七、社 会

- 82、萍乡的民间慈善救济事业；
- 83、肖念成与萍乡的慈善事业；
- 84、萍乡孤儿院；
- 85、萍乡儿童教养院；
- 86、封建迷信会道门的组织与活动；
- 87、娼妓、鸦片、赌博；

88、行帮、把头、械斗、土匪；

89、族姓变迁。

八、文物胜迹

90、宝积寺；

91、孔庙；

92、横龙寺；

93、杨岐寺；

94、瑶金山禅寺；

65、武功山；

99、武云山；

97、萍乡万寿宫；

98、萍乡古城变迁；

99、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九、其它

100、萍乡风土人情；

101、萍乡人口变迁。

D654.4

14

封面题字：李远实

127

0.70

萍乡文史资料

一九八四年八月
(第一辑)

主 办：政协萍乡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辑：《萍乡文史资料》编辑室
印 刷：萍乡市芦溪区印刷厂

萍乡市印刷出版登记证(84)05号